

目录

[理想國譯叢序 2](#_Toc54510992)

[導讀 修復未來 3](#_Toc54510993)

[中文版自序 過去的從來就沒有過去 6](#_Toc54510994)

[第一章 轉折點 7](#_Toc54510995)

[第二章 紐倫堡還是全民遺忘？  —第三條道路 11](#_Toc54510996)

[第三章 時機已到 22](#_Toc54510997)

[第四章 何謂正義？ 26](#_Toc54510998)

[第五章 開始行動 32](#_Toc54510999)

[第六章 受害者，抑或幸存者的國度？ 38](#_Toc54511000)

[第七章 “我們確想寬恕，但不知寬恕誰” 49](#_Toc54511001)

[第八章 “我感到如重見光明一般” 63](#_Toc54511002)

[第九章 我為什么做這份吃力不討好的工作？ 73](#_Toc54511003)

[第十章 “我們原來不知道” 79](#_Toc54511004)

[第十一章 沒有寬恕，真的沒有未來 91](#_Toc54511005)

[致 謝 100](#_Toc54511006)

[后記 吸塵器與洗碗機 101](#_Toc54511007)

[［譯名對照表］ 102](#_Toc54511008)

# 理想國譯叢序

“如果沒有翻譯”，批評家喬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曾寫道，“我們無異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語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東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應說，“翻譯不僅僅是言詞之事，它讓整個文化變得可以理解。”

這兩句話或許比任何復雜的闡述都更清晰地定義了理想國譯叢的初衷。

自從嚴復與林琴南締造中國近代翻譯傳統以來，譯介就被兩種趨勢支配。

它是開放的，中國必須向外部學習，它又有某種封閉性，被一種強烈的功利主義所影響。嚴復期望赫伯特·斯賓塞、孟德斯鳩的思想能幫助中國獲得富強之道，林琴南則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變國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與故事，必須以我們期待的視角來呈現。

在很大程度上，這套譯叢仍延續著這個傳統。此刻的中國與一個世紀前不同，但她仍面臨諸多嶄新的挑戰，我們迫切需要他人的經驗來幫助我們應對難題，保持思想的開放性是面對復雜與高速變化的時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希望保持一種非功利的興趣：對世界的豐富性、復雜性本身充滿興趣，真誠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經驗。

# 導讀 修復未來

熊培云

每個國家在其轉型過程中都會有些靈魂式的人物。南非何其幸運！1991年，白人作家納丁·戈迪默女士因為反種族隔離作品《七月的人民》獲諾貝爾文學獎。1993年，黑白雙星曼德拉和他的政治對手德克勒克作為促進族群和解的典范，一起走上諾貝爾和平獎領獎臺。而在此前近十年的1984年，本書作者圖圖因為反對種族隔離而成為南非首位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并于次年成為南非開普敦首位黑人大主教。

幾年前我在臺灣旅行，在書店里偶然讀到圖圖大主教的《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No Future Without Forgiveness），一時感慨萬千。我一直以為，中國最缺的不是公民教育，而是人的教育—它包括生命意義、自我價值、自尊、愛與同情、信仰，它主要涉及的是自己與自己的關系，即你要把自己帶到哪里去。當然它也包括我們如何在寬恕他人的基礎上保全自己。人的教育面對的不是幾個簡單的群己權界的概念，但它們是所有權利觀念的起點。好社會同樣不會從天而降，它需要有針對人與制度的雙重建設。而我有幸在圖圖大主教的書里看到了這種雙重努力。

《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著重探討了“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的歷史使命。這同時是一本悲欣交集的書，很多細節在我讀后一直難以釋懷。

書中講到一個悲哀至極的故事，并由此質問—為什么那個開普敦年輕人被處死并就地焚燒后，殺害他的四個人竟然能夠一邊翻動火堆里的尸體，一邊坐在旁邊心安理得地吃燒烤？他們如何回到家里擁抱自己的妻子，參加孩子的生日聚會？

至于喜極而泣的故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圖圖大主教第一次去古古樂圖參與投票時的情景：

期盼已久的時刻終于到來了，我折好手中的選票，投進了票箱。啊！我忍不住叫了出來：“好啊！”我感到暈眩，如同墮入情網的一剎那，天空變得更藍更美了。我看到人人都煥然一新，如同脫胎換骨一般。我自己也脫胎換骨了。簡直像夢境一樣。我們真擔心會被從夢境中喚醒，睜開眼時又回到了種族隔離的嚴酷現實中……

這是一種令人歡笑又禁不住流淚的感覺，它讓我們歡欣雀躍，手舞足蹈，又讓我們不敢相信這一切真的發生了，害怕這一切會煙消云散。這可能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盟軍徹底打敗納粹和日本人后勝利者在歐洲勝利日和抗日勝利日的感受，人們從村莊、鄉鎮、城市沖上街頭，和互不相識的陌生人擁抱、親吻。這就是我們的感受。（第3—5頁）

南非民主化與種族隔離政策的廢除讓被壓迫的黑人實現了政治上的“南非夢”。然而，對于這個國家來說接下來最緊要的是文化和心理上的重建，即如何促成族群之間、受害者與加害者之間的寬恕與和解，讓南非從種族隔離的傷害中復原而不是冤冤相報。圖圖大主教深刻地認識到潛在的危險，他擔心新生的南非因為受害者對加害者的清算重新倒在廢墟里。如果仇恨和清算注定只能將新南非變成一座新的廢墟，那么寬恕與和解就不僅不是軟弱，而且是另有廣闊前途。

圖圖大主教的這種憂慮及其遠見，與曼德拉不謀而合。曼德拉后來在他的自傳《漫漫自由路》中，也特別回憶到自己走出監獄并當選南非首位黑人總統后的心路歷程—南非絕不能撕裂，重演一群人對另一群人的戰爭。你若真心熱愛自由，就必須在拯救受害者的同時，也拯救加害者。因為在一種罪惡的制度下，加害者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囚徒。

“人們只記得恨是愛的鄰居，卻忘記了愛也是恨的鄰居”—后德克勒克時代的南非精英打破了這古老的詛咒，他們棄絕了冤冤相報，而是選擇了寬恕與和解。在這個已然千瘡百孔的國家，他們試圖以修復未來的明辨是非取代你死我活的黑白分明。經過漫長的討論，南非最終沒有選擇紐倫堡審判的模式，也沒有選擇全民遺忘，而是走了第三條道路。依據1995年《促進民族團結與和解法案》，南非成立了真相與和解委員會。

“以真相換自由”讓南非因此“避免了紐倫堡審判和一攬子大赦（或全民遺忘）的兩個極端”。從1996年開始，在圖圖大主教的主持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通過當事各方提供證言，就1960—1994年期間南非人權狀況還原歷史真相，既揭露了種族主義政權虐待黑人的罪惡，也不回避非國大等黑人解放組織的暴力活動曾經迫害反對派、侵犯人權的問題。每個參與迫害行動的人都必須單獨提出申請，并接受一個獨立小組的審查，由它決定申請人是否符合獲得赦免的苛刻條件。這第三條道路就是赦免具體個人的罪責，以換取對與赦免相關的罪行的完全披露。用圖圖的話說，這也是一個“胡蘿卜加大棒”的政策。以可能獲得自由之胡蘿卜換取真相，而大棒則是已捉拿歸案的將面臨長期監禁，仍逍遙法外的則面臨著被捕、起訴和牢獄。（第34頁）

種種質疑也隨之而來。一個惡人僅僅因為坦白了自己的罪行就可以溜之大吉？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成立是否道德？大赦是否有違正義？這些也都是作者在《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一書中著重探討的問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圖圖在書中特別對比了兩種司法的區別：

在懲罰性司法（Punitive justice）中，毫無人情味的國家在施行懲罰時幾乎不為受害者著想，更不要說為罪犯著想。與此相比，在非洲的傳統法學中還有一種恢復性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后者關注的重點不在報復或懲罰，而是本著烏班圖精神（Ubuntu），努力療治創傷、恢復平衡、復原破裂的關系。這種司法力圖救助的不僅有受害者，也有罪犯，他們應該得到機會重新融入因其行為而被傷害的社會中。

在圖圖看來，烏班圖精神是非洲傳統文化的精髓。一個有烏班圖精神的人，必定慷慨、好客、友善、關懷他人且常有憐憫之心。在烏班圖精神的感召下，人們相信即使種族隔離的支持者，也是其實施和狂熱支持的制度的受害者；相信無論加害者愿意與否，他在實施加害時也必然失去了人性。

而真相同樣是重要的。寬恕并非不問是非。促成南非族群和解的另一位關鍵性人物是大法官薩克斯。有關他“溫柔的復仇”的故事，可以較好地說明這一切。

薩克斯是猶太裔南非白人，他曾經因為反對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而付出巨大的代價。1988年4月7日，早在他流亡國外的時候，被南非政府派出的恐怖人員設置的汽車炸彈奪去了一條胳膊和一只眼睛。盡管如此，在就任南非大法官后，他仍是寬恕與和解工作的重要推動者。條件是，作惡者必須說出真相。

當年意圖謀害他的特務亨利在取消種族隔離政策后，曾經失魂落魄地找到薩克斯。兩人雖談了許多，但薩克斯對亨利說：“除非你到真相委員會說出一切，否則我不會與你握手。”事隔多日，兩人在一次宴會上偶遇。當亨利表示自己已經前往真相委員會坦白一切，并希望能有機會與薩克斯握手時，薩克斯便立即答應了他。

這是一個暗含隱喻的姿勢—薩克斯沒有用幸存的胳膊為失去的胳膊復仇，而是用它握住敵人的手。據說，亨利離開宴會回家后痛哭了兩個星期。這個細節不得不讓我們重新回到圖圖對人性與道德的理解—這個世界是有道德存在的，盡管所有證據顯示出的，可能是個相反的世界，但邪惡、不公、壓迫和謊言，絕不會是世界最后的歸宿。

薩克斯同樣注重修復的價值。在《斷臂上的花朵》一書中記錄了阿扎尼亞人民組織案，回答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是否違憲的問題。南非憲法法院否決了阿扎尼亞人民組織的質疑，相關結語明確指出應對那些作惡者提供全面性特赦，以換取他們提供有關過去的真相。另一方面，制憲者的選擇是為了讓國會能夠促進“社會的重建”，其過程中有個重要的概念叫做“修復”。為了達到修復的目的，國家在思考各個沖突的利益的同時，也會考慮那些在過去非常時期中，基本人權受到侵害的受害者與家屬的“被忽視的痛”。

事實上，寬恕加害者也并不意味著對受害者的完全忽視。圖圖認為寬恕在要求受害者放棄向罪犯討還血債的同時，也有可能解放受害者。所以，“真正的寬恕要了結過去，了結全部的過去，使未來成為可能。我們不能以無法再代表自己說話的人們的名義，冤冤相報”。如果一個人死抱著仇恨不放，他的一生就成了仇恨的奴隸。這種精神上的持久的加害，有時并不亞于他曾經受到的傷害。就像我在解讀影片《天堂五分鐘》時所揭示的，復仇者未必能獲得大仇得報時的“五分鐘天堂”的快感，卻嚴嚴實實地將自己的一生推進了擠滿仇恨的地獄。在此意義上，沒有寬恕何止是沒有未來，連現在也不會有。

同樣需要看到的是，南非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著力推進的是全社會政治和解，是對一個錯誤和悲傷的時代的糾錯，而不是對日常刑事案件的是非不分。它要求申請大赦者的行為在特定期間內（請求予以大赦的行為，必須發生在1960年沙佩維爾大屠殺和1994年曼德拉當選為南非第一任民主選舉的國家首腦之間），并且必須具有政治動機。大赦條款是為特定目的進行的臨時性安排。南非的司法不會永遠照此辦理。它只適用于有限時期的特定目的。那些出于個人貪婪而殺人的罪犯沒有資格申請大赦。如果行為是執行或代表一個政治組織的命令，則罪犯有資格提出申請。條件是必須如實披露所有與尋求大赦行為相關的事實，并遵守適配原則。這不是說要寬恕一切罪惡，而是對壞制度下人的一種寬恕與救濟。

南非的這場“真相與和解”運動，有時候難免會讓人覺得它過于浪漫和天真，仿佛一個新的時代到來了，所有舊的罪惡也自動清零、一筆勾銷了。受害者出于感情因素對此不能理解，情有可原。另一方面，從理性的角度來看，這種“由清算轉為清零”的模式也讓那些處于轉型期國家的人們心懷憂懼—不是說“不是不報，時候未到”嗎？這個可被寬恕的前景會不會鼓勵那些帶有政治目的的人，借著這種“政治寬恕”進一步胡作非為？

對此憂慮，當然人們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加以反駁：假如加害者與被害者沒有和解的可能，假如德克勒克放下權力的那一刻即意味著要將自己和同僚送進地獄，他們將如何計算自己的利害，這個國家的歷史又將在冤冤相報中倒退與徘徊多少年？

我必須承認，有時候我也會從上述角度來理解“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如果承認制度與文化相關，而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的觀念，就應該看到沒有寬容的觀念，絕不會產生可以安放人心的寬容的社會制度。即使這個國家完成政治上的轉型，如果沒有寬恕與和解來醫治社會長年累月的創傷，即使自由已經得到，也將消失在新的漫長的冤冤相報之中。

本套譯叢關注轉型正義，集中譯介了圖圖大主教的《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薩克斯的《斷臂上的花朵》以及曼德拉的《漫漫自由路》，且當是轉型期南非的“和解三部曲”。其他相關內容，我還會在另兩本書的序言中加以補充。倘若讀者能夠靜心閱讀并體會個中精義，并讓它們長存于心，這也算是譯介者為這個國家播撒一些面向未來的種子，提供一個可供選擇的寬闊前景。

2014年8月6日，于東京大學訪學期間

# 中文版自序 過去的從來就沒有過去

上世紀80年代末我訪問偉大的中國時，就被中國人民的勤勞刻苦深深地打動了。譬如為了工作，工人們到晚上還在探照燈下忙碌于建設工地上。更使我感動的是中國人民的慷慨大方，這從我和妻子得到惠贈的禮物上就可以感受得到。但我在其他方面也體會到了這種大度。我了解到日本人曾經在南京犯下的殘暴罪行，然而向我描述那些恐怖事件的人卻并未心懷怨毒和仇恨。我還耳聞了在所謂的“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駭人暴行。但那些身受其害的當事人卻再次讓我驚訝萬分，他們在敘述往事的時候并未表現出怨恨或報復的情緒，盡管他們曾無端遭受過來自同胞的無法言傳的傷害。我要向他們的寬容大度表達我的敬意。

但我卻不能肯定，在最終的意義上這就是邁向未來的最好途徑。我對把過去掃入角落視而不見的做法是否合適表示懷疑。過去的從來就沒有過去。它們有種怪異的力量，能夠重現并長久縈繞在我們心頭。我們在南非就有這種感受。英國人和布爾人曾試圖欺騙自己，在上上個世紀之交的布爾戰爭中仿佛什么也沒有發生，而當時英國人把很多布爾人婦女和兒童都送進了他們發明的集中營。雙方后裔表面上友善相處，然而不斷發生的事端卻表明，這種友好只是一種假象。一位年輕的布爾人小伙子告訴我，無論何時聽他祖母講述那場戰爭，他都義憤填膺，隨時準備再打一次布爾戰爭。他們需要有一天通過恰當的途徑最終與這段歷史告別。

我們在自己國土上的經歷令人寬慰。人們表現出真正高尚的寬宏大度。他們寬恕罪惡、放棄復仇的意愿實在令人敬佩。他們把自己從受害者的狀態下解放出來，不再心懷怨言、死抱住創傷不放，從而開創出嶄新的人際關系。他們給予罪行的制造者以機會，從內心的愧疚、憤怒和恥辱中解脫出來。這樣便形成了雙贏的局面。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做法，就像中東所發生的沖突，是如此的具有破壞性。這樣做，和平與安全不可能真正到來。復仇和暴力只能生發出更多的復仇和暴力。

我理解中國人出于傳統文化中保護面子的需要，對道歉可能感到為難。但是，夫婦之間發生爭吵時會出現什么情形呢？難道他們不會和好嗎？難道道歉的一方會有失面子嗎？如果他們不這樣做，他們的關系就不妙了。愿意道歉和寬恕的人是堅強而非軟弱的人。納爾遜·曼德拉是軟弱或無足輕重的人嗎？

中國如果能夠妥善處理往昔的痛苦，就會成為一個更加偉大的國家。沒有寬恕，真的就沒有未來。

（魯剛 譯）

獻 給

南非的婦女和“小人物”們

# 第一章 轉折點

忘記過去的人，注定會重蹈覆轍。

—喬治·桑塔亞納

1994年4月27日—這是我們苦苦等待了多年的日子。為了這一天，我們進行了不懈的反種族隔離斗爭；為了這一天，我們有那么多人遭受催淚瓦斯的毒害、遭受警犬的撕咬、遭受警棍與皮鞭的毒打；為了這一天，有那么多人被酷刑折磨、被隔離監禁、被處以死刑或被迫流亡。這一天終于降臨了，我們終于可以投票，可以在生我養我的土地上參加第一次民主選舉。等到有權投票的日子，我已經62歲，納爾遜·曼德拉則已近76歲高齡。

充滿興奮、期待、焦慮乃至恐懼的氣氛令人心驚魄動。是的，人們害怕那些發誓要破壞這最重要一天的右翼分子的邪惡陰謀可能得逞。東西南北到處都有炸彈爆炸事件。約翰內斯堡國際機場竟發生了數起爆炸。什么都可能發生。

我和往常一樣，清晨起身，靜思和散步，進行晨禱，然后到主教廷的大主教禮拜堂領圣餐。我們熱愛我們的國土，可是它已浸染了那么多兒女的鮮血，它是如此悲慘的一塊國土，我們企盼著在它歷史上這非同尋常的一天，局面能夠盡可能保持正常。在南非歷史上這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前夜，暴力變成了一種瘟疫。直到那著名的最后時刻之前，M. 布特萊齊的因卡塔自由黨（IFP）仍在扮演主角，威脅著不參加選舉。我們全都下定了決心，準備面對最殘忍的血腥屠殺，特別是在因卡塔自由黨的堡壘夸祖魯―納塔爾省。因卡塔和納爾遜·曼德拉領導的非洲人國民大會（非國大）在該省的對抗演變成了駭人聽聞的殺戮，政治上的極度不寬容令人震驚，已有無數人為此喪生。局勢之嚴重，無以復加。我們幾乎要透不過氣來了，不知道這次又會有多少人死于非命。

萬幸的是，在某個神秘的肯尼亞人的斡旋之下，布特萊齊終于同意放棄抵制，避免了一場令人不寒而栗的血腥殺戮。全國上下長長地松了一口氣。于是，我們終于就要開始采取一項政治和公民行動了，這在那些正常的國家里不過是一次例行公事，他們通常擔心的是選民的冷漠，而不是投票點的暴力和混亂。

我們既興奮又緊張。我的內心深處懷著死結一般的憂慮。那天早上我們真誠地祈禱上帝保佑我們的國土，挫敗被黑暗蒙蔽的子民的陰謀。在過去種族隔離猖獗的黑暗日子里，我曾經布道說：“這是上帝的世界，上帝是主宰。”有時當邪惡似乎就要壓倒善良時，我只能緊緊抓住這一條教義，好像在黑暗中為自己壯膽，又常常忍不住想在上帝的耳邊悄悄說：“我的老天，你就不能讓你的主宰更明顯一點嗎？”

早餐后，我們驅車出了開普敦大主教“官”邸—主教廷（1990年2月11日納爾遜·曼德拉在此度過了他獲釋后的第一個自由之夜），離開了周圍綠樹成蔭的富人郊外居住區。我已決定要到貧民城鎮去投票。這樣做有著很強的象征意義：我要表明，我是和那些長期被剝奪了選舉權、日復一日生活在貧困和骯臟的種族隔離貧民窟中的人民站在一起的。畢竟，我本來就是他們的一分子。1986年我就任大主教時，根據種族分隔居住區的“社團區域法”仍在執行。即使作為諾貝爾獎獲得者，當時又擔任了南部非洲圣公會的大主教和都主教，我也不能和家人住進主教廷，除非首先得到特許證，使我免于社團區域法的管轄。但是，在我當選大主教后，我已宣布我不申請這樣的特許證。我說我是大主教，應當住進大主教的官邸，種族隔離政府認為怎么合適就怎么辦吧！我并未因違反了這一可憎的法令而遭到起訴。

我去投票的地方叫古古樂圖，是一個典型的黑人小鎮，火柴盒式的房子一排接著一排，單調乏味。那里已經排起了等待的長隊，人們興高采烈，但也得有極大的耐心和相當的幽默，才能忍受得了漫長的等待。我的第一次民主投票是新聞熱點，很多海外的朋友也親臨現場，作為觀察員監督選舉是否公正和自由。但他們所做的還遠不止于此。他們就像接生婆，幫助著一個稚嫩的新生命—一個自由、民主、非種族主義、無性別歧視的新南非的誕生。

期盼已久的時刻終于到來了，我折好手中的選票，投進了票箱。啊！我忍不住叫了出來：“好啊！”我感到暈眩，如同墮入情網的一剎那，天空變得更藍更美了。我看到人人都煥然一新，如同脫胎換骨一般。我自己也脫胎換骨了。簡直像夢境一樣。我們真擔心會被從夢境中喚醒，睜開眼時又回到了種族隔離的嚴酷現實中。有人陶醉于這種夢境般的幸福之中，他告訴妻子：“親愛的，不要叫醒我。我喜歡這夢。”

投票后我走了出來，人們歡呼雀躍，載歌載舞，像是歡度節日。這是一個極好的證明，說明那些生來就備受壓迫的人，那些在種族隔離制度下變成了無名氏的人—變得無名無姓、無聲無息、身在自己的祖國卻被忽略不計、每時每刻都在遭受欺侮的普通民眾—是無辜的。他們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塑造出來的，但是他們的尊嚴卻被種族隔離制的奴才們、被聲稱反對種族隔離卻不憚享受種族隔離為其帶來的巨大特權和好處的人粗暴踐踏，原因僅僅是他們偶然的出身，一個毫不相干的生理因素，即他們的膚色。

我決定驅車在周圍轉轉。所見所聞令我驚嘆不已。人們成群結隊走上街頭，排成長長的隊。這些長隊如今已是舉世聞名，但在當時卻又是那么脆弱。警察和保安部隊可能非常緊張，但他們并不惹人矚目。只消幾個瘋狂的極端分子、幾支AK-47沖鋒槍就足以造成巨大的混亂，但沒有出現這種情況。幾乎各處都遇到了這樣那樣的磕磕絆絆，不是選票不夠了，就是缺了印臺，還有些官員在規定的投票時間幾小時后方才到場。人們的耐心令人嘆為觀止。全局性的災難似乎一觸即發。但是并沒有發生。

這是一幅令人驚異的場景。各種族的人們可能是平生第一次站在同一個隊伍里。專業人士、傭工、清潔工及其女主人—所有的人都排在長長的隊伍中，慢慢走向投票箱。可能發生的災難看來卻是一個福音。這些隊伍在南非創造了一個嶄新而獨特的身份象征。人們后來夸耀說：“我站了兩個小時才投上票”，“我等了足足四個鐘頭！”

漫長的等待讓我們南非人重新找回了彼此。人們傳閱著報紙、分享著三明治、遮著同一把陽傘，等級在他們的眼中消失了，南非人找到了南非人同胞，意識到了我們曾費盡心力想要告訴他們的東西，即他們有著共同的人性，民族、種族、膚色本來是無足輕重的。他們發現的不是一個有色人、一個黑人、一個印度后裔或是一個白人。不，他們發現的是人類同胞。白人認識到黑人、有色人（常常是混血）、印度后裔原來也是人，也和他們一樣，同樣有情感，有憂慮，有期待，這是多么重大的科學發現啊！這些人也想有個像樣的家、一份好工作，也想家人有個安全的環境、孩子有個好學校。他們中間沒有人想把白人趕到海里，而只想得到自己在陽光下的一席之地。

無論在哪里，選舉都是世俗意義的政治事件，但我們的卻遠不止于此。我們的選舉是一次名副其實的思想歷程，一種登臨頂峰的精神感受。走進投票站時黑人是一個人，走出來時已經脫胎換骨成為一個新人。走進去時，她滿懷仇恨、背負著壓迫的重擔，她無法忘記自己曾被視為糞土，這種記憶像強酸一樣侵蝕著她的心。她重新出現時，知道自己已經自由了，頭昂得那么高，背挺得那么直，腳步是那么輕快。你如何傳達那種如同第一次嘗到蜜糖滋味一樣的自由的感受呢？你怎么跟生來自由的人形容這種感覺呢？不可能，就好像無法跟一個天生的盲人講清什么是紅色一樣。

這是一種令人歡笑又禁不住流淚的感覺，它讓我們歡欣雀躍，手舞足蹈，又讓我們不敢相信這一切真的發生了，害怕這一切會煙消云散。這可能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盟軍徹底打敗納粹和日本人后勝利者在歐洲勝利日和抗日勝利日的感受，人們從村莊、鄉鎮、城市沖上街頭，和互不相識的陌生人擁抱、親吻。這就是我們的感受。

白人走進投票站時，則為自己曾享受過壓迫和非正義的果實而滿懷負罪感。他走出來時也脫胎換骨，變成了一個新人，他放下了負擔，獲得了自由。白人體會到自由實際上是不可分割的。在種族隔離壓迫的黑暗歲月，我一直在說，如果黑人沒有自由，南非白人也永遠不會有真正的自由。許多人認為這不過是圖圖的另一條口號，和其他口號一樣靠不住，而今天這卻變成了人們親歷的現實。我常常提起一部由西德尼·波蒂埃主演的引人入勝的老電影《逃獄驚魂》（The Defiant Ones）。片中兩個囚犯—一個白人、一個黑人—從被鐵鏈拴在一起的囚犯隊伍中逃脫出來。他們銬在一起，掉進了一個沿壁很滑的深溝。其中一個費力向上爬，幾乎爬到了溝頂，但卻無法爬出去，因為他和仍在溝底的同伴拴在一起。要想成功，他們就必須同心協力，一起向上爬，最終爬上溝壁，逃脫出去。

因此，我要說，我們南非人只有一起生存和成功，被環境和歷史綁在一起的白人和黑人只有共同努力，才能一起向上爬出種族隔離主義的深淵。任何群體都不可能單獨取得成功。上帝把我們聯系在一起。在某種意義上，我們是在實踐馬丁·路德·金說過的話：“我們必須學會像兄弟一樣共同生活，否則我們就會作為傻瓜一起滅亡。”

4月27日這非同尋常的一天，竟是在沒有我們所害怕或他人所預期的破壞行為的情況下結束的。選舉被宣布為公正和自由的。贊美上帝，我們欣喜若狂，我們成功了！我們自己都覺得難以置信。5月9日，納爾遜·曼德拉在新南非第一屆民主選舉的國民議會上當選為總統。然后，我們參加了開普敦市政廳外的大游行。街上人如潮涌，與迎接納爾遜·曼德拉出獄時相比也毫不遜色。

我極為榮幸地將新總統和他的兩位副總統—塔博·姆貝基和F. W. 德克勒克—介紹給了已等得不耐煩的人群和整個世界。當我將曼德拉引向主席臺，把他交給人民時，人群中爆發出了震耳欲聾的歡呼聲。

今天，我們正在這個劃時代的事件中體會這一點。選舉之后，許多南非人發現民主和自由來到了他們的土地上，幫助他們打開了過去曾經緊閉的大門。曾把我們當成賤民一樣對待的國際社會，此刻向我們敞開了胸懷。我們重新回到了英聯邦，在倫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舉行的儀式和祈禱感人至深，新南非的旗幟被舉上圣壇，加入了英聯邦國家的行列。曾在許多賽事上抵制我們的體育世界向我們展開了迎賓的紅地毯。南非人開始了一種全新的經歷。他們的國家如今嘗到了新生的滋味。南非人以往在國外旅行總是鬼鬼祟祟，總是盡量掩飾自己的國籍，生怕被人拒之門外。而今他們則昂首挺胸，把國旗驕傲地別在衣領上、卡在行李上，向所有人宣示他們來自南非這塊土地，告訴大家他們已經打破了末日將臨的一切預言，并且不同尋常地實現了從壓迫和非正義向民主與自由的和平過渡。

當5月10日納爾遜·曼德拉就任南非第一任民主選舉的總統時，可能整個世界都為之停止了運轉。即使沒有停止，本來也是應當停止的，因為幾乎全世界各個國家的領導人都齊聚比勒陀利亞，所有的重要人物都到場了。在這個歷史性的就職日中最令人難忘的時刻之一，是南非空軍戰機釋放著代表國旗顏色的煙霧從空中掠過向新總統致敬。我禁不住淚流滿面。在場的南非人，我想特別是南非黑人，幾乎異口同聲地發出了震耳欲聾的歡呼聲。我們似乎在同一瞬間意識到，這些長期以來在我們頭頂耀武揚威的戰爭機器，現在是我們的而不再只是他們的了。這的的確確是最深刻意義上的我們的國家了。

納爾遜·曼德拉在他的大女兒陪伴下到場時，保安部隊、警察、監管機構的首腦正步走到他車前，向他敬禮，然后護衛著他們的國家首腦繼續行進。這一時刻真是讓人百感交集。僅僅幾年之前，他還是他們的囚犯，而且被當做恐怖分子遭到追捕。這是怎樣天翻地覆的改變啊！他邀請他的白人看守作為嘉賓參加了就職典禮。這是他以自己的驚人方式做出的許多姿態的第一個，展示了他的高風亮節和博大胸襟。他將敦促同胞們為和解而努力，他將成為推動和解的強大力量，而和解將是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職責，他已經指定由這個委員會來處理我們國家的過去。這個曾經被污蔑詆毀、被當做危險逃犯遭受追捕的人，轉而成了寬容與和解的化身，讓那些曾經仇恨他的人心悅誠服。囚犯變成了總統，為全世界景仰、贊美和當做英雄般崇拜，成了國際上最受尊敬的國家元首。南非從未像1994年4月以后那樣接受過如此眾多的國事訪問。幾乎每一個國家元首都希望和我們的總統合影留念。

然而，我們還是不由得擔心，這一切會不會在我們眼前破滅。我們害怕國內某個地方的某個狂人可能會肆意妄為，顛覆整個談判進程。但是沒有發生。有很多事情出了問題，有些明顯是蓄意破壞整個計劃，但是沒有發生能夠阻止國家前進步伐的事件。

是的，全世界都看到了一個真正的奇跡出現在眼前。他們見證了這個幾乎是不可思議的事件。多少人擔心和預言的恐怖血洗沒有發生，這些令人吃驚的南非人—白人和黑人—共同成就了相對和平的過渡和權力的轉移。

我們在對非正義、壓迫和邪惡的抗爭中大獲全勝，我要在此對國際社會說，沒有你們的幫助、祈禱和對我們事業的支持，這樣的勝利是不可能的。我以極大的榮幸代表千百萬同胞說：“謝謝！謝謝！謝謝！我們的勝利真正就是你們的勝利。謝謝！”在英國劍橋大學的一次演講中，我曾說：“現在對南非產品的抵制已經解除。”講話后，一位中年婦女湊過來對我說：“大主教，我聽了您的講話，的確心悅誠服。但從小我的父母就教育我要抵制南非貨，我也教育自己的孩子抵制南非貨。所以即使現在買南非貨時，我還是感到惴惴不安，因為我的整個人都在說我做了什么錯事。”我想恐怕沒有哪一種事業能像反種族隔離那樣喚起那么巨大的熱情、那么無畏的獻身，也沒有哪個國家像我的祖國那樣得到那么多人、那么長期的祈禱祝福。在某種意義上，如果真有奇跡要發生，則非南非莫屬。

在我當選為大主教時，我為自己在任期內確定了三個目標。其中兩個與圣公會（新教）內部工作相關。其一即接受婦女擔任牧師職位，這在1992年得到批準，我們的教會也因此更為充實，更為祥和。另一目標是將大而無當的主教教區分解為較小的傳教單位（我未能得到教會的支持）。第三個目標就是解放我們的人民，無論白人還是黑人，我們在1994年做到了。

因此，我的妻子麗雅和我可以歡歡喜喜等著我1996年退休養老了。我們非常幸運，因為我們看到了我們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看到的事情，看到了我們的土地和人民從種族主義的鐐銬枷鎖中解放出來。

1975年我成為約翰內斯堡教長后，就以公開明確的立場參與了斗爭。1976年我曾致信時任首相的沃斯特先生，警告他黑人社區的憤怒情緒正在日益高漲。他對我的信不屑一顧。幾個星期后，索韋托發生了暴動，南非從此再也不是從前的面貌了。我在公共舞臺上活動了20年之久，現在政治進程已經實現正常化，我也該退出中心舞臺了。

我實在太向往老公民的退休生活了，但卻沒有料到，我們的主教會議、總統以及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合力打破了我們盡善盡美的退休計劃。

# 第二章 紐倫堡還是全民遺忘？  —第三條道路

在種族隔離制度下，少數白人獨霸政治權利，并因此而得到了其他各種權力和特權。他們用邪惡與卑劣的手段維持著高壓統治。這些白人利用所謂“單膚色統治”制度，聲稱人的價值在于其特定的膚色、種族特性和人種。既然具有這些特質的人為數不多，單膚色統治也就只能屬于全體人類中有限的少數人了。

在古希臘，本來聰明睿智的亞里士多德也犯下了同樣的錯誤。他認為人的特性并非每個人都普遍擁有，因為奴隸就沒有這樣的特性。奇怪的是，亞里士多德居然沒有注意到其觀點的無比荒謬。他的主張一定讓奴隸主大感寬慰，因為既然奴隸不像他們一樣是真正的人，那么奴役奴隸也就談不上殘酷，而是心安理得的了。（如此說來，重獲自由的奴隸會突然間得到人性！）古人相信如此不合理、不道德的思想尚可原諒，但種族隔離的實施者卻不是蒙昧的異教徒，因此不能以無知來開脫。他們聲稱自己是西方人，和西方人一樣文明，更有甚者，他們還是基督教徒。這是他們在反對制裁時竭力強調的一點。他們還成功地說服了輕信的西方，使其相信南非實際上是西方基督教文明對抗蘇聯共產擴張主義蹂躪的最后堡壘。他們讀《圣經》、去教堂—他們居然去教堂！我記得有一次和我的岳母驅車經過一個荷蘭新教教堂。她是家庭傭工，文化程度不過小學。教堂外的停車場上泊著幾十輛車，我指著這些車說，布爾人顯然是群敬畏上帝、虔誠禮拜的人。我的岳母笑了笑，輕聲說：“我的孩子，如果上帝像對待他們一樣對待我，我也會經常來做禮拜的。”

我們的人民常常對這不可思議的現實感到大惑不解，那些如此惡劣地對待他們的人居然不是未開化的異教徒，而是自稱為基督徒、和他們讀同一本《圣經》的人！因此，種族隔離的鼓吹者真的無法為其怪異的主張找到借口。他們和我們同讀的《圣經》講得非常明確，賦予人類—每個人都不例外—以無限價值的，不是這個或那個生理或其他外在特質。不，我們的價值在于我們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創造出來的。這是與生俱來的，是一個整體。它意味著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上帝的化身、上帝的總督、上帝的代表。這就是為什么，如果不能一視同仁地對待任何人就是名副其實地褻瀆上帝，就是向上帝的臉上吐唾沫。這也是為什么，我們會懷著滿腔熱情為正義和自由而戰。激勵我們的不是政治動機，而是《圣經》的信念。在非正義和壓迫的情況下，《圣經》成了最具顛覆性的書。

我們常常試圖指出種族主義的荒謬，希望我們的白人同胞能夠感到羞愧，并放棄這荒唐可笑的東西。例如，我會說我們不妨用大鼻子來代替膚色，因為我自己有個大鼻子。假設某大學不是像種族隔離制度下專為白人而開，而是為大鼻子設立的，首要的要求是鼻子要大，而不是學業。如果你不幸天生有小鼻子的殘疾，就必須向小鼻子事務部申請批準進入專為大鼻子開設的大學學習。大部分聽了我這個故事的人，都會為它的荒唐和愚蠢笑得前仰后合。如果現實也只是個笑料就好了。

我父親是小學校長。盡管做傭工的母親幾乎沒有文化，家庭收入也微薄得不值一提，但在種族隔離被國民黨政府制度化、系統化之前，我們還是得到了一定的庇護，免受了南非種族主義最嚴酷的迫害。我沒有什么政治意識，甚至認為種族主義的秩序是上帝的旨意。事情就是這樣，你最好還是老老實實地接受，不要多事。實際上，大部分人都極好地調整了自己，適應了哪怕是極端惡劣的環境。我們住在芬特斯多普。這個約翰內斯堡西邊的小鎮，后來因成為新納粹布爾人（AWB，或阿非利卡抵抗運動，形成于20世紀70年代末，反對對種族隔離的有限改革）的總部而臭名昭著。我常常從貧民窟到白人鎮上為父親買報紙。我總是能看到流浪兒在白人學校的垃圾桶里翻騰，并常常能夠找到白人孩子丟掉的完全可以食用的蘋果和三明治。白人兒童更喜歡媽媽為他們準備的食品，而不是政府為他們（不包括黑人兒童）提供的免費午餐。種族主義的畸形特性之一，就是那些沒有需要、自己可以負擔得起食品的學生可以得到免費食品，而那些急需高質量食品但買不起的孩子反而得不到免費午餐。這或許僅僅因為他們的父母無權無勢，在自己出生的土地上是隱形人，只有讓他們干活時，而且常常是做仆人時，才被人想起。我注意到了這種待遇上的差別，但不敢說那給我留下了什么不可磨滅的記憶。只是很久以后維爾沃德博士對黑人實施所謂“班圖教育”的劣等教育制，并停止在某些黑人學校發放免費食品后，我兒時的記憶才重新被喚醒。當被問及為什么停止這種相當經濟但可有效幫助最貧窮的人們戰勝營養不良的做法時，維爾沃德博士的回答令人瞠目結舌，盡管他的話完全符合種族主義和種族隔離的無理邏輯。他說，如果不能人人有飯吃，那么就誰也別吃。這真是登峰造極了！我們為什么不去救治那些患了肺結核的人呢？不行，我們不能這樣做，因為如果不能救治所有病人，我們就不該只救治其中一部分病人。之所以有這樣肆無忌憚的一派胡言，就是因為受害者沒有政治權利。他們無法把你選下臺。

在罪惡的通行證制度下，黑人的行動自由受到極大限制，每天都有許多人因此被捕。16歲以上的所有黑人都必須攜帶通行證。如果警察要求出示通行證而你恰好沒有帶在身上，就被視為違法，即使解釋你只是出來買包煙，通行證忘在辦公室的西裝口袋里，也無濟于事。整個制度就是要剝奪你的自我價值。黑人沒有權利進入城區，能進城完全出于其主子的慈悲和恩惠。每天都必須出示通行證，否則就得加入蔚為壯觀的戴上了手銬的違法者的長隊，而警察則等著湊滿足夠的人然后把他們塞進一輛輛軍車。這一切帶來的日復一日的當眾侮辱是難以言表的。這種軍車叫做載人面包車或Kwela-Kwela（來自警察用科薩語向他們的俘虜叫喊的“上來，上來”）。堂堂正正的人被關進慣犯的囚室，第二天又被法庭上辦案的出奇速度搞得大惑不解：每人兩分鐘，一種“載人傳送帶”式的正義。未及他們叫出“納爾遜·曼德拉”的名字，這些人就已經被認定有罪，并判處了過重的罰金或監禁。這種違反人權的遭遇是幾乎每一個黑人都曾經歷過的。

我還清楚地記得我曾陪伴做老師的父親進城。當他也被毫不例外地攔住時，我的心里是多么為他難受。不過也有蹊蹺的事。由于他受過教育，他有資格享受所謂的“豁免”，普通的通行證法對他不適用，他享受其他黑人沒有的特權，即可以購買專供白人的酒而不必擔心被捕。但為了讓警察知道他享受豁免，就必須攜帶并出示他的高級文件—豁免證。因此，他也無法免遭被攔住去路、被喝令出示豁免證的當眾侮辱。這讓我感到惡心。

我們的許多鄰居還遭受了更侮辱人的入戶通行證檢查。家是一個人的堡壘？根本沒有這回事。警察專挑最能讓人煩的凌晨時分闖進來，大叫大嚷著把人們轟下床，沒有一點起碼的禮貌：“Kom, Kom―maak oop, julle verdomde kaffers.”（快點兒打開！你們這些可惡的黑鬼！）衣不遮體的母親惶恐地瑟縮著，孩子們發出尖叫，做父親的則無力地站在那里，一點也沒有男子氣概，在自己的孩子面前喪盡尊嚴—好像他根本就不存在。在法律的眼里，他是無足輕重的，只有三等公民的最低權利。

降臨到頭上的常常不是什么大事、什么令人發指的惡行。不，那是一些日常的騷擾、瑣屑的無禮行為和細碎的侮辱—尊嚴不總是被踩到腳下，也不總是被長筒皮靴踐踏，盡管這樣的情況也同時存在。比如陪父親去商店時就經常碰到。父親是個有教養、有尊嚴的人，但柜臺后面的小丫頭竟張口叫他：“嗨，小子！”她這樣做僅僅因為她是白人。我的心為我的父親死了許多次。他常常不得不強扮笑臉討好沒有家教的壞孩子。我知道他對此無能為力，即使到別的商店，也會遭到同樣的對待。有時也有例外，但罕見得如煉獄中的冰雪。這種待遇貶低了我們的人民，深深地侵蝕了他們的自尊心。

我擔任教長、后來擔任大主教來到約翰內斯堡時，麗雅和我須經“批示”方可進入城區。我們必須到土著人事務專員辦事處，在通行證上加蓋適當的印章，以示在我就任教職期間允許我們住在約翰內斯堡。許多黑人必須排長隊等待，而白人主子們要么在談天、要么讀報、要么飲茶。等他們終于屈尊辦案時，也從不會以禮相待，而是吆三喝四，讓本來已經暈頭轉向的鄉下人更加無所適從。黑人官員的態度稍好一些。麗雅被允許作為我的配偶住在約翰內斯堡，她遭受的是雙重歧視—作為黑人，還作為婦女。她甚至享受不到黑人男性的那點可憐的權利。

在政府眼里，關鍵在于你是黑人，這是最重要的事實，而不是你其實也是人。如此這般，即使我擔任約翰內斯堡的大主教并身為諾貝爾獎得主，在緊急狀態下，我的夫人和女兒也有被攔截并在路邊被當場搜身的可能。由于我的抗議，這樣的情況沒有出現，她們得以被帶到附近的警察局進行搜身。如果這是他們給予黑人名人的慣常待遇的話，那么對其他地位卑微的黑人又有什么干不出來呢？我自問，當然更知道可怕的答案。

在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總報告所引述的一份材料中，后來成為憲法法院副院長的帕埃斯·蘭嘉大法官講述了他作為一個黑人的經歷。

我第一次和司法系統打交道還是……1956年在德班當工人的時候。正是在此期間，我感受到了1950年《人口登記法》第30號的某些條款、1945年的《土著合并法（城區）》第25號以及當時其他歧視性法律所帶來的痛苦、憤懣和侮辱。對我的直接影響是我為這一切的不公平、不公正深感失望。我無論如何也無法理解為什么種族這個因素可以決定我應該住在哪里、可以在哪兒工作。還是個十幾歲的孩子時，我從來不明白為什么我要住到男人的宿舍去，只有得到許可證才能到城里和父母一起住。……我正青春年少，意氣風發，認為我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什么都無法阻擋，但是我錯了。我的夢想遇到了種族隔離的嚴酷現實。它在我的周圍精心構筑了無理的、屈辱的，而且常常是敵對的環境，其意圖就是要打擊像我這樣希望為自己也為周圍的人改善境遇的人……

通行證法和進城控制條例是影響我早年生活的整個法規體系的核心……我和成千上萬的人一樣，排著似乎永遠沒有盡頭的長隊。排到頭時，一般遇到的都是蠻橫的小干事或官員，或許在你的“dompas”（當地指通行證的土話）上賞你一個什么驗證章。進城控制辦公室的整個程序令人痛苦而屈辱，有些方面甚至給成千上萬受其管轄的人造成了深深的侮辱。我記得作為一個17歲的孩子，我不得不扭過頭去，把眼光避開那些赤身裸體的成年人，徒勞地希望以此為他們挽回一點尊嚴。我們排在隊里的人都必須裸體，以方便這種有辱人格的檢查。如果在許可證的期限內沒有找到工作，就可能被土著事務法庭宣布為“閑雜班圖”，面臨被發送農場居住地的可能。許多人被送上這個法庭，并因為未能及時出示身份文件而被判刑……

但是，把這些明目張膽的歧視性和壓迫性法律寫入法典只是一個方面。其丑惡性又因執法的白人和黑人官員的粗暴、殘忍和麻木而變得無以復加。這是一種對前來辦理手續或求助的人的敵視和威脅的文化。當局的面目是對被剝奪了選舉權的人們的戰爭面孔，而人的尊嚴則是戰爭的犧牲品。

1948年當政伊始，種族隔離政府就開始了瘋狂的種族主義立法過程。他們廢棄了許多黑人城鎮，搬遷了許多安居的社區，把上帝的子孫都扔到了與垃圾場毫無二致的班圖斯坦黑人定居區。垃圾可以扔，人是不能扔的。但這恰恰就是他們給予按照上帝的形象創造出來的人的待遇，而這些人的罪過是生為黑人。他們把我們當物件對待。我們有一首戰斗歌曲：“Senzenina? — Isono sethu bubumnyama”（我們擁有什么？—生為黑人就是我們的罪孽）。國民黨把種族隔離發展到了極致—我們在居住、就學、娛樂和工作上均被隔離。我們被禁止跨種族婚配，跨種族的性事是禁忌，混血婚姻也是禁忌。就業保留制使黑人無法從事某些專為白人保留的職業—而今天他們則在大喊這樣的做法“令人惡心”。

350萬人被迫背井離鄉，這一無情的社會工程試圖攪碎南非這塊各種族融合而成的蛋糕。這些僅僅是統計數字，但強制遷移計劃的受害者卻是有血有肉的人啊！麗雅和我是在約翰內斯堡以西19公里處的黑人小鎮蒙謝韋爾的羅馬天主教堂結的婚。那座教堂連同許多居民住宅都被夷為平地，因為蒙謝韋爾注定是要拆毀的。這個行動是個走調的音符，是本應成為一片潔白百合的地區的一個污點。只是由于雷昂·維塞爾斯的干預，蒙謝韋爾才得以幸免。他是國民黨議員，后來為種族主義深表歉意，并出任為我們制定了出色憲法的制憲議會的副主席。但是，其他地方則沒有這么幸運。我生活或學習過的地方至少有五個—例如索菲亞鎮—就未能幸免。有一個人在約翰內斯堡當花匠，在一個村里為自己修建了一個不錯的小家。一天聽說他家的村子宣布要拆除，整個社區要遷移，他請求給他個照顧，并得到批準，他想親手拆掉自己多年來苦心營造的小窩。第二天早上，人們發現他已經吊死在樹上。他無法承受，他自殺了。

開普敦的桌山腳下，是市里最為熱鬧和時髦的部分，叫做第六區。過去這里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多種族聚居區，基督教徒、穆斯林和猶太人和睦相處，沒有什么種族主義事端。后來，國民黨掌權，通過名稱古怪的“社區發展部”，以種族和睦的名義，宣布第六區必須關閉。于是，有色人和非洲人都被遷移到離他們工作的市中心數英里之外的地方，被迫從寬敞的宅院搬進一個貧民小鎮擁擠不堪令人窒息的火柴盒式的房子里。我擔任大主教不久，就訪問了邦特赫維爾，一個種族隔離的毒瘤。在其中一個極小的蝸居里，住著我們教區的一個教友。老人1960年從第六區遷到這里，而當時已經是1986年了。那些沒有打開的塞滿家什的盒子箱子，在簡陋的房子里攤得到處都是。當我問他為什么沒有打開時，他回答說他等著回到第六區的家。那350萬人就是這樣的人。老人懷著破碎的心離開了人世，箱子依舊沒有開啟。

有人制作了一個題為“第六區”的音樂劇，描述開普敦這個區域的繁華以及后來如何屈從于種族隔離的瘋狂。我的一個屬下兒時曾住在第六區，看完表演回來后告訴我們，他禁不住流下了懷舊的淚水。他母親晚年時曾對他說她想回家，意思是要回到她第六區的舊宅。史蒂芬·奈都和他經商的父親及母親、姐姐從德班搬來。他父親發了財，在開普敦附近的立特里特蓋了幢大宅子。史蒂芬成為開普敦羅馬天主教大主教。我向他講述了我下屬的話，他反過來讓我猜猜他看了同一場演出時的感受—他也一樣痛哭流涕。社區發展部宣布他們居住的區域為白人區，因此奈都一家必須搬走。他的父親已經去世，守寡的母親請求當局讓他們留在自己的家里，但是徒勞一場。于是他們找到了與別人合住的一套一室單元房。白天他們不得入內，史蒂芬和姐姐只好坐在附近火車站的候車室里，直到允許他們回家的時候。聽了他的講述后，我突然意識到許多貌似正常的人，實際上都滿懷憤懣和痛苦的重負，而這不為別的，就因為他們不是白人。

我們全家從我留學的英國回國時，假道法國、意大利和圣地[[1]](#_1_1)。我們的目的地是東開普省的艾麗斯，我將在聯邦神學院執教。一到南非，我們就到東倫敦市為新居添置家具。午飯時間到了，我們知道沒有餐館讓黑人就餐，于是只好買了魚和薯條坐在停靠路邊的車上吃。幾個星期前，我們還可以在巴黎的上流餐館里享受法式美食，在我們自己的祖國卻辦不到。

我們經常到東倫敦的海灘上野餐。留給黑人的那塊沙灘景致最差，周圍只有很少的巖石。不遠處是個帶小火車的游樂場，在英國出生的小女兒這時就會說：“爸爸，我想蕩秋千。”我心里沉甸甸的，只能心虛地對孩子說：“不，寶貝兒，你不能去。”如果我的寶貝堅持要去，我又該怎樣回答她呢？“可是，爸爸，其他的小孩在玩呢！”我怎么能跟她說她不能去是因為她不是能去的那類人呢？我內心死去過許多次，不能直視孩子的眼睛，因為我覺得沒有了人格，受到了巨大的侮辱和貶斥。我現在體驗的一定是我父親在他的兒子面前被羞辱時的心情。

種族隔離系統地剝奪了有色人、印度后裔以及特別是黑人的權利，扼殺了他們的人性。它給這些人提供的是形同兒戲的教育，住房不足，醫療缺乏，使孩子們罹患原本極易預防的疾病；它通過合同工制和單性別宿舍，破壞了黑人的家庭生活。種族隔離無所不在，給其受害者造成了不必要的和無法言喻的痛苦。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每一個不是白人的人都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這一罪惡制度的迫害。黑人完全有權以滿腔仇恨，向白人以血還血、以牙還牙，聲討種族隔離的罪行。我們的新任司法部長杜拉赫·奧馬爾說我們是一個“受害者的國度”，這種描述在一定程度上的確恰如其分。但我們還要欣喜地宣布我們也是幸存者的國度，其中不乏以其寬宏大量的博大胸襟和崇高精神震驚了整個世界的杰出人物。

現在擔任美國凱洛格基金會牧師的馬魯斯·馬普爾瓦納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曾是一個熱情奔放的積極分子，在黑人覺醒運動中是史蒂夫·比科的密友。他和其他人一起，在貧困交加、頹廢絕望的農村社區中進行了至關重要的社區發展和醫療工作。因此，他和妻子被無孔不入的安全警察置于嚴密監視之下，并經常遭到騷擾。他們常常未經審訊就被關進監獄，他被處以五年禁行令，行動被限制在東開普城區內。正是在此期間，他設法甩掉了警方的盯梢，來到約翰內斯堡，在我的辦公室里和我見了面（當時我擔任南非教會理事會的秘書長）。他說在他頻繁地遭受拘留的那段時間，安全警察告訴他：“我們統治著這個國家。”當他們照例折磨他的時候，他常想：“這些人也是上帝的子孫，但他們卻像禽獸一樣。他們需要我們幫助他們恢復人性。”有這樣卓越的人加入其中，我們的斗爭必定會取得最后的勝利！

1994年4月27日是個轉折點，一個新紀元的開端。它預示著新的南非將如那些競選口號所說，成為一個民主的、無種族主義、無性別歧視的南非。這是一個嶄新的事物。殘酷壓迫和極端不公的種族隔離舊制度被廢除。我們很快就會發現，幾乎沒有人還會承認自己曾是這個邪惡制度的支持者。

受傷的人不會再因為風馳電掣奔向出事地點的救護車是專為救治另一種族的人而被遺棄路邊。再不會有人被迫離開家園，然后像垃圾一樣被拋進貧困的班圖斯坦家園（專為黑人設立）。上帝的子孫再不會受到把南非人口像牲口一樣分類的種族分類局的侮辱。（同一個家庭的成員經常被劃分成不同的種族，膚色稍深的被歸入較低級的一類。有些人寧肯自殺，也不接受這種荒唐專橫的分類。）孩子們再不用接受號稱為教育的那碗“薄粥”，這種教育實際上是要讓黑人兒童接受永遠的奴役，順從至高無上的白人主子。這一教育制度的始作俑者、種族隔離的高級祭司、后來擔任首相的維爾沃德博士，曾大言不慚地說過：

學校必須使班圖人（南非黑人）適應其經濟生活的需要……如果在實際中不能運用，把數學教給班圖孩子又有什么用？……教育必須依據人們生活中具有的機會而施教授業……[[2]](#_2_1)

我要說“再也不會了”，因為在新南非的確如此。我們再不可能合法地、秩序井然地通過立法，將無數人的生活從塵世打入地獄，因為新南非的至高權力不在議會，而在我們的新憲法，許多人都認為這是世界上最自由、最具人權取向的憲法。立法不能僅僅憑議會的癖好，而是要得到我們的最高法院—憲法法院的批準。誕生時間還不長的憲法法院已經表明，它能夠打擊一切有悖于憲法宗旨和條款的行為。憲法不是一紙空文，而是所有南非人通過其當選代表達成的莊嚴契約。

新的制度安排帶來許多新氣象。但是舊制度的某些方面還會茍延殘喘，好像沉重的裹尸布籠罩著新時代。誰也沒有那樣的魔杖，可以讓新制度的設計者手執著揮舞、嘴里念叨著“嘿，快變”，就會把南非在一夜之間變成到處流淌著鮮奶和蜂蜜的天國。持續半世紀之久并以殘酷手段得到有效加強的種族隔離制度的余毒，還會在今后的很長歲月中影響著我們。

許多南非人都對種族隔離有著可怕的記憶。他們忘不了1960年3月21日的沙佩維爾大屠殺。人們對通行證法進行和平抗議示威，警察驚慌失措，向人群開火，69人倒地身亡，其中許多是在逃跑時被擊中了背部。人們也忘不了1976年6月16日的索韋托起義。手無寸鐵的學生在反對將阿非利卡語定為授課語文的抗議游行中被射殺。（阿非利卡語被視為壓迫者和種族隔離執行者的語言，因為1948年實行種族隔離制的國民黨絕大部分人操阿非利卡語。）還有那些在被警察拘留期間神秘死亡的人。當局稱這些人自殺了，有的用皮帶上吊了，有的洗澡時踩在肥皂上摔死了，有的則從牢房或審訊室跳窗自殺。這些話可能大部分的白人是相信的，但卻根本無法讓黑人相信。我們還被告知有的人是自殘而死。黑人覺醒運動年輕的學生領導人史蒂夫·比科就是其中之一。據說1977年9月，他在和審訊者發生不可思議的無理爭吵時，以頭撞墻。史蒂夫被赤身裸體用警方的卡車驅車1500公里送到比勒陀利亞，據說是要接受治療，可是到達不久他就死了。誰也沒有解釋為什么不能在他被監禁的伊麗莎白港對他進行急救，或者為什么必須讓他赤裸著處在昏迷狀態下被送往比勒陀利亞。

人們記得1985年在夸祖魯―納塔爾省阿曼澤姆多蒂的爆炸事件。放置在一家購物中心外垃圾桶中的爆破彈，在忙著圣誕節采購的人群中爆炸，死5人，傷60多人。還有1986年的瑪古酒吧爆炸事件。羅伯特·麥克布萊德和兩個同伙在附近安放了汽車炸彈，死3人，傷69人。據說這是以鄰國博茨瓦納為基地的非國大武裝派別“民族之矛”首領下達的命令。

許多南非人看到用所謂“項鏈”酷刑殘忍地將人處死時，無不感到惡心。施刑時將灌滿汽油的輪胎套在受害者的脖子上，然后點火。這種可怕的處決方法是城里支持非國大的“同志”們用來懲治“叛徒”即被懷疑和國家合作的那些人的，也被用在交戰的各派解放運動的自相殘殺上，比如被禁的大部分由非國大的同情者組成的聯合民主陣線（UDF）和主張由史蒂夫·比科發起的黑人覺醒運動各項原則的阿扎尼亞人民組織（AZAPO）之間的爭斗。令我們無比震驚的是，人，年輕人，居然能圍在這樣一個痛苦掙扎的人周圍起舞。種族隔離既剝奪了實施者的人性，也剝奪了受害者的人性。在這一點上，種族隔離做得真是太成功了。

人們為1983年5月比勒陀利亞教堂街上的屠殺所震驚。巨型炸彈在南非空軍總部外爆炸，死21人，傷200多人。非國大宣布對此次爆炸負責。最晚近的則是1993年7月開普敦圣詹姆斯教堂的大屠殺。在那次襲擊中，泛非大會（PAC）—即1959年脫離非國大的解放運動—兩名成員沖進星期天的禮拜儀式，用機關槍殺死了11名教徒，傷56人。在這場城市游擊戰中，似乎已經無所謂神圣可言。

這些以及其他類似的暴行充斥于我們的歷史，各方面都認為我們應該認真對待這段歷史、這段過去。我們不能裝作這一切并未發生，許多事情人們還記憶猶新。

實際上，對于向新的制度安排過渡時我們是否應該有效處理既往歷史的問題，并不存在異議。不，問題不在于是否應該，而在于如何處理仍歷歷在目的過去。

有些人希望借鑒紐倫堡審判的模式，將所有嚴重違反人權的罪犯都捉拿歸案，讓他們經受正常司法程序的煎熬。結果發現這條路根本行不通，也幸好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盟軍徹底打敗納粹及其軸心國，因此得以實施所謂“勝利者的正義”。被告一方毫無發言權，而且由于坐在審判席上的如俄國人本身也是人權的嚴重違反者（在斯大林時期有過之而無不及），整個審判過程讓不少德國人耿耿于懷。紐倫堡審判50年后，我參加英國廣播公司電視臺在紐倫堡當年的審判廳里舉辦的專題討論時，仍有這樣的感覺。德國人接受了紐倫堡，因為他們一敗涂地，勝利者可以在被打翻在地的敗軍身上再踏上一只腳。在南非，任何一方都無權實施勝利者的正義，因為沒有一方取得了可以賦予這種權利的決定性勝利。因此，紐倫堡方案被那些為向民主、法治和尊重人權過渡而進行艱難談判的人拒絕了。

有一點是明白無誤的，如果種族隔離的安全部隊認為在談判結束時他們仍將作為肇事者面臨法律的嚴懲的話，他們就不會支持使我們得以實現從壓迫到民主的相對和平過渡這一“奇跡”的談判解決方案了。（當時多少人作出了可怕的預言，認為會發生血洗事件，我們會被全面的災難壓倒。）他們仍掌握著槍桿子，仍然有能力破壞整個過程。

作為和平過渡的受益者，有些南非人，還有一些國際人士，喜歡喋喋不休地抱怨沒有將所有罪犯繩之以法。事實上，我們都很健忘。我們忘了1994年之前我們一直焦慮不安，一場全面的災難如在弦之箭，一觸即發。由于上帝的慈悲，我們得以幸免。那些享受著新制度安排的人過早地忘記了這一切原本多么脆弱、多么渺茫，忘記了整個世界仍然以驚異的眼光注視著這一奇跡的展開。奇跡是談判解決的結果。如果談判一方堅持將所有肇事者送上法庭，就不會有談判解決，也不會有民主的新南非。紐倫堡后盟軍可以打起鋪蓋回家，我們南非人可是要朝夕相處的！

正因為如此，我們的首席大法官伊斯梅爾·馬霍麥德在他擔任憲法法院副院長期間，當有人對法律中的大赦條款提出違憲質詢時，他才能夠贊許地引述馬爾文·弗蘭克爾大法官在其所著《走出黑夜的陰影：為國際人權而戰》 [[3]](#_3_1)一書中的話：

懲罰人權罪犯的要求，可能帶來復雜而棘手的問題，因為沒有單獨的或簡單的解決方案。盡管關于紐倫堡審判的爭論仍在繼續，但那段歷史—對戰敗國的戰爭罪犯進行審判—與一國審判自己的罪犯時遇到的可能分裂國家的微妙而危險的問題相比，就是小巫見大巫了。

一個在壓迫性政權下分裂的民族，不可能在壓迫一結束時就能突然達成團結一致。人權罪犯是公民同胞，和每個人朝夕相處，他們可能有權有勢，而且異常危險。如果軍隊和警署曾是恐怖的化身，那么士兵和警察也不會一夜之間變成尊重人權的典范。他們的數量和對殺傷性武器的精通仍然是生活的重要現實……士兵和警察可能在等待時機，陰謀卷土重來。他們也可能希望保住或贏得大眾的同情。如果對他們太過嚴厲—或者法網撒得過寬—就可能事與愿違，正中了他們的下懷。但是，他們的受害者不能簡單地寬恕和忘卻。

這些問題不是抽象的大話，而是當今十幾個國家面臨的嚴酷現實。如果像我們希望的那樣有更多的國家擺脫了恐怖政權，那么類似的問題還會不斷出現。由于情況各異，問題的性質也各不相同。

馬霍麥德大法官接著談到南非的局勢：

要想成功地談判過渡，過渡的條件就不僅應該得到被迫害一方的同意，也應該得到因為向“以自由與平等為基礎的民主社會”［引自憲法］的過渡而感受到威脅的那些人的認同。如果憲法永遠保留著不斷反擊和復仇的可能性，那么就可能永遠得不到因落實憲法而受到威脅的人們的認同……[[4]](#_4_1)

紐倫堡審判的方案之所以不為南非的談判者青睞，還有其他令人信服的重要原因。那些原因會給本已負擔不輕的司法系統添加更加難堪的重負。我們有過這類案件的經驗，比如1995年和1996年對前警察局死刑隊頭目尤金·德考克的公訴，然后是1996年對前國防部長馬格紐斯·馬蘭將軍及其他一些將軍和軍官的公訴。司法部和安全部門（警察）調集許多人力、歷時18個月才成功地將德考克送上法庭，由于他曾擔任公職，國家不得不負擔其高達500萬蘭特的法律費用，此外還有訴訟及訴訟機構和證人保護計劃的費用。在馬蘭及其同案犯的案件中，公訴失敗，而費用則達到了天文數字，幾近1200萬蘭特（200萬美元），也由國家來負擔。在一個資金緊張，教育、醫療、住房等諸多領域問題重重、亟待解決的國家，必須在國家能夠負擔什么的問題上作出艱難的抉擇。

我們也不能允許這類侵犯人權案件的細節向大眾傳播的時間過長，因為這會讓許多人悲傷沮喪，對脆弱的和平與穩定造成過大的干擾。我們當然做不到像納粹的“追殺者”那樣直到50年后的今天仍然窮追不舍。我們必須平衡正義、責任、穩定、和平與和解的各種要求。我們完全可以實行冤冤相報的正義，讓南非倒在廢墟中—如果這也稱得上勝利，那就真是皮洛士的勝利[[5]](#_5_1)，得不償失了。

審判方案不可行的另一些重要原因在于舉證困難。刑事法庭需要案件中涉及的證據經過極嚴格的審查，且必須就案件提出確鑿無疑的理由。在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處理的許多案件中，事件的唯一幸存證人就是罪犯本身，而他們又利用國家的大量資源銷毀證據，掩蓋其罪惡行徑。最令人不堪忍受的是，在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調查過程中，我們發現種族隔離的支持者一有機會便謊話連篇。上至內閣部長、警察局局長，下到無一官半職的普通支持者，無一例外。他們撒起謊來肆無忌憚、毫不動搖，就像在趕就要過去的時髦。法庭上常常是一個不知所措的受害者與幾個肇事者對質，后者一般都是警官和武裝部隊的軍官。他們后來在申請大赦時，承認作了偽證。（委員會與法庭相比被證明是取得真相的更好途徑：大赦申請者必須表明他們已經披露了全部事實，方可獲得赦免，因而正常的法律程序倒了過來，申請者不再極力推卸披露全部事實的責任。）大法官或地方法官必須有非凡的勇氣，才能在白人警官的陣營前，對一個孤獨的證人、一個黑人作出有利的判決。

難怪司法系統在黑人中間臭名昭著。人們認為大法官、地方法官和警察沆瀣一氣，讓正義流了產。直到最近，所有地方法官和大法官仍然都由白人擔任，他們認同白人同胞的思想和偏見，享受著種族隔離給他們提供的巨大特權，因此認為任何反對現狀的行為都是共產主義煽動的結果。他們一般都支持政府的行政和立法部門，反對被法律排斥在其祖國的管轄之外的黑人。舊制度中的許多大法官都是厚顏無恥的政治受聘者，心甘情愿做不公正制度的同謀，因此對司法制度的名譽毫無補救之功。當然，其中也偶有例外，但總的來說，籌碼是大大不利于黑人原告或被告的。需要一段時間才能恢復南非黑人對名譽掃地的警察和司法系統的信心。

在此我更應該引述馬霍麥德大法官的精辟判斷：

每一個正直的人一定都極不樂意接受這樣的結局：邪惡行為的肇事者得以逍遙法外，其自由得到不受憲法制約的大赦的保護。但是使我們選擇這條途徑的各種情況值得我們仔細琢磨。在那些暴行和酷刑發生的年代里，有關監禁和犯罪調查的法律以及為調查提供信息的方法和文化，都不易進行公開調查、取證和糾正。在這個可恥歲月中發生的一切大都籠罩在神秘之中，不易展示事實和證據。親人失蹤了，有時不知原委，其中大部分已不在人世，不能再講述他們的遭遇。其他人要么自由遭到侵犯，尊嚴受到打擊，要么在留下深重創傷的內訌和沖突中，名譽受到極為不公的詆毀。惡魔與無辜常常同是受害者。秘密和專制掩蓋了真相，把它們藏進了我們歷史的陰暗旮旯中。記錄難以獲取，證人要么身份不明，要么死了，不能或是不愿出庭。最后剩下的，就只有對親人的傷心記憶和本能的懷疑。幸存者因此承受著深重的創傷，但同時他們又無法將自身的感受轉化成經得起法律考驗的客觀和確鑿的證據……[[6]](#_6_1)

因此，很多案件缺乏證據，還有一些則因為訴訟時效、因為犯罪發生的時間過于久遠而受到影響。馬霍麥德大法官在其判決中也指出了這種司法僵局造成的后果：

如果不赦免犯罪的人，使其免于刑事訴訟，那么另一條出路就是為某些人保留抽象的訴訟權，但又沒有足夠的證據勝訴，繼續讓許多案件中受害者的家人不明真相，不知道他們的親人究竟出了什么事，使他們對真相的渴求永遠得不到滿足，使他們永遠無法平息心中的義憤和痛苦；與此同時，肇事者可能保住了自由之身，但卻無法成為新秩序的積極、全面和開創性的參與者，因為他們內心混雜著迷茫、畏懼、內疚、不安，有時甚至是驚恐。[[7]](#_7_1)

因此，審判作為處理歷史問題的各種可能方式中的極端方案，被否決了。

還有些人反對審判的方案，輕描淡寫地說我們應該讓過去的事就過去吧。這一方案是前政府及執行其命令的安全部隊所竭力尋求的。他們吵吵著要一個一攬子方案或是全面大赦，就像在智利，皮諾切特將軍及其追隨者對自己實行大赦，并以此作為放棄軍管、將政權移交平民政府的先決條件。盡管他們同意任命一個真相委員會，但委員會只能關起門來審案，而且不能審查皮諾切特將軍本人及其政府和安全部隊的檔案，即使審查也不是為了定罪。皮諾切特將軍以及政府和軍官寬恕了自己：只有他們知道自己的所作所為；他們集被告、原告和法官于一身。由于智利大赦的宗旨不像南非那樣是為了確定責任，我堅決支持最近對皮諾切特將軍的引渡請求。我們不能容忍罪犯不僅可以決定是否赦免自己，甚至還不允許他人質疑他給予自己大赦的依據以及所赦免的罪責。

南非的情況則是不實行全面大赦。每一個參與迫害行動的人都必須單獨提出申請，并接受一個獨立小組的審查，由它決定申請人是否符合獲得赦免的苛刻條件。除了上述原因之外，人們也強烈地感到普遍大赦等于遺忘，有人指出，我們任何人都無權說“讓過去的事過去吧”，然后揮手間一切就真的過去了。我們的共同經驗其實恰好相反—過去的一切不是消失了、沉寂了，而是令人尷尬地頑固存在著，它將不斷回過頭來糾纏我們，除非我們徹底地解決一切。我們必須直面禽獸，否則它就會反過身來要挾我們。

英國人和阿非利卡人（荷蘭、德國或法國胡格諾教派的白人定居者）在南非的歷史就是一個恰如其分的實例。在20世紀初的英布戰爭中，英國人把20萬布爾人，包括布爾婦女、兒童和在布爾人農場上干活的黑人勞工，關進了當時英國人的新發明—集中營，這在后來希特勒瘋狂推行純雅利安血統對猶太人進行大屠殺時變得臭名昭著。大約5萬名囚犯在非人的條件下死去。戰爭結束后，交戰雙方都沒有坐下來討論戰爭這個方面的問題。當時留下的創傷似乎隨著時間的推移已經撫平，英國和阿非利卡的定居者似乎和睦地生活在一起。但是，在表面的友好下面，他們的關系實際上并不穩定和輕松。1998年，我從慕尼黑去達沃斯參加世界經濟論壇會議。陪伴我的是一個年輕的阿非利卡人，他說他還清楚地記得祖母對他講述的在集中營里發生的種種悲劇，一想起這些故事，他就覺得愿再打一次英布戰爭。

在紐倫堡附近的前達豪集中營建有一個紀念館，紀念當時在這里發生過的一切，可以看到毒氣室和火化猶太人尸體的焚尸爐。毒氣室看上去平淡無奇，好像普通的浴室，直到你看到將致命毒氣注入浴室的噴頭。紀念館里的一些照片顯示，囚犯們跟在銅管樂隊后面將難友送去處決—真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幽默。德國人是那么有章法、有系統。他們將一切記錄在案，包括他們進行的人類忍受力實驗—當然實驗品是“劣等的”、非雅利安的猶太人囚犯。照片將一切都擺在我們眼前，一張張痛苦萬分的臉扭曲成了怪獸的模樣。

紀念館入口處上方，哲學家喬治·桑塔亞納的話發人深省：“忘記過去的人，注定會重蹈覆轍。”那些在南非為我們的未來而談判的人懂得，除非我們承認過去并加以妥善處置，否則過去就可能毀掉我們的未來。

全民遺忘之有害無益，還有另一個顯著的原因。選擇這條路無異于讓種族隔離的受害者再次成為受害者。這意味著否認作為其自我重要部分的那段經歷。智利劇作家阿利埃爾·多夫曼寫過一個題為《死亡和少婦》（Death and the Maiden）的戲。少婦的丈夫剛被任命為國家真相委員會的成員。她正在廚房忙碌的時候，有個人的車拋了錨，進來求助。少婦看不到他，但可以聽到他的聲音，并認出他就是幾年前自己被拘留時折磨和強奸她的那個人。下一幕中那個人被綁了起來，無助地等待她發落。她舉槍對著他，真想一槍把他打死，因為他拒不承認他會做出這樣的事來，而且不斷地找出借口證明自己不在現場。僵持很久之后，他終于承認他就是肇事者，但奇怪的是，她把他放了。他的矢口否認擊破了她的心底、她的完整性和她的自我，而這一切都是和她的經歷、她的記憶密切相關的。否認顛覆了她的人格。她其實就是她的記憶，猶如一個早老性癡呆癥患者不再是那個我們曾經熟悉的同一個人。

我們的民族力圖恢復和肯定那些長期被迫緘默不語、被變成了無名氏和邊緣人的受害者的尊嚴和人格。現在，通過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他們將有能力敘述自己的故事、喚醒自己的記憶，并在公開的訴說中，使其個性和不可剝奪的人格得到承認。

當聽取受害人的證詞時，由于我們不是刑事法庭，我們是依據平衡各種可能性來確定事實的。既然立法賦予我們權利，讓我們恢復受害者的人性和公民尊嚴，于是我們允許那些前來作證的人用自己的話講述自己的故事。我們盡了一切努力來證實這些故事，但我們很快發現，正如憲法法院大法官奧比·薩克斯所指出的，真相也有不同的種類，而且并不相互排斥。既有可驗證、可記錄的法醫鑒定的事實性真相，也有“社會性真相，通過交流、討論和辯論達成的經驗真相”。[[8]](#_8_1)個人的真相，即馬霍麥德大法官所說的“受傷的記憶的真相”是可以撫平創傷的真相，而真正的法庭則往往可能讓許多沒有受過教育、頭腦單純的證人，更加困惑，創痛更深。但是，很多人都可以證明，來到委員會面前陳述對他們都起到了明顯的醫治功效。我們是在不經意間從科拉多克四人幫成員之一的弟弟那里了解到這一點的。科拉多克四人幫是支持非國大的積極分子，他們離開科拉多克的家到伊麗莎白港參加政治集會，被警察殘酷殺害，再也沒能回家。那個弟弟在其親戚到委員會的第一次聽證會上作證后，在負有責任的警察坦白并申請赦免之前，對我說：“大主教，我們在幾個場合向許多人講過我們的故事，對報紙、電視都講過。但這是我們講述后第一次感到卸下了肩上的重擔。”

我們國家的談判者選擇了“第三條道路”，避免了紐倫堡審判和一攬子大赦（或全民遺忘）的兩個極端。這第三條道路就是赦免具體個人的罪責，以換取對與赦免相關的罪行的完全披露。以可能獲得自由之胡蘿卜換取真相，而大棒則是已捉拿歸案的將面臨長期監禁，仍逍遙法外的則面臨著被捕、起訴和牢獄。

委員會的重點和大部分工作都和嚴重違反人權案的受害者及幸存者相關—聽取他們的陳述，調查他們的證詞，讓他們其中一部分人有機會公開講述他們的故事，起草補償與和解建議書提交政府。但是，政治家們就大赦達成的協議，使大赦和為處理赦免申請而成立的委員會，成為我們運作的一個關鍵組成部分。

第三條道路也提出了一些重大問題，例如，這種方法會不會讓人覺得可以得到大赦，因而鼓勵了犯罪呢？罪犯僅僅抱歉并當眾受辱就夠了嗎？正義怎么辦？由于大赦一筆勾銷了申請成功的人的民事和刑事責任，那么剝奪受害人向罪犯和國家要求民事賠償的權利是否公平？

我在后面會談到這一點，但結束本章時我想指出，有條件大赦的第三條道路符合非洲式Weltanschauung（世界觀）的中心特點。這在恩古尼語族中叫ubuntu（烏班圖），在索托語中叫botho。是什么驅使這么多人選擇了寬恕而不是要求賠償，選擇了寬宏大量而不是復仇呢？

Ubuntu很難用西方語言表達。它表述的是人之為人的精髓。當我們高度贊揚一個人時，我們說“Yu, u nobuntu”，即“嘿，某某人有ubuntu”，意思是說這個人慷慨、好客、友好、體貼和熱情。他把自己的所有與他人分享。這也意味著我的人格和他的人格緊緊相連，密不可分。我們綁在一種生活中。我們說：“一個人的為人是通過他人表現出來的。”不是“我思即我在”，而是“我之為人因為我有歸宿”。我參與，我分享。一個有ubuntu的人開朗而樂于助人，他或她肯定別人，不因他人的能干和優秀而感到威脅，因為他或她懂得自己屬于一個更大的整體，并由此具備了充分的自信；當其他人被侮辱、被貶損時，當他們被折磨、被壓迫或被低人一等地對待時，他或她也會感到這種屈辱。

和諧、友誼和共享都是善行。社會和諧對我們來說是最大的善行。任何顛覆或破壞這一為人神往的善行的事，都應該像躲避瘟疫一樣極力避免。氣憤、反感、復仇的渴望，甚至于通過惡性競爭獲得的勝利，都會侵害這一善行。寬容不只是利他，也是最好的利己形式。使你失去人性的東西必然使我也失去人性。寬容使人們堅韌，使他們在經歷種種剝奪其人性的行徑后能夠生存下來并保持自己的人性。

Ubuntu意味著即使種族隔離的支持者，也是其實施和狂熱支持的制度的受害者。無論種族隔離暴行實施者愿意與否，其人性和遭迫害的人的人性糾纏在一起。在以非人的方式對待他人、給他人施加無以名狀的痛苦時，施行者也必然失去了人性。我曾說壓迫者人性的損失如果不是超過也絕不亞于被壓迫者，而許多白人都認為這不過是那個他們恨之不及、不負責任的圖圖煽動仇恨的另一個口號。然而，吉米·克魯格先生談到史蒂夫·比科之死時令人膽寒的冷言冷語卻為我們提供了精彩的例證。他在一次集會上開玩笑說，史蒂夫·比科是死于絕食抗議，這說明他在南非有自由，他如果愿意，就可以自由地把自己餓死。他說史蒂夫·比科的死“讓我無動于衷”。你不能不問，能這樣隨便談論另一個人類同胞之死的人，他的人性哪里去了？

當肯尼亞迎來自由和獨立時，很多人都認為毛毛將發起運動，通過瘋狂的復仇把肯尼亞變成白人的墳墓。然而，肯雅塔總統那么受人愛戴，因此他的去世引起了不小的擔憂。人們擔心肯雅塔之后肯尼亞會變成什么樣子。獨立后的肯尼亞ubuntu無所不在。在津巴布韋，經過極為殘酷的叢林戰后，穆加貝在1980年贏得大選前夕，大談和解、恢復和重建，讓眾人大為驚異。這也是ubuntu在起作用。在納米比亞，當西南非洲人民組織在第一次民主選舉中取勝后，努喬馬用他迷人的笑臉討好著每一個人。對白人沒有復仇。這是ubuntu在顯形。

當然，情況并非都是如此。20世紀60年代初的比屬剛果，ubuntu哪里去了？1994年為什么盧旺達人忘記了ubuntu，而是相互殘殺，讓可怕的種族殺戮籠罩其美麗的國土？我不知道，只是要說ubuntu不是一個機械、自動和必然的過程，我們南非人幸運地擁有一批不只是黑人而是各種族的卓越人物。比勒陀利亞的約翰·史密特先生之子死于非國大搞的一次爆炸事件。史密特先生是阿非利卡人，人們大都認為，他一定會對被種族隔離政府稱為共產黨煽動的恐怖分子滿腔憤慨和敵視。當史密特談到他兒子的死時，他的一番話讓人肅然起敬。他說他不氣憤，如果氣憤，也是針對種族隔離政府的。他相信他兒子的死，為我們從壓迫和非正義到民主和正義的過渡作出了貢獻。變革的時候到了。

[[1]](#_1) 指梵蒂岡。—譯注

[[2]](#_2)《圖片中的南非歷史：真實的故事》（Illustrated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The Real Story），開普敦，讀者文摘出版社，1988年。

[[3]](#_3)Out of the Shadows of Night: The Struggle for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馬爾文·弗蘭克爾與艾倫·賽德曼著，紐約，Delacorte出版社，1989年。

[[4]](#_4) 南非憲法法院，案卷CCT 117/96號（1996年7月25日），“阿扎尼亞人民組織（AZAPO）等VS南非總統等”。

[[5]](#_5) 古希臘伊庇魯斯國王皮洛士，在與羅馬軍隊的一次會戰中雖獲勝，但代價同樣十分慘重。“皮洛式的勝利”遂成西方諺語。—編注

[[6]](#_6) 南非憲法法院，案卷CCT 117/96號（1996年7月25日），“阿扎尼亞人民組織（AZAPO）等VS南非總統等”。

[[7]](#_7) 同上注。

[[8]](#_8) A. 博萊恩（Alex Boraine）與J. 列維（Janet Levy）合編：《一個民族的康復？》（The Healing of a Nation?），1995年。

# 第三章 時機已到

為什么南非在此時而非彼時出現了轉折呢？

《新約·加拉太書》中圣保羅在給新使徒的信中使用了一個妙語：“時機已到。”[[1]](#_1_3)保羅講耶穌誕生的時機恰到好處，一切都各就各位，諸種前兆都已具備，一切都在恰當的時刻發生了。提前一點會過早，拖后一點又會太遲，當一切發生時，就只有此刻，沒有彼時。

20世紀90年代，自由在最為意想不到的地方爆發了—1989年柏林墻倒塌，共產主義大廈由于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與開放而傾覆。在其強硬派前任如勃列日涅夫的時代，所有這一切變化都不可能發生；如果當時全球的地緣政治圖景沒有變化，那么其后的一切要么不可能發生，要么會付出慘重得多的生命代價，造成更大的動蕩和不安。

在南非，強悍兇惡的共產主義帝國—即里根所說的“邪惡帝國”—的瓦解是促成我們多災多難的國家發生變化的因素之一。種族隔離政權成功地哄騙了輕信和聽話的西方，讓他們相信南非的確是非洲對抗共產主義的最后堡壘了。到1990年，種族隔離政府再沒有理由聲稱必須使用壓迫手段根除共產主義的泛濫，因為共產主義已經根除。

在這世界和南非歷史的關鍵時刻，我們得到了無限的祝福，德克勒克替代頑固不化的博塔擔任了南非總統。1985年，博塔錯失良機，在本該破釜沉舟宣布改革的時候，卻把本來是響炮的重要講話變成了一記蔫炮。很難設想頑固如磐石的博塔會像德克勒克那樣，于1990年2月2日在議會宣布讓整個世界既震驚又不敢相信的大膽舉措：南非的政治進程將實現正常化，解除對政治團體的禁令（1960年沙佩維爾大屠殺后實行的禁令）；非國大、泛非大和南非共產黨將被允許作為合法團體開展活動，南非將努力走出種族隔離不公正和壓迫的牢籠。

德克勒克當時的言行為他帶來的巨大功績，是無論如何都無法抹殺的。他在南非的歷史上為自己找到了一席之地。無論他這樣做出于何種動機，無論我們如何評說他后來的所作所為，我們都應該為他在1990年的作為而向他致敬。

我相信，如果他沒有做出他已做的一切，我們就會歷經許多人預測的、使南非在劫難逃的血腥屠殺。要說服白人社會，讓他們接受通過談判交出其獨攬的政權，是需要極大勇氣的。很少有選民會擁戴要把政權交給世仇，并以此為政綱的候選人。德克勒克先生當然沒有這樣直言不諱。他講的是權利分享，讓本來不中聽甚至不可思議的事情，變得對選民來說不那么刺耳。他是在拿自己的政治生涯冒險，我們如果不因此贊揚他，就太過失禮了。他本來也許希望通過談判為白人找到一個位置，使他和追隨者得以行使否決權。他也可能希望以三駕馬車的方式，輪流當政。但無論怎樣，在我們歷史的關鍵時刻，出現了他這個敢于冒險、勇于前進的人物，這就是我們的幸運。

當然，如果他的對手不能夠順應時代的挑戰，這一切也毫無意義。如果德克勒克先生遭遇的是一個身陷囹圄、滿腔仇恨、誓死復仇的人，他很可能不會宣布其改革計劃。幸而他遇到的是被造就成有良知和卓越品質的人。納爾遜·曼德拉在獄中贏得了無比的聲望，以至許多人擔心如此圣人只會讓那些對他崇拜得五體投地的人大失所望。實際上，有傳言說其運動內部已有人策劃謀殺他，因為他們害怕整個世界會因為他不能與形象相符而深深失望。他們擔心，非國大可能失去因整個世界為其獄中領袖勾畫的高于生活的形象而贏得的巨大國際支持。

我們沒必要擔心。德克勒克先生遇到的不是一個一心復仇，誓死讓白人以血還血、以牙還牙的人。他看到的是一個有著高風亮節、寬宏大量的人，是一個渴望獻身于讓種族隔離、不公正和種族主義苦痛離間了的人們實現和解的人。納爾遜·曼德拉出獄時不是滿口聲言仇恨和復仇的人。他成了和解與寬容的英雄化身，讓我們所有人驚異不已。誰也不會因為他大談和解與寬容而指責他。被捕前他就受過長期騷擾，無法過正常的生活，1990年2月11日被釋放出來之前，他已在監獄度過27個春秋。誰也不能說他不懂得何謂痛苦。

在一張著名的照片里，他在羅本島和沃爾特·西蘇魯以及背景中的其他人，坐成一行，在庭院里敲石頭。這種完全徒勞的苦役，可以以其毫無意義而毀掉意志稍弱的人。我們也知道，他的視力因在采石場做苦役暴露在強光之下而受到嚴重損傷。一切手段都用上了，就為摧毀他的意志，讓他充滿仇恨。但是，制度灰溜溜地敗下陣來。他再次出現時，仍是完整的人。

說這27年純粹是令人痛心的浪費并不難：想想他本來可以為南非、為世界作出多少貢獻啊！但我不這樣認為。這27年和其中的種種苦難是淬煉鋼鐵、去蕪存菁的熔爐。或許沒有這種痛苦，他還不能像現在這樣激情滿懷、胸襟博大。痛苦和其他因素一起讓他獲得了其他任何方式都無法賦予的權力和威信。一個真正的領袖必須有機會向他或她的追隨者表明，他或她的整個事業不是為了個人的功名，而是為了他人的利益。而最具說服力的莫過于痛苦。

外人很容易認為，既然曼德拉是這樣一個舉世矚目的道德巨人，他只消說句話就能讓眾人蜂擁相隨。這是錯估了非國大的性質和他作為黨員的無比忠誠。非國大和其他類似的政治集團一樣，其實是不同政治、哲學、主張、觀點的大聯盟。它1912年成立，團結了一大批非洲人領袖，聯合抵制新成立的南非聯邦對他們在政治上的排斥以及白人聯邦政府對黑人控制的擴張。在整個斗爭歷程中，黨內始終存在著各色人物、各種派別和組織，從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到徹底的自由主義者，無所不包。有一聲令下便會沖向巴士底獄的土耳其青年，也有老成持重、溫文爾雅的學者。1990年解除黨禁時，其領導人是奧利弗·坦博，他為團結處于流放期間的運動成員作出了卓越貢獻。他和其他領袖人物必須把大家凝聚在一個組織里，他們中既有流放者和在南非境內的地下積極分子，也有剛從多年的監禁中放出來的囚徒。能把這樣一個由各路英雄組成，而且以協商一致即所謂“接受使命”為信條的黨聚攏在一起，的確是了不起的功績。看到人們如此認真地對待參與式的運作，對他們中間最不起眼的小人物的意見也給予同樣的重視，的確令人欣慰。但是，這也可能妨礙主動性，使整個組織不得不遷就最為遲緩的人的步調。（我漸漸認為，曼德拉先生對黨的忠誠的確可嘉，但是有些過分，并成為他的主要弱點。他一般不愿在黨內未達成協商一致之前采取行動，他們在獄中就是這樣運作的，在獄外他也要照舊如此。這使他在內閣中甚至保留了被公認為是榆木疙瘩的人物。也許他擔心自己出身貴族，容易倨傲武斷，因而努力避免表現得獨斷專行。）

在這樣的一個政黨內，不可能保證心平氣和地就所有問題達成一致。在經歷了如此深重的苦難后，所有黨員能夠同意違反人權的罪犯可以免予起訴、逃脫嚴懲，這顯然不是自動的行為。非國大甚至在究竟要不要談判的問題上都必須認真決策。許多年輕黨員常常頭腦發熱，極易迎合同齡人的憤怒情緒。我記得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指控博塔先生蔑視傳票，拒不到庭。一天，一個場場審判必到的年輕人在午間休息時對我說：“大主教，這個老頭［指博塔］該送進監獄，哪怕幾天也行。”當我反對說博塔年事已高時，他反駁道：“他應該感受一下我們的領導人經歷的一切。再說，他們不是也關押了奧斯卡·姆佩塔嗎！”（姆佩塔先生是西開普的一個領導人，盡管他當時已80多歲高齡且患有糖尿病，但還是被拘留了。）

還有其他政治組織力圖表現得比非國大更為激進，反對任何與“敵人”談判的建議，并視此為軟弱的標志。泛非大及其武裝組織阿扎尼亞人民解放軍甚至在談判進行期間仍在堅持武裝斗爭。非國大內部也有人對此表示同情。曼德拉必須和所有這些人進行競爭。

他需要極大的政治勇氣、技巧和權威，才能領導其組織與他同行。幸運的是，他和其他領導人都認為應該走這條路。曼德拉先生也得到了黨內對年輕黨員具有號召力的一些激進分子的幫助和支持。例如，頗受尊敬的共產黨總書記喬·斯洛沃就堅決支持整個談判、妥協與和解的進程。他為說服狂熱分子接受所謂“夕陽條款”，保證前政權的政府官員或公務員在過渡時期不失去工作，作出了主要貢獻。只有具備斯洛沃這種威望的人，才能說服那些想要懲罰種族隔離仆從的人接受這一妥協方案。毫無疑問，貫穿于整個談判過程的這種精神正是來自非國大一方。

在歷史性大選前夕被暗殺的克里斯·哈尼，在城鎮的激進青年心目中享有不可撼動的地位。他曾是非國大武裝組織“民族之矛”的領導人之一，并接替斯洛沃擔任了共產黨總書記。因此，他有無可指摘的威信，大部分年輕人對他一呼百應。作為一個搞軍事的人，如果選擇對抗談判進程、與希望繼續武裝斗爭的人站在一邊，他本可以把很多人吸引到自己周圍。相反，他以自身的威望，走遍全國，敦促年輕人今后成為“和平戰士”，并得到了積極的響應。

在南非歷史的緊要關頭，我們幸運地看到，種族界限的兩邊都有出色的領導人，他們為促進和平、寬容與和解，將自己的政治生涯和生命都置之度外。我在訪問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區同樣在經歷沖突或處理沖突與壓迫的遺留問題的國家時，他們幾乎無不嘆息他們沒有具備曼德拉的境界、勇氣、地位和眼光的領導人，也沒有像德克勒克那樣有勇氣和理智退出舞臺的人。

納爾遜·曼德拉的確是非國大致力于和平與和解的光輝化身，但他不是唯一的一個。還有一些較為年輕、知名度較小的人，同樣經歷過種族隔離的夢魘，同樣也從痛苦中解脫了出來，尋求為受傷和分裂的民族撫平創傷，而不是報復仇敵。例如，帕特里克·“恐怖”·雷克塔和波波·莫雷夫就是政治屏幕上冉冉升起的新星。他們曾是歷時最長的、以審判所在地東蘭特的一個小鎮命名的所謂德爾馬斯叛國案的被告。兩人都蹲過一段監獄，并在羅本島結識了曼德拉這樣的傳奇人物。兩人又都當選為新南非的省總理，“恐怖”和另一位省總理多齊奧·塞克斯瓦里都對我們主教團熱情贊揚教會在南非，特別是在教育上所起的作用。他們說，他們致力于和解，是因為看到并受到了基督教會的影響。

當民主到來時，波波·莫雷夫成為西北省的總理。不久，他在省會組織了一次集會，感謝教會理事會和其他人在德爾馬斯審判期間給予的支持。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安德魯·揚到場，并和我在主桌相臨而坐。他說，他問波波坐在總理旁邊，并作為接受禮物的人之一的那位白人是誰。揚說當波波告訴他答案時，他幾乎驚呆了：“他就是審判我們的法官。”

顯然，教會為在我們國土上正在發生的一切作出了貢獻，當然其過程和牧師隊伍也難免良莠不齊。可以認為，如果沒有這種影響，事情會有所不同。在我們斗爭最艱難的時刻，當大部分領袖要么身陷囹圄，要么被流放或軟禁的時候，教會領袖被推到了斗爭的最前線，并為教會贏得了特殊的威望—在人們受難的地方，出現的是荷蘭新教教會的前領袖阿蘭·博薩克，南非教會理事會秘書長弗蘭克·契卡尼，循道宗教會前首領彼得·斯多利，阿非利卡公會最為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南非教會理事會的另一秘書長貝葉爾·納武德，德班羅馬天主教前大主教德尼斯·赫爾利以及其他一些宗教的領袖。因此，當他們宣講寬容與和解的時候，人們都在洗耳恭聽，這也是他們贏得的榮耀。

現任司法部長杜拉赫·奧馬爾宣布了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法令。我還記得他曾為種族隔離的反對者擔任辯護律師。他取得了倫敦大學獎學金，但就在臨行之前卻被取消了護照，令他傷心欲絕。更有甚者，根據后來披露出來的情況，他已被南非政府的一個打擊小組列入死亡黑名單。他們曾偷換他的心臟病藥品，企圖讓他誤食而死。他指導議會通過的立法將可以使企圖謀害他的人申請大赦。

正是非國大的一個成員，西開普大學人權法教授卡德爾·阿斯馬爾在他任教后的第一節課上，提出南非不應該尋求紐倫堡式的審判，而應該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非國大為委員會的成立鋪平了道路。為處理對其陣營內部在南非境外的暴行指控，它采取了一個解放運動前所未有的舉動。非國大成立了至少三個調查委員會，其領導為揭露出來的迫害行為承擔了責任，并公開道歉。

因此，在經過長期艱難談判產生了將我們引向民主的臨時憲法后，這一歷史性文件中能夠包含一篇附言，作為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憲法指南，也就不足為奇了。

民族團結與和解

本憲法將在一個以斗爭、沖突、無以言狀的痛苦和不公正為特征的深刻分裂的社會的過去，和一個建立在承認人權、民主、和平相處以及不論膚色、種族、階級、信仰和性別而使每個南非人都有發展機會的未來之間，建立一座歷史的橋梁。對民族團結的追求，全體南非人民的幸福與和平，要求南非人民實現和解，重建社會。

本憲法的通過，將奠定一個穩定的基礎，使南非人民超越引起過嚴重違反人權行為、在暴力沖突中踐踏人道主義原則并遺留下仇恨、恐懼、悔疚和復仇的分裂而緊張的過去。現在可以提出這一切的基礎是，我們需要理解，不是復仇；是補償，不是報復；是烏班圖精神，不是犧牲。

為了促進和解與重建，對與政治目的相關以及在過去沖突過程中發生的作為與不作為及犯罪，將予以大赦。為此，議會將根據本憲法通過法律確定一個明確的分界日……并提供該法律通過后實施大赦的機制、標準和程序。

[[1]](#_1_2) 《加拉太書》，4 : 4。

# 第四章 何謂正義？

一個人犯下滔天大罪，僅僅坦白自己的所作所為，就可以萬事大吉，這究竟對不對？持批評意見的人說得是否有道理？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進程不道德嗎？委員會的建立所依據的《促進民族團結與和解法案》甚至沒有要求申請人表示任何悔悟或自責。獲得大赦的條件僅僅是：

· 請求予以大赦的行為，必須發生在1960年沙佩維爾大屠殺和1994年曼德拉當選為南非第一任民主選舉的國家首腦之間。

· 行為必須具有政治動機。出于個人貪婪而殺人的罪犯沒有資格申請；但如果行為是執行或代表一個政治組織的命令，如前種族隔離政府及其附屬班圖斯坦黑人家園，或一個公認的解放運動如非國大或泛非大，則罪犯有資格提出申請。

· 申請人必須如實披露所有與尋求大赦行為相關的事實。

· 必須遵守適配原則，即手段應與目的相適應。

法律規定，如果上述條件具備，就可給予大赦。受害者有權表明這些條件沒有達到，反對大赦申請，但沒有對大赦的否決權。

后來我們意識到，立法時沒有將懺悔作為大赦的條件之一，比我們當初的想法要高明。如果有這一要求，那么滿口道歉和懺悔的申請人可能被認為是在裝模作樣，而嚴肅死板的申請人則會被指責為冷酷無情、毫無悔意。這樣只能于事無功。實際上，大部分申請人都表示了悔悟，并請求受害者寬恕。至于請求是否出于真誠的愧疚，回答永遠莫衷一是。

那么，大赦是否損害了正義的伸張呢？這不是什么無所謂的問題，而是嚴肅的事，關系到整個真相與和解進程的正當性。

根據法案要求，如果犯罪行為是嚴重違反人權的行為，即定義為綁架、殺害、酷刑或嚴重虐待的行為，申請就必須通過公開聽證予以處理，除非這種方式可能妨礙司法（例如，證人受到威脅，不能公開作證）。實際上，幾乎所有向委員會提出的重要申請都是在電視聚光燈下公開審理的。因此，罪犯也經受了公開亮相和受辱的考驗。許多出來坦白的安全部隊成員過去曾備受尊重。周圍的人，甚至其家人，常常是第一次聽到原來他們是死亡小組的成員或對監禁的犯人屢施酷刑的人。對有些人來說，這是殘酷的打擊，婚姻因此破裂。這的確是不小的代價。

南非廣播公司負責報道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廣播小組，收到一個自稱海倫娜的婦女的來信（她希望匿名，以防報復）。她住在東部省份的姆普馬蘭加。公司廣播了來信的大部分節選內容：

我那時還是東自由州一個生活在農場上的十幾歲的女孩子。18歲時，我遇到了一個20多歲的小伙子。他在高級安全機構中工作。美好的戀愛就這樣開始了，我們甚至還談到了結婚。他是那么生氣勃勃、精力充沛，那么聰明睿智。他雖然是英國后裔，但“布爾”阿非利卡人都喜歡他。我的所有女伴都對我羨慕不已。后來有一天，他說他要“出趟門”。“我們不會再見面了……可能永遠見不到了。”我傷心欲絕，他也一樣。我草草和他人結婚，但很快就破裂了，因為我結婚就是為了忘卻。一年多前，我通過一個女友再次見到了我的初戀情人，這才第一次知道他到國外參加了行動，并打算申請大赦。當我看到曾經高大英俊的人變成了現在的這副形骸，心中充滿無法言喻的苦痛。他只有一個愿望—必須說出真相。大赦無關緊要，它不過是通向真相的途徑。

婚姻失敗后，我又遇到了一個警察。他雖比不上我的第一個戀人，但也非常出色、非常特別，也是一個生氣勃勃和可愛的人。他幽默，愛嘮叨，凡事有板有眼。后來他說，他和我們的三個朋友得到提升。“我們要調到一個特殊部門。現在，我的寶貝，我們是真正的警察了!”我們欣喜若狂，甚至慶祝了一番。他和朋友常常來看我，有時甚至住上一段。但他們會突然變得焦躁不安，冷不丁地說一聲那可怕的“出趟門”，便開車走了。我……這個愛他的人……只能在焦慮和失眠中度日，擔心著他們的安全，揣測著他們的所在。我們只能安慰自己：“不知者心靜。”我們這些親人所了解的……只是我們能親眼看到的。進入特別部隊三年后，地獄般的生活終于降臨到我們頭上。他開始變得沉默寡言，內向偏執，有時干脆用雙手捂著臉抖個不停。我意識到他開始酗酒了。深夜，他不休息，卻從這個窗戶到那個窗戶來回踱步。他想要掩飾無法遏制的內心恐懼，但我還是看出來了。一天凌晨兩點到兩點半之間，我被他急促的喘息聲驚醒。他在床上滾著，臉色煞白。悶熱的夜晚他卻一身冷汗，渾身冰涼。他目光迷茫，又像死人一樣呆滯。還有那不停的顫抖、可怕的嘔吐和從他靈魂深處迸發出的恐懼和痛苦的尖叫，令人不寒而栗。有時，他一動不動地坐著發呆。我從未搞清楚、從來不知道這每次“出門”他都強咽下了什么。我就像生活在地獄中。祈禱吧，祈求吧：“上帝啊！究竟出了什么事？他到底怎么了？他怎么能變得這么厲害？他是不是瘋了？我再也受不了他了，可是我又無法脫身。如果我離開他，他會像鬼魂一樣纏我一輩子。為什么呀，上帝？”

今天我找到了所有問題令我心痛的答案。我知道了一切的開端和背景，知道了那些“在上邊的人”的作用，那些“小集團”和“我們的人”不過是執行他們命令的“禿鷲”。而今他們卻都撣撣手好像無辜者，抗拒著真相委員會的現實。是的，我和我的殺人犯站在了一起，他讓我和白人的老南非安然入睡，而那些“上邊的人”又在為禿鷲尋找下一個需要“永遠從社會上根除掉”的目標了。

我終于搞清了這場斗爭究竟是為了什么。如果我被剝奪了一切，如果我的生活、我孩子和父母的生活被法律窒息，如果我只能看著白人盡管已得到最好的，但還要更好的而且得到了，我也會斗爭的。我羨慕并尊敬斗爭的人們—至少他們的領袖有勇氣站在他們的禿鷲一邊，承認他們的犧牲。可我們靠誰呢？我們的領袖都過于神圣和清白。沒有心肝。德克勒克先生說他不知道，我可以理解，可是該死的一定有一個小集團、一個還活著的人是這一切行動、一切“上邊的命令”的元兇。該死！這種不正常的生活，不是違反人權又是什么？精神殺害比血肉模糊的肉體殺害更沒有人道。我希望我能把舊南非從每個人的過去抹掉。我要用我那被毀了的禿鷲的話結束我的故事。一天夜里，他對我說：“他們可以一千次地赦免我。即使上帝和所有的人都一千次地赦免了我，我也得生活在這個地獄中。問題出在我的腦子里，我的良心里。只有一種辦法可以解脫，崩了我自己的腦袋，因為那兒有我的地獄。”

海倫娜

此外，不應認為給予大赦是鼓勵有罪不罰，讓罪犯完全逃脫其行為后果，因為大赦只給那些承認有罪并為其行為承擔責任的人。大赦涉及的不是無辜的人，也不是自稱無辜的人。正是出于這個原因，參與殺害史蒂夫·比科的警察盡管申請大赦，但被駁回。他們否認自己犯了罪，聲稱毒打他是為了反擊他無緣無故發起的攻擊。

因此，整個進程鼓勵的是承擔責任，而非相反。它支持的是尊重人權的新文化和承認責任、承擔責任，新民主制度希望以此為其特點。還應注意到，大赦條款是為特定目的進行的臨時性安排。南非的司法不會永遠照此辦理。它只適用于有限時期的特定目的。

另外，在懲罰性司法中，毫無人情味的國家在施行懲罰時幾乎不為受害者，更不要說為罪犯著想，但這并不是唯一的司法形式。我認為還有另一種司法，即作為非洲傳統法學特點的恢復性司法。它關注的重點不在報復或懲罰，而是本著烏班圖精神，療治創傷、恢復平衡、復原破裂的關系。這種司法力圖救助的不僅有受害者，也有罪犯，他們應該得到機會重新融入因其行為而被傷害的社會中。這種方式將犯罪行為視為發生于人們身上的事情，其結果是關系的破裂，因而更富人情味。我們可以說，司法，恢復性司法，是在尋求撫慰、寬容與和解中伸張正義的。

一旦符合法案規定的條件，大赦立即生效，罪犯的刑事和民事責任，連同國家對公職人員的責任，同時一筆勾銷。大赦產生的是好像犯罪行為從未發生過的效果，因為犯罪行為的法庭記錄將是白板，一張白紙。這意味著受害者失去向罪犯索取民事賠償的權利。要求受害者付出如此代價的確過分，但是使我們從壓迫到民主實現較和平過渡的談判者認為，這是我們的民族必須要求受害者付出的代價。

我們的自由代價高昂。但要正確計算這一代價，我們應該比較一下我們所享受的高度穩定和前蘇聯在進行類似的變革時經歷的劇烈動蕩和騷亂，更不要說前南斯拉夫的可怕屠殺和不穩定了。國際社會正在追究前南斯拉夫一些人的滔天戰爭罪行。大部分種族隔離制度下違反人權行為的受害者，都有其默認的代表為他們講話。考慮到當時的形勢和現實，他們一般都會接受其代表作出的決定，認為那應該是達到其愿望的最好決定了。

1999年1月，我在耶路撒冷的一個猶太教堂向很多人介紹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像其他類似的集會一樣，有人情緒激動地對我說司法有其道德要求，而我們的進程損害了這一點。他強烈認為（我猜想，那里和其他地方的大部分人也同意他的觀點），從道義上講，這樣的安排只能由受害者本身作出，而不能是別人，無論其動機如何崇高。我希望我當時在這一點上給予了令他滿意的回答，即那些為實現和平過渡而進行談判的人，在解放運動的代表團中有人自身便是邪惡的種族主義的受害者。許多人曾被拘留、騷擾、監禁、拷打和流放，而這一切發生之前，他們都遭受過各種形式的種族隔離的不公和壓迫。他們可憑親身經歷講話。例如，直到難以忘懷的1994年4月，他們所有人都被剝奪了選舉權：直到那一天，他們從未在生身的祖國投過一次票。他們遭受過極不公正的通行證法的侮辱，看到自己的人民流離失所，像垃圾一樣被大規模強制遷徙計劃扔掉，無數人受到極大的傷害。因此，我可以向那位提問的猶太人保證，談判者并非自以為是，而是在訴說他們和親人的親身經歷。

大選結果揭曉時，這些談判者不僅沒有被指責未能反映選民的意見和態度，反而得到了廣泛支持，贏得了大選的壓倒性勝利，使非國大執掌了民族團結政府。同樣是這些人—現在已是當選的代表—給我們帶來了新憲法，并根據憲法通過法案，建立了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這不是什么理想主義新星的杰作，而是老成務實的政治家的功績。他們常常眼睛盯著下一次大選，一般不會做出疏遠選民、讓自己下臺的事。這些政治家是在曼德拉和他的繼任者姆貝基的領導下運作的。如果他們在法案上的行動有悖選民的情感，這早就該反映在民意測驗中。真相與和解進程進行三年后，歷經無數引起爭議的大赦決定，在對政治領袖的民意調查中，曼德拉仍贏得了80%的高分，姆貝基則為70%。（他們最強的對手僅得30%。）這說明，盡管選民因為壓迫時期之后的第一屆新政府未能兌現其全部承諾，自然會感到失望，但是非國大仍然得到了認可。最近，支持建立委員會的政黨在1999年的大選中贏得了90%的選民。用我在倫敦國王學院的老師一句令人難忘的話來說，“這樣斷言不無道理”，即那些參與談判并建立了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人，實際上完全有資格代表受害者而且得到了認可。

當他們接受受害者必須不僅放棄其刑事訴訟權利，而且要放棄民事賠償要求的權利，才能達到我們今天的局面的時候，他們可以說自己是以受害者的身份這樣做的。形成這一立場并非輕而易舉。這曾引起過極大的憤怒，但是顯然，即使是民事賠償，如果申請大赦的人知道盡管他們將免于刑事責任，但逃不了民事責任，很可能他們根本不會提出申請了。把他們吸引到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面前的胡蘿卜的魅力將大打折扣。可以說，如果不如此辦理，更多的人會因此而冒可能被起訴的風險（就像馬蘭將軍及其同案犯被無罪釋放后許多人的行動一樣），因為他們知道，他們曾經發誓保守秘密或與同黨串通提供偽證，其罪行的內幕仍然是個秘密。找到的解決方案并不完美，但卻是當時形勢下的最佳選擇，即以真相換取罪犯的自由。

取消受害者要求民事補償的權利，就產生了賠償的問題。委員會在這方面的工作常常為人忽視，但對建立和解的進程確是相當關鍵的。正如我們在《報告》中所說：

沒有足夠的賠償和復原措施，無論個人還是社會都不可能撫平創傷、實現和解……此外……賠償是大赦的重要平衡。大赦的實施剝奪了受害者對罪犯提起民事訴訟的權利，因此政府應承擔賠償的責任。

馬霍麥德大法官在憲法法院的判決中清晰而雄辯地指出，“細致入微的針對每個人的賠償”，要比讓有可能勝訴的少數受害者對國家提起民事訴訟，對于解決種族隔離制度遺留問題將是更具創新性的方式：

那些基本人權被酷刑和迫害所踐踏的人的家庭，不是唯一忍受許多人必須長期忍受的非人性種族隔離造成的“不可名狀的痛苦和不公正”的人。多少代已經出生和即將出生的孩子，將遭受種族隔離制度造成并延續的、影響了無數人生活的貧困、營養不良、無家可歸、文盲和能力的喪失。國家既沒有資金也沒有能力將一切扭轉過來。我們需要付出多年的決心、理智和努力，才能“重建我們的社會”，讓得到了真正成長機會的新一代實現他們的正當夢想。過去的幾代人首先被種族隔離的實施，在這一制度死亡后又被其無情的后果，剝奪了夢想和機會。國家的資源必須創新、明智、有效和公平地加以利用，以促進重建進程，最大限度地給最廣大的人民帶來救助和希望，為整個民族的利益開發每一個人，包括那些直接或間接地為我們的種族主義過去背負恥辱或痛苦的人的內在潛力。

憲法的談判者和民族的領導人要解決這些棘手的問題，不得不作出艱難的抉擇。他們可以選擇首先將國家的有限資金，用來賠償那些遭受過國家公職人員謀殺、酷刑或毆打的人，與此同時擠掉本可用在諸如教育、住房和基本醫療這些關鍵領域所急需的資金。他們有權對問題所涉及的各種不同需求排定輕重緩急的順序，可以決定將國家的民事賠償責任加以限定，把那些……（發生時間過于久遠、已無權要求賠償的案件）和那些發生在最近、不能以法定期限進行限制的案件區分開來。他們也有權說這種方法沒有道理而拒絕采納。他們可以選擇讓國家背上保險公司賠償要求的重負，因為這些公司為國家公務員的民事行為進行過機構賠償，這樣又會把急需的資金從為饑餓的人提供食品、為無家可歸的人提供住房、為爭著擠進已經超員的學校的孩子提供黑板和書桌這些方面挪走。他們有權決定把這些學童、窮人和無家可歸的人的需要放在首位。

憲法制定者所領導的大選，使議會贊成“社會的重建”，并在此進程中運用廣義的“賠償”概念，使國家既能夠考慮到各項事業對其資金的競爭，又可顧及在過去的沖突中人權遭到侵犯的個人和家庭的“無可名狀的痛苦”。有時給予這些家庭的最大賠償，莫過于通過助學金或獎學金幫助他們的孩子最大限度地開發自身潛力；在其他情況下，最有效的賠償可能是職業培訓和恢復工作能力；有些人可能需要復雜的外科手術和醫療救助，另一些人可能需要住房補貼，以便不被從他們已經無法維持的住房中趕出來；在某些情況下，為故去的人豎起墓碑、公開表彰他或她的高尚和英勇，可能是對受傷的心的最大慰藉。即使兩個人在同樣的非法行為中遭受了同樣的損失，對他們的賠償也可能在形式和性質上有所區別，因為他們現在一個收益豐厚，另一個則生活拮據。[[1]](#_1_5)

法律以及委員會提交給曼德拉總統的建議均作出規定，給法案認定的受害者以賠償。委員會委員盡量避免使用“補償”這個字。我們認為，任何人、任何方式都無法對丈夫、父親、一家之主遭到殘酷殺害的家庭進行補償。這種損失造成的傷害是無法計算的。此外，如果我們給予補償，那么是不是所有受害者，無論其受害的情形有多么的不同，都應該得到同樣的補償呢？因此，我們向總統和議會建議，應該給認定的受害者相當可觀的賠償金，但必須說明這筆錢更多是象征性的，而不是實質性的補償。國家實際在向受害者說：“我們承認你們的權利受到了嚴重踐踏。沒有什么能替代你們的親人。但作為一個民族，我們說，我們非常抱歉，我們把你們的傷口揭開，希望能夠清理干凈；這些賠償如同藥膏，敷在傷口幫助愈合。”

法案要求據此建立起來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必須“對受害者友善”，以恢復受害者作為人和公民的尊嚴。但它的一個重大缺陷在于，罪犯的申請一旦批準立即給予大赦，而委員會要到進程開始幾年后向總統遞交《報告》的時候才能就受害者的問題提出建議。總統同意后，再把意見提交議會；然后議會建立一個特別委員會討論這些建議。議會通過委員會的建議后，受害者才有希望得到賠償。可惜這個過程非常漫長，結果真相委員會成立后的三年內沒有批準一項賠償，而罪犯卻一個接一個得到大赦。我們不難理解找到委員會的受害者的不滿和怨氣，也可以理解有些人對委員會的激烈批評和諷刺挖苦，說我們宣傳的“對受害者友善”實際是對罪犯友善。

我們委員會也對法律的這個方面表示了不滿。結果，在1998年10月29日向總統提交《報告》的時候，20萬名左右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認定的受害者得到了所謂的“緊急過渡救濟款”。這筆緊急救濟標準統一，一般每個受害者最多得到2000蘭特（330美元）。

除緊急救濟外，我們在《報告》中還建議，國家應該支付“個人賠償金”。我們希望，所有受害者最終都可以得到每年23000蘭特（3830美元）、持續6年的賠償金。我們估計國家總計要支付29億蘭特（4.77億美元）。撰寫本書時，政府共撥出相當于此數五分之一的預算，分三年支付。

我們的個人賠償金建議引起了幾個問題。能不能給痛苦設定一個價錢？在國家金庫緊張的情況下，國家是否能支付得起這筆錢？如果種族隔離本身如五位高級大法官所譴責的那樣，是對人權的嚴重違反，是對人類的犯罪，那么是不是每一個遭受這一邪惡制度之苦的人都應被認定是受害者呢？這一切中的公平何在？那些被強制遷徙的人怎么辦？還有那些因為接受劣等教育而終生受損的人、那些由于種族原因沒有得到足夠的資金而罹患本來很容易預防的疾病的人，怎么辦？我們根本列舉不完。

委員會中沒有人懷疑，法律在限定違反人權行為的含義時，是有一定武斷性的。但是，立法部門顯然感到有必要將處理的問題控制在可以應付的范圍之內。賠償本可以追溯到遠遠早于1960年的時期，比如到1948年，即國民黨首次掌權，開始進行瘋狂的種族主義立法，試圖通過有系統地剝奪大部分南非人的基本人權，使他們在自己的國土上淪為二等公民的時候。然而，我認為議會的決定是極為明智的，為我們完成任務提供了一個合理的機會。它也保證了避免整個國家長期被處理過去之事牽扯精力，不得脫身，最終影響和平過渡進程。

我們也根據同樣的道理向政府建議，應實行我們所說的受害者“封閉式名單”，只有向委員會提出申請的受害者，才有資格得到賠償金。我們指出，大規模宣傳活動已經使人們了解自己有作證的機會，而得到賠償的人應該是那些確實作過證或者提交了陳述的人。如果在無法估計究竟有多少受害者的情況下政府就承諾給予賠償金，局面可能難以收拾。

任何人都沒有對賠償的重要意義抱任何幻想。司法部長杜拉赫·奧馬爾領導了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工作。他在我們提交《報告》后的辯論中正確指出，我們是一個受害者的民族，但更重要的是，我們是一個幸存者的民族。他還建議考慮給予集體賠償，因為有時受到更大傷害的不是個人而是群體。大部分理智的人都會同意他的觀點，但是我堅持認為，應盡一切可能保證有權得到個人賠償的人不被遺漏。畢竟，他們已經放棄了損害賠償的訴訟權利，不能讓他們再作出過分的犧牲了。

我們委員會的人往往對來到我們面前的人備感慚愧，因為他們的期望和要求常常是那么謙卑。“我能不能給我的孩子立塊墓碑？”“委員會能不能幫忙找到我兒子的尸骨，哪怕是一塊骨頭，讓我們為他安葬？”“能不能幫我讓我的孩子上學？”如果我們讓他們失望，連這些可憐的要求都不能滿足，那該是多么悲哀的事。我們深知政府資金承受的壓力，但必須作出令人痛苦的艱難選擇。

委員會也建議用倒下的英雄命名街道和學校，修建具有紀念意義的公共設施，如診所、社區中心和娛樂場所。現在這一切已經開始。我們還認為應該建立紀念碑和紀念堂，緬懷為我們帶來自由的人們。這些建筑應盡量具有包容性，應幫助我們積極地而不是懷恨地記取過去；紀念堂不應離間我們中的一些人，而應促進恢復與和解的進程；應該讓記憶在我們忍受了旨在分裂我們、散播敵意與不合的一切后，把我們緊緊聯系在一起。我希望當我們發現我們的確是一個五彩繽紛的國度時，我們能學會慶祝讓我們團聚一堂的時刻和事件，慶祝歷史性的大選、曼德拉就任總統或是我們在世界杯或非洲國家杯足球賽中的勝利。

[[1]](#_1_4) 南非憲法法院，案卷CCT 117/96號（1996年7月25日）。

# 第五章 開始行動

1995年9月，我以為可以作為大主教退休了，但是在我參加的倒數第二次主教會議上，我得到提交給總統的、擔任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成員的一致提名。我是從最初的200人縮減到45人的候選人之一。我們在南非的幾個中心進行的聽證會上，接受了多黨小組的面談。小組把25個名字提交給總統，總統經與民族團結政府內閣商榷后，選擇其中17人組成了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我被任命擔任主席，埃里克斯·伯萊恩（Alex Boraine）博士擔任副主席。

既然總統發話，下面的人便沒有什么選擇了。誰會對曼德拉說“不”呢？我等待已久的喘息告吹了。在此后的三年中，我們將投身委員會既令人心碎又催人振奮的工作，聆聽對滔天罪行的可怕陳述，又為我們同胞表現出的非同尋常的寬容精神而振奮不已。這的確是難得的殊榮。

總統在1995年12月15日的《政府簡報》中宣布了委員會的成立，第二天，即12月16日，我們就召開了第一次會議。如果有人要尋找什么征兆的話，那么我們能在今天叫做和解日的公共假日聚集一堂，的確是個好兆頭。這個假日經過了有趣的演變過程。它曾經被叫做丁干日（Dingaan’s Day），但不是為了紀念同名的祖魯國王，而是帶有沙文主義色彩地紀念一小撮阿非利卡殖民者的僥幸勝利。19世紀30年代，他們被英國似乎要平等對待“本地人”和白人的政策激怒，憤憤不平地離開了開普。他們取道后來被稱為“非常之路”（Great Trek）的小徑，想象自己在重演上帝的選民出埃及的大逃亡。他們是上帝的新的選民，逃脫的是英帝國主義的枷鎖。1883年，Voortrekker人的一支小隊伍在開始與祖魯軍團的戰役前，瘋狂地祈求上帝在隨后敵眾我寡的戰斗中給他們佑福。他們還在盟約中發誓，如果上帝保佑他們戰勝了當地蒙昧的烏合之眾，他們和子孫后代都會莊嚴紀念這個日子。他們采用新戰術，將篷車圍成一圈，如同流動的堡壘—laager—他們可以藏身其后，趕跑敵人。奇跡發生了。上帝被他們的祈禱感召，他們以決定性的勝利打敗了強大得多的敵人。從此之后，阿非利卡人便開始慶祝他們在12月16日血河之戰中取得的勝利。他們認為，這一勝利清楚表明他們跟那些異教徒黑人相比，是高出一籌的。這一公共假日變得臭名昭著，南非黑人都害怕丁干日的降臨。我還記得小時候大人嚇唬我們說，如果在那一天離開貧民窟到白人的鎮上去就會發生可怕的事。實際上大部分黑人在那一天都像躲避瘟疫一樣避免進城。常常可以聽到有些不聽勸告的愣頭青，如何被打、被嘲弄和被謾罵的令人毛發倒豎的事情。據說有的黑人的山羊胡簡直就是從臉上被連根扯掉的，因為白人認為山羊胡子是殖民者的典型特征，不能容忍黑人這樣仿效他的主子。

這樣一個幫派的、沙文主義的假日居然叫做丁干日，真是荒唐至極，紀念的倒像是那個祖魯國王，而不是他的敗仗。因此，國民黨政府將節日更名為盟約日。當時政府正引誘祖魯人接受班圖斯坦黑人家園的政策，重揭祖魯人敗仗的舊傷被認為是不明智的。根據這一政策，黑人在按部落畫地為界的小國內享受自治，自封的獨立在這個世界上除了南非及其衛星國外再無人承認。在這種天方夜譚式的情境中，南非黑人將在生養自己的土地上變成外人，無法在南非要求自己的政治權利。這一政策被國民黨大肆宣揚為南非參與非殖民化的新進程、幫助人民取得民族獨立的舉措，而實際上仍是分而治之的老政策，鼓勵部落主義，阻撓將南非黑人作為非洲人而不是各個不同部落的成員團結起來的運動。白人至上論者無論何等愚蠢和不道德的事都愿意做。

節日更名后的慶祝活動以宗教為重點，即作為宗教儀式永遠紀念殖民者在上帝賜予勝利的大戰前夜向上帝許下的諾言。這一新的含義，使我們又向促進創傷的愈合、和解及承認南非邁進了一小步，用1955年解放運動通過的《自由憲章》的話來說，這個南非“屬于生活在南非的所有人”。

這個節日逐漸體現了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思想，即越來越多的南非人將找到他們的共同點，它將把一個多樣的民族凝聚在一起，它將是包容性的而不是幫派性的，它也不會通過貶低某些人而抬高另一些人。這樣的秩序，對人民被長期離間、不公正和歧視又加深了相互仇恨的社會來說，絕非易事。但是，如果我們要作為一個豐富多彩的民族生存下去，這一進程就不容失敗。

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就是在這一和解日召開的。

我們聚集在開普敦圣公會大主教的圣邸主教廷。這也頗有意思，因為這里曾叫做布舍維爾，是1652年到達南非的第一個白人定居者揚·范·里貝克的故居。他從荷蘭被派到開普為船隊建立東行的中轉站。他做的事情之一，就是種植了一道苦杏樹籬笆，把當地的科依人擋在定居點外。在主教廷附近，至今仍可看到籬笆的殘余。用記者阿利斯特·斯帕克斯的話來說，這道籬笆不愧是有了它之后南非的生動象征。[[1]](#_1_7)范·里貝克把歐洲帶到了非洲，而本地人卻成了被擋在外面的異類。這道籬笆最終結出的苦果，就是南非充滿沖突的那段歷史以及白人和其他種族之間的仇恨，而我們委員會正是為處理這段歷史而建立的。盡管要求我們處理的是1960—1994年這34年間的問題，但我們真正面對的卻是我們美麗的祖國自1652年以來的歷史。

對我來說，在主教廷開會，更是有切膚的感受。20世紀80年代末期，這里越來越經常成為反對日益加深的種族壓迫的抵抗運動領導人的開會場所。正是在其中的一次會議上，他們策劃組織了1989年9月13日的大游行。其后連續幾個星期，全國各地爆發了大規模示威，最終促成了1990年2月2日德克勒克先生宣布的劃時代變革。游行號召人民抵制1989年9月6日的大選。在開普敦，幾個和平示威的人被安全部隊殺害。傷亡者中也包括孩子—他們站在自家庭院里竟也挨了槍子。我記得，當工作人員報告說已有20人被殺時，我悲傷地走進主教禮拜堂，流著淚質問上帝：“你怎么能讓這樣的事發生？你怎么能允許他們對我們這樣做？”我不能聲稱擁有通向天堂的熱線，但跟上帝爭辯一番后，我知道了上帝希望我們游行。我向有些吃驚的工作人員宣布，我們也要去為和平游行，表達開普敦大部分居民都感到的義憤，他們必須有個辦法宣泄他們的憤怒。

主教廷也是1990年2月11日曼德拉和溫妮度過第一個自由之夜的地方。在接聽了各國總統、國王包括白宮的電話后，他就是在這里與最親密的同事討論未來戰略的。我走進會議室，開始吟唱幾乎成為第二國歌的贊美詩：Lizalis’idinga lakho（實現你的意志，啊，與真理同在的上帝）。所有的人都跟著放聲高唱，仿佛他們的生命就取決于此。我進行了禱告，感謝上帝的仁慈帶來的奇跡，請求他保佑在座的各位和我們的祖國。然后，我告辭，讓他們繼續討論。第二天，曼德拉在主教廷的花園里召開了獲釋后的第一次記者招待會。也是在主教廷，教會領袖召開了一次重要的黑人政治領袖會議。其中一些激進分子第一次表示愿意和頗有爭議的班圖斯坦黑人家園領袖坐在一起。這些人由于和種族隔離政府合作而被視為不可接觸的人。

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在主教廷召開的會議，聚集了可以想象得出的形形色色的南非人。共到會16人，一人因故缺席。其中10名黑人、6名白人，包括兩個阿非利卡人。政治上，我們代表了從左翼到白人保守右翼的各種派別。有基督徒、穆斯林、一個印度教徒、幾個沒有信仰的人，也不乏一兩個不可知論者。

副主席伯萊恩博士曾是議會的反對黨成員，其觀點受到支持種族隔離的議員的激烈攻擊。他在20世紀80年代憤然辭職，開始創建議會外組織，繼續為實現民主奔波。瑪麗·伯頓女士是“黑色腰帶”（Black Sash）這一為南非黑人爭取權利的婦女運動的中堅人物之一。克里斯·德杰格，資深律師，曾是極右翼黨派的成員和執行法官。伯格尼·芬卡牧師是東開普反對種族隔離的著名教會領袖。希西·坎佩培小姐是一個深度介入勞工權利斗爭的律師。理查德·萊斯特先生是曾在事端不斷的納塔爾省工作的人權律師。懷納德·馬蘭先生是律師，曾代表當政的國民黨擔任議員，后來脫離出來，參與建立了一個白人的反對黨。科薩·姆格佑先生是循道宗教會前會長、南非教會理事會主席以及為爭取納塔爾省實現和平的著名納塔爾教會領袖團體的成員。賀蘭吉維·姆吉澤女士是心理學家，曾擔任政府的精神衛生專家。

經常為我或伯萊恩代行職責的杜米薩·恩徹貝扎先生，曾是東開普的政治犯和著名人權大律師。溫迪·奧爾醫生在擔任國家醫生時，因找到被拘留者遭受酷刑的證據、成功獲得法庭對警方的強制令而名揚天下。丹澤爾·伯基埃特先生是資深律師，曾在開普敦的政治審判中擔任辯護律師。馬普勒·拉馬沙拉醫生是臨床心理學家，曾被流放，并在醫學研究理事會擔任要職。法澤爾·蘭德拉醫生長期活躍在反種族隔離斗爭中。雅思明·蘇卡也是律師，曾率南非代表團參加世界宗教與和平大會。格蘭達·維爾舒特女士是精神科護士及開普敦暴力受害者康復中心的領導，在處理酷刑和沖突受害者方面具有豐富經驗。

在主教廷的會議上（后來我們將會議移到我們自己的辦公地點），我們把委員分配到下設的三個專門委員會。17名成員中的15名分別進入了我擔任主席的人權違反案件專門委員會和賠償與復原專門委員會。委員會有權任命并非委員會正式成員的人進入下設委員會。在任命時，我們特別注意到地區、性別、政治和宗教的代表性，以填補委員會組成上的空白。例如，我們保證了至少有一個猶太人和一個白人荷蘭新教教會的領袖參與。

兩名律師委員被任命為大赦專門委員會成員。不久，總統任命的3名法官使委員會增至5人，隨后又增至19人，以加快對7000件大赦申請的審理。（大赦專門委員會在真相委員會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委員會由總統任命的法官領導，他們并非真相委員會成員，擁有自主決策權。我或者真相委員會的任何成員，都無法對其是否準予大赦的決定產生影響。法律禁止真相委員會審議其決定。）

委員會在一次早期會議上，還決定按地區分片運作。于是，我們在德班、東倫敦、約翰內斯堡和開普敦都開設了辦事處，開普敦是總部所在地。我們很快就招募了350名工作人員，并投入了工作。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伯萊恩博士，他在安排辦公設施和任用工作人員上大顯神通。

我真擔心我們無法應付這項白手起家、后來證明是規模巨大的任務。不過，我們努力做好了，到完成任務時已經鍛造了一支由認真、勤奮的委員和工作人員組成的出色隊伍。能擔任這支杰出隊伍的領隊，乃是極大的榮幸。帶領一支必勝的隊伍并不難，而我們恰恰就是這樣的隊伍。我要向他們表示深摯的謝意。在我們遞交《報告》之前，兩位委員辭職：拉馬沙拉醫生被任命為德班―韋斯特維爾大學的總監和副校長，而曾是保守黨成員的德杰格律師感到無法繼續再與其意見相左的委員會一起工作，但留任大赦專門委員會，于是我們就剩下一個阿非利卡委員了。

我在早期的另一次會議上建議，所有委員一律退出現有的政治黨派或組織。有人完全正確地指出，我們之所以被提名為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成員，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為我們來自不同的政治派別。人們預料我們將把個人和團體的包袱、把我們的政治偏見和觀點、把我們的見識和盲點，都帶進這個重要委員會的工作中。大部分委員認為，如果退出所屬黨派，我們只能弄巧成拙。如果我們假裝脫離政治，就會顯得不那么坦誠和透明。我們可能會不偏不倚，但這并不是說我們還在“究竟種族隔離是邪惡的還是政策不錯只是執行時走了樣”這樣的問題上糾纏不清。我們大部分人譴責種族隔離是徹頭徹尾的邪惡制度的言論，都是記錄在案的。也正是這一立場使我們贏得了聲望，并被任命為委員會成員。

我們具有廣泛的代表性，但成立伊始，阿非利卡新聞媒體和政治領袖就指責委員會存在缺陷，擠滿被他們蔑稱為“好斗”型（指反種族隔離斗爭）的人物，而且偏向非國大。他們呼吁建立一個支持種族隔離的人數與其對立面相等的委員會。他們幾乎沒有意識到其要求是何等傲慢，典型地體現了當這塊土地上的絕大部分人對治理方式毫無發言權時他們的行為方式。臭名昭著的種族隔離舊制度的支持者，仍然希望一切率由舊章。他們空口無憑地（因為我們甚至還沒有開始工作）宣稱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建立，是為了追殺舊秩序，特別是阿非利卡人。

我們對此進行了反駁，指出我們中的一些人很久以來，早在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想法產生之前，就熱誠地投身于和解事業。我們致力于為受到傷害的人們撫平創傷，這種熱誠使我們不僅不會破壞這一進程，反而會更加力求公允。我對一群抱有類似想法的白人新教領袖說，你們只要看看我既往的記錄，就知道可以倚重我的個人品格了。我提醒他們，盡管我反駁過，很多人還是認為我反對種族隔離是出于政治原因，并理所當然地以為我會三緘其口，不對非國大領導的政府提出批評。他們幾乎肯定我會接受一個政治職務，公開進入政壇。我指出，恰恰相反，我沒有尋求也未接到擔任政治職務的邀請。非國大執政不久，我就批評他們接受過高的薪金。我建議他們看看我們究竟會提出一個什么樣的報告，再評頭論足不遲。

（他們即使看到事實，我也不認為他們會對我們大加贊揚。我們的確信守諾言，不偏不倚，非國大甚至因此抱怨我們，想要阻撓《報告》的公布，聲稱《報告》所言并非事實，指責我們用同樣的道德準則評判與種族隔離斗爭的人和實施種族隔離的人。）

令人難過的是，我們一直未能爭取到阿非利卡人中叫嚷得最兇的那些人，他們堅持透過變色眼鏡看待能夠表明我們嚴守公允的事實。我們盡了最大努力，勾勒出由于既往的政治沖突在我國發生的嚴重違反人權的狀況。我們在確定罪責輕重時，也是為了培養有責必負和尊重人權的文化。我們下定決心毫不畏懼、毫不偏袒地完成這一重要使命，而全世界和大部分講道理的南非人似乎都認為我們干得不錯。

如前所述，我們對南非社會具有廣泛的代表性。這種代表性既是至關重要的特點，但也給我們帶來不少煩惱。我們來自不同的背景，后來我們發現種族隔離以不同的方式影響了我們所有人。我們懊惱地發現，我們是南非社會的縮影，受傷的程度遠遠超出我們當初的想象。我們發現彼此之間常常猜忌，不易建立相互的信任。只是到了后來，我們才意識到，我們都屈從于一種強大的條件反射，使我們用成見對待屬于其他群體的人，盡管我們大部分人都會激烈申辯自己不懷成見。

第一年中召開的會議簡直如臨深淵。每個人都想辟出自己的地盤、建立自己的空間，要達成一致意見，談何容易。黑人委員總是琢磨白人同事會不會對其他白人作出同樣的反應，反之亦然。有些委員因為是白人的自由派—“自由派”在南非是罵人的話—而被指責為企圖左右事態以出人頭地。我們任命的第一批工作人員都是白人，于是警鐘四起，有些委員甚至立刻害怕委員會將被白人掌握、執行白人的議程。對這樣的氣氛，我準備不足，因為我已經習慣了我們教會的會議，特別是大家都翹首盼望的主教大會。這些會議是那么和諧、那么積極向上，完全沒有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會議上的明槍暗箭、含沙射影。我們的確原原本本地反映了作為種族隔離社會基本特征的隔閡、分裂和猜疑。我們可以成為整個國家的標尺，如果我們最終能夠凝聚成一個團結、和解的有機整體，那么南非就有希望了。

有意思的是，總統任命擔任委員會主席的是一位大主教，而不是法官或其他，因為在某種程度上我們是一個準司法機構。委員中七人是律師，因而法律界擁有最強的代表性。但是，也有三位活躍的牧師，而且三人都是其教派的全國性領袖。此外，伯萊恩博士在辭職從政之前，曾是循道宗大會最年輕的主席。因此，可以說我們當中有四位牧師，而這必定會影響我們的審議和工作方式。

總統一定以為我們的工作屬于深邃的精神世界。畢竟，寬容、和解和賠償，并非政治辭令中的流行語言。政壇上的慣例，是要爭取心滿意足，要以牙還牙、以血還血，并堅信我們的世界是你死我活的世界。大部分政治家并不是在那里療治創傷、恢復平衡或是消除分歧。寬容、懺悔與和解在宗教領域才能找到更合適的安身之地。

盡管我們存在分歧，委員會在第一次會議上還是接受了我的建議，閉門謝客，以便我們提高精神境界，敏銳視聽。無論我們對各自的圣靈如何認識和稱呼，我們都坐在我的精神導師法蘭西斯·古爾的身邊，將身心敞開，聆聽超凡圣靈的啟示和教誨。在委員會任期將滿時，我們又一次閉門謝客，在羅本島經歷了感人至深的反省。我們首先游覽了小島，從一個監牢走到另一個監牢，深深沉浸在歷史和憤懣之中，并意識到我們國家走到今天這一步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價。然而，我們彼此也更加貼近了。

委員會還接受我的建議，在會前和會后進行禱告，并在會間小憩時祈禱和整理思緒。在違反人權案件專門委員會，我們議定當受害者或幸存者到委員會的受害者聽證會上陳述他們的辛酸經歷時，我們應該營造莊嚴的氣氛，應該有禱告、贊美詩和燃燭儀式，紀念在斗爭中死去的人們。在東開普進行的第一次聽證會前，我問我主持會議時，是否應該穿上作為我公共形象一部分的大主教紫色教袍。委員會認為應該，印度教同事甚至態度極為堅決。

我被任命為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主席后，立即要求全世界圣公會聯盟秘書處告知我們教派的所有修女和修士，在委員會存在期間，我們急切需要他們為我們定期禱告。這樣，我們知道我們至少經常被這些基督徒熱切的祈禱所包圍。從其他人那里我也了解到，全世界許多人用他們的愛和祈禱支持著我們。我要為他們的出色表現致以深深的謝意。無論我們取得了什么成績，都要歸功于籠罩我們、支持我們的這片祥云。我們大部分人都認為，我們所承擔的是深刻的宗教和精神使命。

很少有人反對委員會對精神特別是對基督教的倚重。當有記者對此提出疑問時，我回答說，我是宗教人士，也是因此被選出來的。我無法裝扮成另一個人。我按照本來面目行事，并得到了委員會的接受。這就意味著，神學和宗教的思想理念將成為我們所作所為的依據。我們也不無歡欣地接受了委員會中從事醫學的成員所給予的適當指導，心理學家、醫生和護士為我們提交給總統的賠償和復原政策的制定，立下了汗馬功勞。

隨著年事的增長，我驚喜地發現神學對我們的整個生活是多么意義重大。特別是在委員會的工作中，我們欣慰地發現我們其實都是亞當和夏娃的子孫。當上帝申斥亞當違反禁令偷吃禁果時，亞當不愿承擔抗旨不遵的罪責，把責難推到夏娃身上。而上帝指責夏娃時，她也一樣地推卸責任。（我們不知道蛇是如何為自己辯解的。）因此，大部分人不情愿承擔種族隔離暴行的責任，沒什么大驚小怪的。他們否認自己的所作所為，指責他人他事而不是自己，正說明他們是亞當和夏娃的真正子孫。

哈佛大學神學家哈維·考克斯在題為《勿歸咎于蛇》（On Not Leaving It to the Snake）一書中，對我們歸罪于他人的傾向進行了頗有教益的駁斥，大大有助我避免輕率判斷和對他人的不幸而幸災樂禍。這在委員會接觸犯下最為十惡不赦罪行的罪犯時尤為重要。委員會常常為人可以邪惡到這種地步而深感震驚，我們大部分人都會說，具有這種行為的人是魔鬼，因為他們的行為就如同魔鬼。我們必須區分行為和罪犯、罪孽與罪人：痛恨和譴責的是罪孽，而對罪人則要滿懷熱誠。如果罪犯被當做無可救藥的魔鬼，那么我們就談不上什么追究責任了，因為他們被宣布為不能對其行為負責的非正常人。更重要的是，這意味著我們放棄了他們改過自新的希望。神學認為，盡管他們的行為可憎，但他們仍然是上帝的孩子，能夠懺悔、能夠改變。如若不然，我們委員會就必須關門大吉，因為我們運作的前提是人可以改變，可以認識到并承認其行為的錯誤，經歷痛悔，或至少感到歉疚，并最終迫使自己坦白罪行，請求寬恕。但是，如果他們被蔑視為魔鬼，便理當無法參與寬恕與和解這一觸動人心的進程。

在這門神學中，我們不能放棄任何人，因為我們的上帝為罪人保留了特別柔軟的心腸。在耶穌講述的故事中，牧人寧可將99只溫順聽話的綿羊拋在荒野，也要去尋找那只離群的羊—不是毛茸茸的可愛羔羊，因為可愛的羔羊不會離開媽媽，而是桀驁不馴、惹是生非的老公羊。牧人正是在這只羊身上頗費心血。等找到時，它很可能已沒有漂亮的羊毛，渾身污穢，也可能跌到了污水溝里，搞得臭氣熏天。牧人找尋的就是這樣一只羊，而且找到之后，絕不會厭惡地側身掩鼻。不，他會將它輕輕抬起，扛在肩上，回家后盛宴慶祝，因為他找到了迷途的羊。耶穌說，一個悔過的罪人，比99個無需懺悔的人，可以給天堂帶來更大的欣喜。

基督徒受到這條福音—與世俗常理相悖的偏向罪人的福音—的約束。耶穌基督得罪了循規蹈矩的大多數和正統的宗教領袖，因為他與之為伍的不是受人愛戴的社會精英，而是處于社會邊緣的渣滓糟粕—是妓女、罪人和被摒棄的人。在我遵從的神學中，任何人都不能將他人定為不可救藥而打入地獄。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時，陪伴他的是兩個小偷。其中一個表示懺悔，耶穌向他保證，他們將一起進入天堂。故事的主旨，是說我們任何人都不能斷言某某人已經萬劫不復，因為我們任何人都不知道，即使最為十惡不赦的罪人是不是在最后的時刻也能懺悔并得到寬恕，因為我們的上帝首先是慈悲的上帝。

我們之所在，我們之所有，甚至于我們的靈魂得到拯救，都是一份禮物，不是我們爭取到的，而是饋贈給我們的禮物。據說上帝對罪人的偏向巨大無邊，以致我們在天堂會碰到我們根本料想不到的人物。（反過來說，我們也會因為應該遇到的人沒有出現而吃驚。當然我們自己得先進天堂才行！）總之，根據這一神學，任何人、任何事都不是毫無希望、無可救藥的。

上帝不會拋棄任何人，因為上帝愛我們每一個人，從現在直至永遠，他愛我們每一個人，無論好壞，直到永遠。他的愛不會遺漏我們任何人，因為上帝的愛是不變的，也是不可改變的。有人說我無法讓上帝更愛我，因為他對我的愛已經盡善盡美了。但同樣，我也無法讓上帝愛我少一點。上帝愛的是原原本本的我，他幫助我成為我所能夠成就的人。當我意識到上帝對我的深愛時，我會盡一切努力為了愛去做能讓我的愛人歡愉的事。如果有人認為這為道德墮落打開了方便之門，那么他一定沒有愛過，因為愛比法律要求得更多。一個疲憊不堪的母親本該就寢休息，但為了看護生病的孩子，她可以毫不猶豫地徹夜不眠。

我在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聽取違反人權的罪犯講述他們的罪行時便意識到，我們每一個人實際上都能夠做出最可怕的邪惡行為—我們全體。誰也無法預見，如果受到同樣的影響，處在同樣的境地，我們會不會成為和罪犯一樣的人。這并不是縱容或原諒他們的行為。這是要讓心中充滿更多的上帝之愛，為看到他所愛的人走上這樣的悲傷之路而哭泣。我們必須從內心深處而不是出于虛假的虔誠對自己說：“為了上帝的慈悲我向前行。”

不幸中之萬幸，當我聆聽受害者的陳述時，我對他們的寬宏大度感到了驚訝。經歷了如此深重的苦難之后，他們不是渴望復仇，而是表現出了非同尋常的寬容意愿。于是我感謝上帝，讓我們所有人，甚至于我，都具有行善、寬容和大度的不凡能力。

神學幫助我們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人認識到，我們身處一個道德世界，善與惡都是現實，而且關系重大。道德的世界就意味著，盡管有不少現實不盡如人意，但邪惡、不公和壓迫無論如何不會最終占上風。對我們基督徒來說，耶穌基督的死去與復生，就證明了愛比恨強大，生命比死亡強大，光明可以戰勝黑暗，歡笑、快樂、熱情、溫情和真誠，都遠勝于其對立面。

在委員會，我們親眼看到這一切在我們面前展開。那些在種族隔離歲月中趾高氣揚，隨意拋撒死亡、不公和種族隔離各種虐政的人，做夢也想不到他們在陰暗世界中參與的暴行也有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的一天。他們原本得意地認為自己想主宰天下多久，就可以多久。如今一切都已大白于天下，而且不是什么推測或者無根無據的指控。不，完全是罪犯親口道出的事實：他們如何綁架、如何槍殺、如何掩埋尸體或拋到河里喂鱷魚。他們幫我們找到50具被他們秘密綁架、殺害和掩埋的尸體。如果這不是一個道德的世界，真相必將大白于天下的話，那么這些令人不寒而栗的秘密將永遠被掩蓋。

在斗爭最艱難的日子里，人們面對猖獗的邪惡勢力常常士氣低落。這時我會說：“這是一個道德的世界—種族隔離的捍衛者已經失敗了。”我也曾向我們的南非白人同胞呼吁：“我們在善待你們，加入必勝者的行列吧！”我們這些為反對種族隔離而斗爭的人得到了最為輝煌的勝利。而勝利屬于我們每一個人，同屬于白人和黑人—上帝的彩虹子民。

[[1]](#_1_6) 《南非的精神》（The Mind of South Africa），Bollantine叢書，1991年紐約出版。

# 第六章 受害者，抑或幸存者的國度？

設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所依據的法律中所規定的參數，從某種意義上講是武斷的。我們完全有理由回溯到范·里貝克的年代，或者宣布凡不是白人的人都自動具有受害者的資格，因為他們都遭受過種族隔離的折磨。但這就意味著要處理幾百萬人的問題。顯然，無論如何應付，都無助于創巨痛深、四分五裂的人們的復原與和解。再者，如果所有受害者都是黑人，就太過偏頗，使這一進程從一開始就不可能起到彌合裂痕的作用。

為從壓迫到民主的艱難過渡而進行談判的人們，明智地選擇了有限但可應付的規模。他們規定的時間限度并非完全武斷。1960年3月21日的沙佩維爾大屠殺的確是一個分水嶺，因為此后重要的黑人政治團體被禁，并轉化成解放運動，不得不放棄非暴力，進行武裝斗爭。1994年5月10日這個截止日也非常重要，因為那是曼德拉就任總統的日子。如果說有什么事件可以標志新制度的開始的話，那么正是這一天表明了我們與沖突、分裂和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過去的徹底決裂。委員會的任務就是在較短的時間內—兩年，后來延長到三年—解決這一段歷史中尚可應付的問題。為了使全國不至于長期陷入追究過去這一分裂人心的過程，我們在1998年10月提交了《報告》，但大赦過程在委員會其他工作宣布“暫停”后一直持續到1999年。

為了確定委員會的工作坐標，建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法案必須定義何謂“對人權的嚴重違反”。這被限定為殺害（無論是否有預謀）、綁架、酷刑和嚴重虐待。這一相當武斷的定義至少有兩點好處。首先，將罪行限定為這四類，使委員會的工作有一定限量，有望在期限內完成。接替曼德拉擔任非國大主席、后來成為南非總統的塔博·姆貝基，向委員會熱切地呼吁，不要給新政府留下尾巴，特別是大赦的尾巴。1996年他代表非國大在委員會作證時說：

委員會在其任期內結束大赦過程，也是非常重要的。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民主國家不必承擔刑事調查和對在本應由委員會負責處理的期限內犯罪的人進行起訴……我們認為，委員會應盡快結束其工作，使我們的確能夠讓過去成為過去，盡管我們不敢淡忘。

但法案的定義之所以重要，還有另外一個關鍵因素。它意味著委員會的確可以不偏不倚地認定受害者，因為罪犯的黨派背景在確定其行為或罪行是否構成對人權的嚴重違反時不在考慮之內。如果一個國民黨人綁架、折磨或殺害了某人，則構成對受害人人權的嚴重違反；如果這是過去沖突的結果，則屬委員會的法定職責之內。如果非國大黨員犯下同樣的罪行，根據法案的定義，亦構成對人權的嚴重違反。因此，不論是種族隔離的支持者還是推翻者，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我們費盡心機說明法律上的平等不等于道義上的平等。一個女子開槍打死企圖強奸她的人，行為本身構成他殺。搶劫犯殺死他所劫持的汽車的主人，這也是他殺。女子的行為可以被宣布為正當防衛，她的勇敢甚至會得到贊譽。而搶劫犯則犯下了殺人罪，會得到相應的懲罰。

有人批評我們“把解放斗爭變成了罪責”，侮辱了參與斗爭的人，因為我們把他們和種族隔離的捍衛者放到了同一平臺上。最違背真相的言論也莫過于此。我們遵從的是法案的規定。無論誰是兇犯、出于什么動機，嚴重違反就是嚴重違反。國民黨實施酷刑是嚴重違反，解放運動成員實施酷刑同樣是對人權的嚴重違反。

我們明確聲明，種族隔離是對人類的犯罪。我們也同樣堅決地聲明，解放運動開展的是正義的戰爭，因為他們有著正義的事業。但是，《日內瓦公約》和正義戰爭的原則都清楚地指出，戰爭中必須有正義。正義的事業必須通過正義的手段進行斗爭，否則它就可能嚴重變質。

非國大對其陣營中在南非境外的犯罪行為進行了調查，并為揭露出的罪行公開道歉。如果解放運動可以使每一個打著其名義的行為成立，這樣做就沒有道理了。

盡量與更多的南非人接觸，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的目標實際上是要接觸到所有的南非人；讓他們加入委員會的工作進程，任何人都不應被缺省在外，每個人都應知道他們有機會講述自己的經歷，并可能得到賠償。我們的宣傳重點放在最容易為文盲群體接受的廣播上。我們散發小冊子、張貼招貼畫，上面印著鮮明的標志和諸如“真相令你痛苦，但沉默讓你死亡”之類的口號。我們得到了各宗教團體的大力幫助，他們的網絡深入到了南非的各個角落。我們對與我們合作的非政府組織亦深表感謝。國際社會從人力、物力和財力上慷慨相助。沒有這些幫助，盡管我們和其他類似的委員會相比資金已經相當可觀，但也不免會捉襟見肘。我們的確特別幸運。整個世界都驚喜異常，希望能從南非學到些經驗，幫助解決其他地方的沖突。

我們雇用經過專門訓練的采錄員，奔赴全國各地。他們在志愿者的協助下，記錄下那些認為自己可能在法案規定范圍之內的人的敘述。最后，我們一共收到兩萬份陳述，超出了所有類似的委員會。有些陳述記錄了不止一起違法事件，涉及不止一個受害人。

第一次聽證會于1996年4月在東倫敦舉行。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區別于其他地方類似委員會的另一特征是其公開性。最初有人建議大赦委員會的工作秘密進行，但遭到非政府組織的強烈反對，最終他們的意見占了上風，使委員會的工作具備了令其他國家欽佩的公開性。讓這場大戲如此迅速地拉開大幕，需要大量艱苦的工作。舉行一場聽證會的后勤工作令人咋舌。先要得到陳述記錄，但誰也不能保證人們會走上前臺。他們或許會受到曾迫害過他們的人的恐嚇；或許自認為是參加斗爭的戰士而拒絕被視為受害者；他們也可能感到灰心失望，不再相信那些敏于承諾緩于行動的人能做出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來。

我們沒必要擔心。人們當然想要道出他們的經歷。他們被迫沉默得太久了，幾十年來，他們被邪惡的制度、不公正和壓迫擠到了邊緣，成了無名無姓的隱形人。許多人的情感壓抑已久，一旦得到宣泄的機會，就如同打開了泄洪的閘門。但是，令我們沮喪的是，沒有多少白人站出來；能站出來的都是了不起的人。

我們有幸窺視到許多同胞靈魂的秘密，他們在那里深藏著最為隱秘的憤怒和痛楚。在他們講述了各自的經歷后，我總是禁不住感嘆，這些人看上去是那么正常、那么普通。作證之前，他們談笑自如，就像其他健康人一樣毫無包袱地生活著。但聽了他們的故事后，你就會驚異地問他們，懷著尊嚴和純真、默默地忍受著如此沉重的痛苦和憤怒，究竟是怎么活過來的。被我們倨傲地視為“普通人”的人們，在面對足以摧毀意志薄弱者的巨大挑戰和困擾時，表現出了令人肅然起敬的堅忍。我已經說過，在我遵從的神學中，不存在什么普通人。我們每一個人，由于是上帝的代表，都是非常特殊的人—是比通常的“重要人物”遠為重要、遠為普遍的“非常特殊的人物”。

我們虧欠這些人的，遠遠超過了我們所知道或能夠承擔的。我們必須保證他們的確愿意作證，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會成為公共財富。我們根本無法預知媒體和公眾對這些不得不把自己的痛苦公之于眾的人會作出什么反應。我們給那些將要作證的人提供了心理咨詢，幫他們度過無論如何都非常難熬的時刻。

我們還給證人提供了“陪同員”，負責陪伴證人。作證時，他們坐在證人身邊照顧，在他們痛哭流涕時遞上一杯水、一片紙巾。這種情況時有發生（有些人嘲諷我們是Kleenex[[1]](#_1_9)紙巾委員會）。我們對座次安排慎之又慎。最好的座位是保留給證人的。我們必須避免任何他們在受審的印象，因此證人和聽證的委員會成員坐在一條水平線上。

證人必須感到舒適自在，因此我們堅持他們用自己選擇的語言作證。這就意味著必須使用同聲傳譯，進一步增加了聽證安排的復雜性。證人作證時還允許親屬陪伴。為所有這些可能前來參加聽證會的人安排交通食宿，如同一場噩夢。所幸我的同事及委員會的工作人員非常能干，即使在設備極為短缺的小鎮和鄉村，也能有條不紊地將一切安排就緒。聽證會使用過許多不同的場所—市政廳、公共活動中心，特別是教堂大廳。宗教界在這方面予以的協助，值得熱烈贊揚。

委員會并未得到普天下的一致歡迎。有些人表示強烈反對，特別是那些害怕委員會揭露其罪惡過去或是堅信委員會其實是追殺阿非利卡人的一個聰明伎倆的人。我們擔心這些人會破壞委員會的會議，因而安全成了重要問題。第一次聽證會就被炸彈恐嚇打斷，聽證不得不中止，讓警犬嗅遍全場。幸而是鬧劇一場，但我們不能拿人命當兒戲，更何況我們任務的圓滿完成事關重大。委員會的任何閃失，都會讓反對和解進程的人幸災樂禍。

我們希望人們感到有充分的時間講述其經歷，并得到了應有的認可。因此，委員會只能在特定的領域中選擇具有代表性的證人進行聽證。在進行陳述的人當中，十分之一的人得到公開聽證的機會。那些未被允許作證的人多少感到失望，但他們得到保證，我們會像對待公開證詞一樣，認真對待他們陳述的經歷。

人們如此重視聽證會，或許可以視為對我們的贊許。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媒體發揮了出色的作用。廣播、電視和報紙對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受害者及大赦聽證，進行了連篇累牘的報道。南非廣播公司電臺用11種南非語言對聽證會進行的實況報道因經費不足停播后，立刻引起軒然大波，甚至很少參加聽證但顯然非常關注的白人，也叫苦連天（后來恢復了報道）。海外專家對我們如何利用電視鏡頭提出了很好的建議。我們把鏡頭放在不顯眼的固定位置。攝影師則抱怨說，讓他們把設備固定在一個地方太受拘束，難以施展。

第一次聽證會上氣氛莊嚴凝重。我們深知此舉意義重大，第一次的成敗與否，會對今后聽證會造成或正面或負面的影響。

我們有些忐忑不安。第一次聽證會在東倫敦附近的貧民小鎮姆丹查尼舉行。我們首先進行了感人的多宗教祈禱儀式。有記者問我在第一次聽證會前夕有何感受，我說：

我的心里當然是七上八下的。但能從事這項事業，能看到這么多人表現出的寬宏大度，我又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動。他們希望這件事成功，知道自己的經歷必須傾訴出來，這一進程也必須了結。

我們祈求上帝保佑我們的土地，保佑受害者、罪犯和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我一直堅持用英語、科薩語、索托語和阿非利卡語進行祈禱，以強調委員會屬于所有人。出于同樣的原因，我也用同樣的語言歡迎到會的人，并指出我們民族的多樣性。

市政廳擠得水泄不通，大部分都是黑人。證人面對委員會成員、背朝聽眾而坐（后來我們改變了這一做法）。主席臺一側是翻譯使用的隔間，整個大廳裝飾著鮮花和盆栽植物。警察在入口處對每個人進行檢查，保證了聽證會的安全。

當我們一行人入場時，聽眾都站了起來，全場很快一片肅靜。我上前和將在今后4天作證的證人及陪伴他們的親屬握手。接著，我在肅靜中點燃一支蠟燭，紀念所有在過去沖突中死去的人。我的一位同事誦讀了一份緬懷死者的悼詞，然后我們一起高唱“Lizalis’idinga lakho”（“實現您的意志”）。曼德拉被釋放的第一天在主教廷和他的同志們唱的就是這首歌，在今后無數重要的場合，我們還會唱起同一首歌。

然后，我開始祈禱：

公正、慈悲、和平的上帝啊，我們渴望將種族隔離給我們帶來的痛苦和分裂，將以其名義蹂躪我們社會的暴力，拋在身后。我們請求你，在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開始糾正曾在這里和整個國土上發生的不公這項重要工作時，以你的智慧和指引，保佑委員會。

我們祈禱，希望所有身心受到傷害的人都能通過委員會的工作得到撫慰，并使它成為處理許多人，特別是在東倫敦的受到深重傷害的人們的機構。我們也為那些對其同胞犯了罪的人祈禱，希望他們能夠到這里向萬能的上帝坦白懺悔，并得到你神圣的仁慈和寬恕。我們請求圣靈對委員會和委員們盡顯公正、慈悲和博愛，讓真相在聽證會上得到認可并大白于天下，讓我們按上帝的意志最終實現與我們鄰友的和解與愛。我們以我們的救世主耶穌基督的名義祈禱這一切。阿門。

隨后，我對到會的各位表示歡迎：

我們歡迎所有即將講述自身經歷的人，以及他們的親屬和朋友。我們愿意聽取你們的經歷。舉行這些聽證會的根本原因是：讓違反人權案件委員會幫助（真相）委員會確定某些人是否遭受了對其人權的嚴重違反，宣布這些人為受害者，并將他們轉給賠償和復原委員會。此后，委員會將向總統就賠償的性質和數量提出適當建議。在南非和世界各地曾經和正在為委員會及其工作祈禱的人們，謝謝你們！我們肩負著揭露黑暗過去的真相的使命：埋葬過去的魔鬼，使它永遠不會再回來糾纏我們。我們希望以此撫慰創傷深重的人們—我們所有南非人都受到過傷害，我們希望以此促進國家的統一與和解。我們要指出，在委員會作證的人只要道出的是真相并本著誠意而來，就將得到在法庭作證的同等對待。

接著，我宣布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第一次聽證會開始。重要的時刻終于到了。

我們決定，公開聽證的第一個程序應該是受害者的聽證會，以強調那些長期以來被擠在社會邊緣、無名無姓、無人理會的人終于走出了陰影，并在委員會存在期間，站到了舞臺的中心。我們希望這能夠幫助他們恢復公民和個人的尊嚴。我們保證了作證的受害者盡可能代表最廣泛的政治派別，以達到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必須不偏不倚的要求。這些案件還必須盡量涵蓋規定的34年期間和盡量廣泛的地區。

我們有意選擇東倫敦市作為第一次聽證會的地點，是因為這個地區在南非的歷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在這里，白人和土著人為了爭奪地盤，進行了第一場全面戰爭。東開普省是反對白人擴張主義的黑人抵抗運動的發源地。這里還建立了第一個黑人的高等院校，因而也是黑人求學的發源地。這里還是許多黑人政治領袖的出生地—納爾遜·曼德拉、溫妮·馬蒂奇澤拉―曼德拉、高文和塔博·姆貝基父子、史蒂夫·比科等等。這里是黑人抵抗運動和政治覺醒的發祥地。正因為如此，這里也發生了種族隔離最為殘忍和臭名昭著的暴行。當局將最沉重的黑暗和最深重的壓迫都施加在東開普省了。

我們希望營造熱情、友好和積極的氣氛。我們不希望用冷酷的盤問傷害證人，因此拒絕了讓被指控的罪犯進行交叉訊問的要求。我們說，如果而且只有當委員會通知他們發現對其不利的證據時，他們才有權陳述自己一方的事實。正是這些人曾左右司法程序，并經常得到各級法官的縱容。其中兩個被指控的罪犯的確設法搞到了法庭禁令，使證人不能對他們指名道姓。這使本希望在聽證會上聽到重要人物證詞的人們，大感失望和氣憤。他們通過這種方式阻止我們的一些證人后，卻又不無諷刺意味地在隨后的大赦申請中，供認了他們阻止證人作證的罪行。他們又一次對世界趾高氣揚，顯示法律與公正及道義沒有干系。

我們決意為證人提供安全的環境。因此，無論誰主持聽證，都會像1996年4月15日的第一場聽證會我們對第一個證人那樣，致以熱情友好的歡迎：

伯萊恩博士：我們請諾雷·莫哈比太太上證人席。莫哈比太太，您愿意宣誓還是不經宣誓作證呢？

莫哈比太太：我宣誓。

伯萊恩博士：非常感謝。你莊嚴宣誓，你提供給委員會的證據將是事實，全部是事實，而且只有事實。愿上帝幫助你。

莫哈比太太：愿上帝幫助我。

伯萊恩博士：非常感謝。請就座。我們歡迎您作為第一個證人，進入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工作程序，并回憶您在過去經歷的痛苦。我們許多人還清楚地記得馬佩特拉［莫哈比］死于警察的監禁中。我們記得這些日子的恐怖和憤懣……我們知道……您也曾被拘留，并被單獨關押。我們對您的勇氣深表敬意。您今天到場，表明了您致力于真相、公正和在整個南非實現和解與和平的決心。您作證時，泰尼·馬雅將代表委員會向您提問。歡迎您的到來。

馬雅女士：艾利克斯，謝謝。在我們開始之前，我要指出，證人更希望用科薩語作證。因此，我請不懂科薩語的人戴上耳機，以便我們開始工作。Molo，Sis Nohle。［早上好，Sis Nohle（莫哈比）。］你好嗎？

我主持聽證會時，總是力圖在一天結束時根據當天的氣氛，總結當天的特點。這也是向證人和他們代表的群體表示肯定的機會，是我們所有人從我們民族這一非凡歷程中汲取教訓的機會。我常常向白人同胞呼吁，不要避諱委員會，而應把它當做失而不能復得的機會。我說，那些完全可以渴望復仇的人所表現出來的寬宏大度，應該得到有意或無意地受益于種族隔離的人以同樣的寬宏大量作出的回報。這些呼吁似乎飄教于虛空，不過雖然會場上白人寥寥無幾，卻有不少人通過廣播直播密切關注著委員會的工作進程。例如，在聽證會初期，我曾發言說：

我想讀一讀我昨天收到的兩封信……“作為一個普通公民，我希望告訴您，上星期在東倫敦進行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聽證證詞，令我深受感動和鼓舞。那些殘酷可怕的故事和那些深受創傷的人所表現出來的異乎尋常的寬容，既令我痛苦，又令我歡欣。我們都深受傷害。我寫了一首詩，試圖搞清這一切的意義所在。我希望告訴您，許多人都深深同情那些人。痛苦是我們大家的。謝謝您，謝謝你們所有人，感謝你們自身的人格，也感謝幫助我們撫平創傷。”詩是這樣的：

“世界在哭泣。

鮮血與痛苦深入我們的耳廓，進入我們受傷的靈魂。

你的啜泣就是我的垂淚；

你濕透的手帕，我淚浸的枕畔

為那尚且不能平息的疲憊的過去。

說吧，哭吧，看吧，聽吧，為了我們所有的人。

啊，屬于沉默的掩藏的過去的人們，

讓你的故事在孤寂恐懼的風中播撒種子。

播撒吧，直到僵硬的大地開始融動

開始企盼、微笑和歌唱；

直到鬼神可以狂舞

直到我們的生命知曉了你們的痛苦

直到復原。”

最后我進行了總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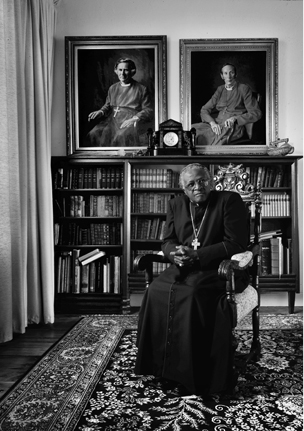
當我們聽到彼此之間人性的墮落可以達到何等地步時，我們感到震驚和惡心。我們可以為彼此造成的痛苦而感到嗜虐般的快感，可以把殘忍推向極致，讓親人為親人的死活和去向費勁猜疑，讓他們從一個警察局到另一個警察局，從醫院到停尸房徒勞地奔波。這是一方面—到目前已經顯現出來的陰暗而沉重的一面。

但還有另外一面—崇高和激動人心的一面。我們為人的精神的堅毅而深深感動。本該一蹶不振的人們，拒絕屈從于巨大的痛苦、暴力和威脅；拒不放棄自由的希望，因為知道自己應得到比遭受非人的不公和壓迫更好的命運；拒絕在威逼之下俯首帖耳。人們表現出的寬宏大度，令人難以置信—他們不愿被痛苦和仇恨吞噬，愿意和那些曾踐踏自己人格、侵犯自己權利的人見面，愿意以寬容與和解的精神相會。他們急切想知道真相是什么、罪犯是誰，以便寬恕他們。

我們感動得潸然淚下。我們歡笑，我們沉默，我們直面野獸般的黑暗過去。我們經受住了煎熬，我們意識到我們的確可以超越既往的沖突，挽起手實現我們共同的人性……寬容的精神相遇時，寬容會盈溢而出。坦白之后，寬容會接踵而至，繼而是創傷得到撫慰，民族實現團結與和解。

這就是受害者聽證會的通常情形。在一年半的時間里，這成了委員會家喻戶曉的公眾形象。在南非，如果有人說“我不知道啊”，是沒人會相信的。

[[1]](#_1_8) Kleenex，一種紙巾品牌。—譯注

德斯蒙德·圖圖（CFP供圖）

1960年3月21日，沙佩維爾屠殺。被警方殺死的69人，多數從背部中槍身亡，另有176人受傷。

1984年10月12日，德斯蒙德·圖圖領受諾貝爾和平獎。圖圖大主教以非暴力方式為反抗種族隔離制度做出巨大貢獻，因此榮獲1984年的諾貝爾和平獎。（CFP供圖）

1990年2月12日，南非開普敦，曼德拉出獄后第二天。左起：德斯蒙德·圖圖大主教、曼德拉、溫妮·曼德拉和沃爾特·西蘇魯。（CFP供圖）

1994年4月，南非舉行首次不分種族的大選，非洲人國民大會獲勝，曼德拉當選為總統。圖為黑人城鎮居民排隊等待投票。（CFP供圖）

2009年8月12日，美國華盛頓，奧巴馬總統為圖圖頒發“總統自由勛章”。同時獲獎的包括英國物理學家霍金、奧斯卡第一位黑人影帝西德尼·波蒂埃、美國資深參議員愛德華·肯尼迪等16人。（CFP供圖）

2008年7月12日，英國斯托克城，球王貝利與前英格蘭隊守門員戈登·班克斯各自領隊進行友誼賽。圖為貝利（中）與圖圖（右）在場外觀戰。（CFP供圖）

2010年6月21日，南非開普敦，圖圖參加2010年南非世界杯新聞發布會。（CFP供圖）



2010年5月29日，約翰內斯堡，曼德拉與國際長者會成員會面。左起：曼德拉夫人格拉薩、巴西前總統卡多佐、圖圖、美國前總統卡特、愛爾蘭前總統瑪麗·羅賓遜、聯合國前秘書長安南、挪威前首相布倫特蘭夫人、芬蘭前總統阿赫蒂薩里、印度自我就業婦女協會創始人埃拉·巴特、聯合國前特使拉赫達爾·卜拉希米與曼德拉（坐者）。（CFP供圖）

2013年2月26日，圖圖造訪緬甸仰光，在昂山素季寓所與她會見。（CFP供圖）





2013年6月27日，南非開普敦街頭掛出曼德拉與圖圖的巨幅照片。當時曼德拉因肺部感染入院治療已20天，此舉意在為曼德拉祈福。（CFP供圖）

2014年3月3日，英國倫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舉辦緬懷南非前總統曼德拉的活動，圖圖大主教在活動上發表講話。曼德拉于2013年12月5日去世，享年95歲。（CFP供圖）



# 第七章 “我們確想寬恕，但不知寬恕誰”

當我聆聽來到委員會的人講述他們常常是難以承受的痛苦經歷時，當我翻閱那些犯下滔天大罪的罪犯在申請大赦時披露的事實時，我總是不禁要問，上帝是否有時也要嘀咕當初為什么把我們造出來呢？

寫作此書時，正值北約進攻科索沃和塞爾維亞。我們聽說塞爾維亞人在米洛舍維奇總統的領導下正在趕走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族人，開始了又一次的所謂種族清洗。不時有不可言狀的惡行的報道：婦女兒童被告知逃離家園，并保持沉默，否則就會被殺；男人被成群驅趕著，執行集體槍決。我想整個世界都無法忘記一個年輕人用手推車把岳母推到安全地帶的情景。這已經成為上帝的一些子孫遭受另一些子孫帶來的痛苦的形象定格。或許，這會像越戰期間那個赤身裸體從汽油彈的轟炸中死里逃生的小女孩一樣，成為這場屠殺難以磨滅的形象。

我斗膽想象上帝巡視著人類歷史上的遍地殘骸：血腥的十字軍東征和以上帝名義進行的其他戰爭。大地浸透了在暴行中死去的無辜者的鮮血。還有本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在柬埔寨和盧旺達的大屠殺；在蘇丹、塞拉利昂、兩個剛果、北愛爾蘭和中東的可怕仇殺以及讓拉丁美洲深受其害的暴政。這惡毒的清單記錄了我們喪失人性、彼此傷害可以達到何等地步。我可以想象上帝巡視著這一切，哭泣著，就像耶穌對著鐵石心腸的耶路撒冷在哭泣，因為他回到自己人中間卻得不到接納。如果上帝真的感到創造我們是個錯誤，那么我們的確為他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創世記》中記載：“耶和華見人在地上罪惡很大，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耶和華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憂傷。”（第六章）

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恐怖，杰弗里·斯圖德爾特·肯尼迪牧師在他的詩中思忖著人類的行為給上帝帶來的痛苦：

面對可悲可恥的故事

還有陽光下的人類罪惡，

如何能夠安之若素？

上帝的主宰何來榮耀？

何處能安享他的慈愛？

永恒的心中難道無淚？

上帝的靈魂難道未被痛苦撕裂？

他定是陰間地獄的魔王，

揮舞大棒將人間擊成了碎片。

如果上帝基督讓你睜開雙眼，

如果你第一得到了上帝的感召，

你就定是受難者和撫慰者

讓利劍的苦痛刺透了你的心。

這意味著，你的悲苦

將你擊倒在那孤苦的樹下，

而今朝今昔、明日明夜，

圣明的上帝還將與你同在。[[1]](#_1_11)

當我聽到在我們彼此間發生的痛苦行為時，我多次想到上帝的悲哀。這些可怕的事情難以用言語表述，也讓我們對自己是否有權利被稱為人產生了懷疑。在這樣的時刻，完全可以理解為什么把這些可怕行為的實施者叫做魔鬼，而不值得再把他們視為人。他們的行為使所有正直的人充滿了義憤和憎惡。這些罪犯來自長期困擾我們這塊土地的沖突各方。

5名警官在大赦申請中，詳細講述了他們在比勒陀利亞地區是如何殘酷折磨幾十個所謂“恐怖分子”，殺害他們并處理尸體的。電擊這種刑罰已經司空見慣，以致其中的一個警官可以無動于衷地說“我們像對付前兩個人那樣審訊了塞法魯”，如同例行公事，沒什么值得大驚小怪的。實際上，委員會確認，安全警察認為使用酷刑是理所當然的事。

請看看5個警官之一、準尉保羅·范·弗任警官的證詞。他曾屬前德蘭士瓦省北安全分局，被同事稱為“電工”。

我們像對付前兩個人［杰克遜·馬科和安德魯·馬庫貝］那樣審訊了塞法魯（哈羅德·費羅）……我們使用了一種黃色的羅賓牌便攜式發電機，對他的身體進行電擊，逼他開口……一共兩條電線，分別接在他的腳上和手上。我們打開發電機時，他的身體挺得僵直……塞法魯是個堅強的人，而且堅信……自己做的是對的……審訊后，他供認自己是沃特班克非國大的高層組織者……

喬·馬馬塞拉把刀子從下面捅進他的鼻子后，他給我們提供了更多消息。他請求饒命，還問是不是可以唱“Nkosi Sikelel’iAfrika”（《上帝保佑非洲》）[[2]](#_2_3)。然后，他說我們還不如把他殺了。他還說非國大終有一天會掌權，種族隔離不會長久……（我們把馬科電死后）馬馬塞拉用非國大旗幟蓋住了他的尸體，而塞法魯在一邊唱著“Nkosi Sikelel’iAfrika”。然后，我們把馬庫貝也電死了……

我們只有殺了他們，才能摧毀整個組織。誰也不知道他們出了什么事。之后，我們用地雷把他們炸成了碎片，讓別人無法辨認……必須搞得好像他們是在布地雷……我們不喜歡干這種事情，也不想干，但我們必須阻止他們殺害無辜的婦女和兒童。此外，我們和非國大在交戰，也必須除掉他們。塞法魯在我們殺害他的過程中的表現，讓我對他深感佩服。

德克·克埃茲曾是比勒陀利亞附近“Vlakplaas”的頭目。這實際上是臭名昭著的警察死刑隊的總部。克埃茲、阿爾蒙德·諾夫梅拉和大衛·施卡蘭加為謀殺德班著名律師格里菲斯·姆先格而申請大赦。

克埃茲對大赦委員會說：

決定是納塔爾港安全警察局的揚·范·德霍芬準將……作出的，他告訴我（姆先格）是肉中刺……因為他是所有非國大干部的教官……而且他嚴格以法律為依據。因此，他們拿他沒辦法……我以前從沒聽說過這個名字，直到接到指示，制訂針對格里菲斯·姆先格的計劃。這只意味著一件事—除掉他，殺掉他，再無其他……就是要害了他、殺了他。

克埃茲在接受南非廣播公司安吉·卡佩里安妮斯的采訪時，講述了如何選擇下述黑人警官實施謀殺計劃的：

……布賴恩·恩古蘭加被選中，因為他是祖魯人，了解那個地區，通曉……當地語言……我1973年就認識大衛·施卡蘭加，他為我干事……我則幫他當上了警察，而且進了Vlakplaas，所以是個信得過的人。阿爾蒙德·諾夫梅拉是個嚴肅的家伙，很合適……有猛虎一樣的膽量。如果你要辦什么事，阿爾蒙德沒有二話。他有膽量。喬·馬馬塞拉更是再合適不過，有殺人的“本能”……煙酒不沾，簡直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殺手。他根本住不了手，他的槍也一樣閑不著……

謀殺偽裝成一次搶劫，小組的人用刀和車輪扳手襲擊了姆先格：

……施卡蘭加首先動了刀……他沒法把刀從姆先格的胸上拔出來……然后姆先格顯然自己把刀拔了出來，并拿著刀追他們，這時阿爾蒙德用車輪扳手把他打倒在地……接著阿爾蒙德和喬開始瘋狂地用刀捅他。

大赦專門委員會的副主席安德魯·威爾遜法官在大赦聽證會上詢問了諾夫梅拉：

威爾遜：你能說出……他被捅了那么多刀的原因嗎？

諾夫梅拉：我想原因就是……他總是不倒下。他一直在反抗。

威爾遜：他反抗是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是不是？

諾夫梅拉：是的，先生，沒錯。

威爾遜：他有武器嗎？

諾夫梅拉：沒有，據我所知沒有。

克埃茲在廣播采訪中說，他們捅刀子的時候，他正在“德班城里喝酒兜風……歡宴狂飲，就等著跟他們的接頭時間一到，跟他們見面，問一聲一切順利嗎？沒出什么岔子吧？好，（咱們去）慶祝一番”。

廣播采訪還報道了維多利亞·姆先格太太是如何在政府的停尸房找到丈夫尸體的：

在他身上、肺部、肝部和心臟，共45處被割被捅的傷口。他的喉嚨被割斷，兩個耳朵幾乎被割了下來。肚子也被開了膛。

殺手處在瘋狂之中，但話說回來這又只是他們的工作，冷酷無情執行的工作，因為他們跟姆先格并無個人恩怨。他們好像沒有情感，不過是一部無情的效率極高的殺人機器的部件。

下面是德克·克埃茲在大赦申請中就殺害被警察綁架的一個東開普年輕人提供的供詞：

水里滴了藥水，然后灌進希茨維·孔迪勒嘴里……之所以（這樣）把昏迷藥給他灌下去，是因為我覺得任何頭腦清醒的人……都不可能有膽量就那么……面對著另一個清醒的正常人……用槍抵住他的腦袋把他殺死。阿奇·弗萊明頓少校手下的一個人拿了一把裝上消音器的手槍，趁……孔迪勒先生仰面躺在地上的時候，沖他頭頂開了槍。人抽搐了一會兒，就完了……4個尚未進入現役的下級軍官……每人提起一只手或腳，把尸體扔到輪胎和木柴堆上，澆上汽油，點著了火……這一切進行時，我們在喝酒，甚至還在火堆邊吃燒烤。

我說這些不是為了顯示我們的“膽量”，而是要告訴委員會這一切是多么殘忍，而在那些日子里，我們又走到了什么樣的地步……需要7個小時才能把尸體完全燒成灰。大塊的肉，特別是屁股和大腿，必須在夜間不斷翻動，才能保證一切都燒成灰……第二天早晨，我們把灰燼仔細檢查了一遍，確定沒有剩下一塊肉、一根骨頭，然后各自散去了。

人能夠槍殺另一個人，并竟然在尸體火化時在一旁吃燒烤，這令人毛骨悚然。他們這么做，人性何在？他們怎么能咽得下去？對大部分正常人來說，焚燒尸體的臭氣令人翻腸倒肚地惡心。難道他們帶著雙重人格—把自己分裂為兩個人—生活下去嗎？在這樣的外出之后，他們如何還能回到家里，擁抱妻子，享受—比方說—孩子的生日聚會呢？

在東開普的許多案件中，人消失得無影無蹤，因為尸體被燒成了灰。但是在“科拉多克四人幫”的案件中，1985年6月幾個活躍分子在從伊麗莎白港到克拉德克小鎮去的途中被綁架，失蹤一個星期后，人們發現了他們被肢解的尸體。然而，殺害馬修·格尼維、福特·卡拉塔、斯貝羅·穆孔托和西塞羅·姆拉烏利的全部真相和兇手的身份，直到委員會成立后才披露出來。

代表被害人親屬出庭的喬治·比祖斯大律師，詢問了申請大赦的警官之一約翰·馬丁·范·澤爾。

比祖斯：范·澤爾先生，在27日晚你們殺害的4個人身上發現了63處刀傷。你是否同意地區法醫對此的報告？

范·澤爾：主席先生，我不能不同意。

比祖斯：你是否同意這63處刀傷是野蠻行徑的證明？

范·澤爾：主席先生，反省之后，當然是這樣。可事實上，下達的指令是這次要殺得像聯防治安襲擊，如果用稍微仁慈一點的做法，就達不到同樣的效果。

比祖斯：你的回答是否意味著你愿意像一個殘忍的野蠻人一樣行動，以便誤導那些可能調查這起兇殺案的人呢？

范·澤爾：主席先生，實際上是的。

被捕的非國大活躍分子，面對監禁甚至死亡的威脅，有時會同意為警察辦事。他們被叫做“askaris”[[3]](#_3_3)，在Vlakplaas的喬·馬馬塞拉就是其中的一位。根據他自己的供詞，他曾參與了幾十起對政治活躍分子的殺害活動，常常是打入青年團體內部，假裝招募他們進行軍事訓練，然后把他們引入警察設下的死亡圈套。首席檢察官想讓他作為國家證人，并以此換取免于公訴。在首席檢察官的保護下，喬拒絕了申請大赦，這既是藐視委員會，也是對他前主子表示憤恨。在他過去同事的大赦申請聽證會上，他就1985年殺害伊麗莎白港黑人公民組織領導人“培伯克三人組”（Pebco Three）一案提供了證詞：

在這個魔窟的所有經歷中，我從沒聽說什么叫干脆利落地殺。根本沒有這么回事，這只存在于那些到這里來、不想讓其他人承受不必要痛苦的誠實和體面的人的心里。根本沒有這回事—人總是被殘忍地殺掉，死得連豬狗都不如，這才是事實……安全警察的目的，不僅僅是殺人，還要……在你斷氣之前盡量挖出他們想要得到的消息。施加的痛苦越重越好。這是一種施虐狂似的、精心設計的殺人方式，他們知道這一點，我也是其中一部分。

培伯克三人組包括斯波·哈舍、尚比龍·加勒拉和恰恰烏里·戈多羅茲。他們在克羅多克附近一個廢棄的派出所被殺。馬馬塞拉告訴委員會，哈舍先生對他的審訊者說，非國大“代表著民主的南非”。

這一回答似乎比什么都更讓［吉德昂·］紐武德中尉惱怒，他抓起一根鐵管，朝那可憐的老人頭上不停地擊打，其他人見他這樣也一擁而上……他唯一的一點反抗就是擊打聲中的哀號。接著，紐武德中尉命令我把他的手塞到他的嘴里，止住他的叫聲，免得驚動附近的農民。我和皮埃特·莫格埃拼命止住老頭的叫聲，我說的其他人則對他拳腳棍棒相加。

紐武德中尉用鐵管數次擊打老人的頭部時，我看到鮮血從他的鼻孔、耳朵和嘴巴里涌了出來。我看到老人的眼球翻成了白色，而且還在轉，似乎他就要昏迷或是死去……毆打一直沒停，直到我看見老人滿頭滿臉是血地趴在地上……

在毆打尚比龍·加勒拉的時候，發生了極為野蠻的事……準尉比斯拉爾掏出尚比龍·加勒拉的睪丸用力捏，直到擠成了高爾夫球大小。然后，他用右手使勁擊打，打得很重。我眼看著他在變，他的臉色由慘白而發青，一些黃色的液體從他的生殖器中濺射出來。這是我在Vlakplaas的整個生涯中經歷的最野蠻的事。我在這個魔窟中已經待得夠久的了，我知道它是怎么回事，但我作為這些人的戰俘，從未見過這樣的事。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是我一生中經歷的最喪盡天良的事。

馬馬塞拉曾滲透進去并把他們引向死亡的另一群人，是后來所謂的“克瓦恩德貝利九人團”（KwaNdebele Nine）。1986年7月，這群年輕人在從比勒陀利亞以東的黑人城鎮馬梅洛地逃往農村的克瓦恩德貝利黑人家園途中被殺。馬馬塞拉對委員會說：

在“克瓦恩德貝利九人團”的案子里，他們在一所房子里遭伏擊，九人全部被槍殺。殺他們用的是AK-47沖鋒槍，然后［雅各·］厄克特中尉……拿來一大（桶）25升汽油，澆在所有尸體上，點著了火。有的人還活著，可以聽到他們的慘叫，所有人都被焚燒了。

在斗爭的另一方，不斷有人指控納爾遜·曼德拉的前妻溫妮·馬蒂奇澤拉―曼德拉說1988至1989年由她在索韋托操縱的所謂“曼德拉聯合足球俱樂部”，并非一群改邪歸正的小青年和她的保鏢。據說他們是一群小流氓，恐嚇、縱火、綁架和殺害那些被他們視為“出賣者”，即為警察充當奸細、與“制度”合作的人。據說那些被懷疑為此類的人被施以酷刑，并常常被處決。人們說，他們這樣做不僅得到曼德拉夫人的慫恿，而且得到她的支持和鼓勵，甚至更令人不安的是，得到她的指使。在多項主要指控中，有一個轟動事件，涉及的是14歲的活躍分子斯登皮埃·賽伊佩伊。他從家鄉奧蘭治自由州的警察局逃了出來，躲避在循道宗牧師保羅·維尼（后來成為主教）家中。1991年，曼德拉夫人被判從那里綁架了斯登皮埃。她稱自己是從維尼那里救出了孩子，因為她發現牧師對前來避難的男孩子有雞奸行為。1989年1月，在荒野里發現了斯登皮埃被肢解的尸體。

我們對曼德拉夫人的保鏢進行了特別聽證。聽證共持續了9天，是對一個政治領導人進行的為期最長的聽證。一個接一個的證人指證她參與了襲擊和殺害行為。足球俱樂部的“教練”是杰里·理查森，在委員會成立前幾年，就被控殺害斯登皮埃，并被判處終身監禁。他從監獄來到委員會，講述了斯登皮埃和另外三人是如何被綁架和審訊的：

我們用布爾人折磨自由戰士的方式折磨這些孩子。我對斯登皮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從兩側把他舉起，然后把他摔在地上。“媽咪”［曼德拉夫人］坐在一邊看著。

一兩天之后，一個被他稱作“快刀”的幫手把遍體鱗傷的斯登皮埃帶到了索韋托郊外一個荒無人煙的地方：

……我把他給宰了，就像宰一只羊似的宰了。我們讓他趴在地上，我把剪枝用的剪刀插進他的脖子里。剪子扎進去后，我就開始動手了……

我是按照媽咪［曼德拉夫人］的指示殺死斯登皮埃的。媽咪自己從不殺人，但她利用我們殺了很多人。她甚至不到監獄來看我們。她利用了我們！

理查森說他還殺了普萊斯拉·莫索郁。她別號谷奇·澤瓦尼，是足球俱樂部一個成員的女朋友，被懷疑是內線，1988年12月死于多處刀傷：

我用刀捅她，還割斷了她的喉嚨。我們把她的尸首扔了……我向媽咪報告說：“媽咪，我已經完成了您的命令。我已經把谷奇殺了。”媽咪擁抱了我，說：“我的好孩子，我的好孩子。”

尼克德姆斯·索諾先生向我們講述了最后一次見到兒子的情景。曼德拉夫人用小面包車把還活著的他的兒子帶到他這里：

……他渾身是傷，臉上全是青紫色，實際上全腫了，好像有人把他打了一頓，又撞到了墻上……曼德拉夫人對我解釋說魯羅是個奸細……我開始求她。我跟她說，求求您，既然魯羅已經挨過揍了，就把他交給我吧。如果要懲罰，他受到懲罰我可以理解，您難道不能把他交給我嗎？……她拒絕了，還提高嗓門大聲說：“我不能把他交給你。他是個奸細。”

又央求了一會兒之后，曼德拉夫人坐在車里繞著索諾先生的住處轉了一圈，然后同意魯羅的父母給他拿一件套頭衫。索諾先生回到車邊看到了兒子：

我看到魯羅的時候，他狀態很糟糕，他渾身發抖……我又開始乞求曼德拉夫人：“求求您，我的兒子已經挨了打，您就不能把他留給我嗎？”……她斷然拒絕：“這是個奸細。”她又對……司機說：“開車。”于是他們開走了。司機啟動車的時候我一直在求她，直到她說：“我要把這條狗帶走。（解放）運動組織會看著辦。”

彼得·斯多利主教是當時約翰內斯堡地區循道宗的領袖，曾任教會的主席和南非教會理事會的前主席。他向我們詳細講述了教會為救出斯登皮埃和其他被綁架男孩子所作的努力。他的結論是：

我認為曼德拉夫人知道斯登皮埃出了什么事，也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如果斯登皮埃真的是在她的住所被殺或被折磨得半死的話，我想她應該知道……

阿扎爾·卡查利亞和墨菲·莫羅貝是大眾民主運動這個松散的內部反種族隔離組織的領導人。他們告訴我們，斯登皮埃死后，他們公開發表聲明，疏遠曼德拉夫人和足球俱樂部的行為。卡查利亞先生解釋說：

當時我們認為已經存在客觀事實。首先，包括斯登皮埃的4名男性被從牧師的住處帶到曼德拉家里。其次，他們被迫滯留曼德拉家時遭到毒打。第三，一個叫肯尼斯·克加塞的年輕人1月7日逃了出來，并報告了他的遭遇。第四，斯登皮埃不僅在家中被拷打，而且隨后被殘酷殺害了。

對曼德拉夫人來說……從好處說她是知道而且鼓勵了這一犯罪活動。從壞處講，她可能指揮并積極參與了這些活動。第六，保羅·維尼被陷害。第七，教會、社區領袖、曼德拉先生和［非國大］主席奧利弗·坦博尋求曼德拉夫人的合作、遣散這群小流氓的努力，均告失敗。

斯多利主教總結說：

主要的毒瘤可能是、過去是、將來也是種族隔離壓迫，但二級感染（Secondary infection）已經影響到許多種族隔離的反對者，侵蝕了他們分辨善惡的能力。生活的悲劇之一，就是我們可能變成我們自己所憎恨的東西。我總覺得這場悲劇就是一個例證。

下文講述的是1986年在德班海濱的“Why Not”和瑪古酒吧外發生的非國大汽車炸彈事件。格萊塔·阿佩爾戈蘭和羅伯特·麥克布萊德一起被捕。爆炸使3人喪生、69人受傷。格萊塔本是羅馬天主教徒，后改信伊斯蘭教，取名扎哈拉·納克迪恩。我們在南非廣播公司制作的紀錄片中通過安吉·卡佩里阿妮絲的報道了解到事情的經過：

1986年冬。扎哈拉·納克迪恩和羅伯特·麥克布萊德在遠東蘭德省的尼杰爾被押上車。他們的雙手被銬在背后。厚重的呢大衣把他們從前到后遮住，擋住了整個臉。他們就這樣坐了三個小時的車，汗水浸透了大衣。在德班的CR斯瓦特警察局，扎哈拉·納克迪恩被審訊并受到折磨。在13層樓上，酷刑日復一日，整整持續了一個星期。當他們辱罵她的時候，她就轉動手中的念珠……默默祈禱。

納克迪恩女士也因其在爆炸案中的角色而到委員會接受訊問。她在約翰內斯堡的一次聽證會上，講述了未經庭審便被監禁的人和囚犯在獄中受到的待遇。她首先講述了她遭受的酷刑和單獨監禁：

開始7天，他們的確沒少折磨我，因為我覺得我沒有必要合作……我為自己是MK ［Umkhonto we Sizwe，非國大的武裝派別“民族之矛”］的同志而驕傲，為自己參加了斗爭、是個革命者并愿意承擔后果而驕傲。他們想從我嘴里得到一些東西，所以折磨了我7天。但最終把我打垮的，是他們威脅要到我姐姐住著的我的住所，把我4歲的外甥抓來，從13層樓上扔下去。

這時候我感到極端的虛弱，因為我覺得我可以用自己的生命冒險，把我自己交給這些人，任他們糟蹋，但是我不能把別人的身體交出去，于是這時候我答應與他們全面合作。此時，我已經變得越來越虛弱……［他們］常常在7點半或8點早飯后，把我提出來審訊一整天，接著持續到夜里，一直折騰到凌晨兩三點鐘。我始終都得站著，他們一群人對我謾罵尖叫，但我可以忍受，因為我可以默默祈禱，對他們的謾罵充耳不聞。

他們開始意識到我可以忍受這種謾罵，于是找來了一只塑料袋……一個人抓住我的雙手，另一個則把塑料袋套到我的頭上……然后，他們把口扎緊，使我不能呼吸，并持續了至少兩分鐘。塑料袋已經粘到我的眼瞼、鼻孔和嘴巴上，我的整個身體開始抽搐，因為我真的無法呼吸……

折磨我的時候，他們總安排一個女的在場。他們問她是否要避開一會兒，因為他們要加重刑罰。這些日子我一直穿著同樣的衣服，一條長裙，而且還有月經……血流得很多。他們讓我躺在地上做各種運動，用手把身體支撐起來，即他們所謂的俯臥撐，然后減少手指數量，直到我只能用兩個手指支撐身體。這時，我已經不行了，因為我太累了，渾身酸痛，我只能摔在地上，再撐起來，每摔下去一次，膝蓋都磕得生疼。我倒下去時，他們就踢我、踩我……

接著，她被關了100多天的單獨監禁：

真正讓我難受的是那些老鼠……老鼠很大，像貓似的，囚室里有，走廊里更是從沒少過。我坐在那兒吃東西，三只老鼠就會蹲在旁邊看著我。我在院子里祈禱時，老鼠就在周圍，我把它們轟走，但一會兒它們就又回來了……一天晚上，一只老鼠爬到了我的身上，我沒有在意，直到它一直爬到我的脖子上。我像瘋了一樣，尖叫聲響徹整個監獄……看守跑了過來……看到我蜷縮在角落里，啃著自己的T恤衫。我給驚嚇到了這樣的地步。

在彼得馬里茨堡庭審時，她被女獄監當做危險的恐怖分子，并根據監獄規則，每天被迫兩次脫得精光：

我不得不赤身裸體地站著。我曾說：不，我再也不給你脫褲子了。你盡管搜吧，你搜完了，我會很快脫下來的。

被判監禁后，在種族隔離下被劃分成“有色人”的納克迪恩女士，因為和其他囚犯發生沖突而受到黑人同志的指責。她被送進單人囚室關了7個月：

所以，我必須為自己是有色人付出代價。這是我第一次面對自己屬于少數人這一事實……即使我的同志也利用我不是真正的非洲人這一點。我很痛苦……我的父母一直教導我，祖魯祖先對他們多么重要，因此還要被自己的同志折磨，令人痛心……

我簡直不愿再提我必須具備怎樣的心理狀態才能活下來。總有一天，我會寫下來，但我說不出來。不過，我的確學到了點東西……即人不能單獨活著……因為自己一個人是無法生存下來的……隨著日子一個月一個月地過去，我感到自己在一點點沉入地獄……孤獨的日子一個月一個月過去，我覺得上帝拋棄了我，整個世界拋棄了我，我一個人孤零零地處在整個宇宙中……

現在我已經出獄……7年，但還沒有恢復，也永遠不會恢復了。我知道，我不會……出來后的前兩年，我盡量使自己正常，但我越努力，越感到不安。我必須承認自己受到了傷害，我的一部分靈魂被蛆吃掉了。這聽起來很可怕，但我永遠找不回來了。

比爾·莫葉斯為美國公共廣播公司（PBS）制作了題為“面對真相”（Facing the Truth）的有關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紀錄片。其中也不乏相似的故事。他采訪的人中有一位叫唐迪的索韋托婦女，在監禁期間也遭到折磨。她屢遭奸污。她說她能活下來，是因為她把自己的靈魂從身體中取出來，放在了奸污發生的囚室的角落里。經過這樣的分解之后，她就可以冷眼觀瞧這些人蹂躪她的身體，他們想讓她恨自己，也說她肯定會恨自己的。她一邊想象著不是自己而是一個陌生人在遭受侮辱，一邊嘴里念叨著充滿同情的話。她眼中噙滿淚水，說自己還沒有回到那房間去取回她的靈魂，它還待在她把它留下的那個角落里。

從1982年起，國家安全部隊的秘密行動有所增加。例如，在“零零行動”（Operation Zero Zero）中，喬·馬馬塞拉引誘8名東蘭德的年輕活躍分子，答應訓練他們如何使用手榴彈以對付警察。8個人拿到的是做過手腳的手榴彈，一拉引信，便被炸成了碎片。一個叫瑪姬·斯克薩娜的姑娘，自己也是參加斗爭的活躍分子，好心把馬馬塞拉介紹給了這群年輕人。結果，她被懷疑是“出賣者”，是奸細，遭到一群人的攻擊，并成為所謂“項鏈”—把輪胎套在脖子上、灌滿汽油點燃—這種殘忍殺人手段的最早受害者之一。這種沒有心肝的殺人手段被媒體廣泛宣傳為黑人對黑人的暴力行為，并為國民黨的宣傳機器大肆利用。

瑪姬的家人因為自己的親人是奸細，不得不在恥辱中生活，并長期遭到排斥和詆毀。在委員會的工作中，令人欣慰的時刻之一，就是通過大赦進程，真相終于大白，弄清了8個人的死是由于國家的“骯臟伎倆”，瑪姬不是奸細。瑪姬的家人恢復了名譽，重新為社會接納，這真是社會和解的一個壯舉。她不可能復生，但人們將充滿敬意地緬懷她，而不是認為她死得不干不凈。

由于種族隔離本質上是邪惡和不道德的，因此它也必須使用同樣邪惡和不道德的手段加以維持。1988年6月12日，即索韋托暴動12周年紀念前夕，馬梅洛地公民協會秘書長斯丹察·伯帕佩被拘留三天之后死在獄中。當時的警察署長阿德里安·弗洛克宣布斯丹察·伯帕佩在被從約翰內斯堡押往南邊的法爾時逃跑了。難以置信的是，戴著手銬的伯帕佩顯然是找到了鑰匙，打開手銬，逃過了三個忙著換輪胎的警察，跑到了也許是萊索托。誰都知道警察動輒開槍，而這三個警察竟無一人對他開槍，這怎么可能呢？弗洛克先生公然說謊，并誤導公眾。結果，伯帕佩的家人在與南非北部相鄰的“前線國家”的流亡者中，徒勞地尋找著親人。在委員會的聽證會上，他的母親幾次泣不成聲，說她只要“那些和他一起的警察到這里來，告訴她尸骨在哪里”。

一個內閣部長和警察署長可以大言不慚地伙同其部下，大肆掩蓋事實，迷惑公眾。從后續的大赦申請中，我們得知斯丹察·伯帕佩受電刑后死去。警察害怕在這樣一個敏感的紀念日前在一觸即發的民眾中引起不測，于是撒了謊，并在混淆視聽時得到內閣部長和警察署長的支持和慫恿。他們將尸體秘密運到當時的東特蘭斯法爾，扔進了鱷魚四伏的河里。如果沒有大赦進程，這一切將永遠掩藏在種族隔離隱藏其秘密的陰暗角落里。伯帕佩一家知道了自己親人的尸骨所在，至少心中可以有個了斷。

在東倫敦進行的首次受害者聽證會上，最后一個上臺的證人是辛括瓦納·馬爾加斯先生。他現在不得不坐在輪椅里，但正當年時，他作為非國大的一員，在政治上非常活躍，因而也不可避免地為法律所不容，被警察騷擾。他照例受到折磨，并在關押黑人政治犯的羅本島服刑。這一切使他在一次中風后半身不遂，說話困難。他告訴我們他受到酷刑折磨。于是伯萊恩博士請他講述一下他遭受的酷刑。我當時覺得自己這一天表現得還不錯：盡管聆聽著一個個揪心的故事時，我幾乎淚水盈眶，但我還沒有泣不成聲，而這已經是那天最后一個證人了。伯萊恩博士終于讓我無法再控制自己的感情。馬爾加斯先生講述了施加在他身上的一些酷刑手段。他講到了一種后來我們又多次聽到的刑罰—所謂的“直升飛機”—警察將犯人雙手反銬在背后，雙踝捆在一起，然后將人倒吊旋轉。

馬爾加斯先生費力地講述著。是他不忍再回憶起這一切，還是他的舌頭無法講清他對我們的訴說，我不得而知。（他在我們向曼德拉總統提交《報告》之前就去世了。）無論出于什么原因，他干脆用正常的那只手掩住自己的臉，痛哭起來。我已經聽得太多了，已經無法再承受下去。我無法止住自己的淚水，像個孩子一樣哭了起來。我伏在桌上，用雙手掩住了臉。后來我對別人說，我這個人愛笑，也愛哭，恐怕并不是領導委員會的合適人選，因為我知道我很脆弱。

好在那是我在委員會期間最后一次當眾哭泣。我向上帝祈禱，不要讓類似的事情再次發生，因為媒體的注意力會一下被吸引到我身上，而忽略了他們本該關注的證人。我有幾次幾乎泣不成聲，但終于還是忍住了。

正是這類證詞讓我意識到我們會墮落到何等地步，我們每個人都有邪惡的超凡能力。我已經講過，這適用于我們每一個人。沒有什么可自命清高或指責他人的。我們已經給了上帝足夠的證據，讓他可以像大洪水前一樣掃凈一切，重新開始。應該注意的是，具有這些行徑的人實際都是普通人。他們既不頭上長角，也沒在屁股上拖著條尾巴。他們和你我沒什么兩樣。哲學家漢娜·阿倫特講到過“邪惡的平庸表象”—卷入邪惡的人外表當然不一定丑惡。無論其居心如何，他們就是像你我一樣的正常人。

值得慶幸的是，這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委員會得到的證詞反映出的陰暗的一面。證詞同時也揭示了令人驕傲的另一面。有時上帝在巡視自己的杰作時，可能也會洋洋得意的。據載，上帝在完成了創造世界的工作后，宣布他的所見不僅像他每完成一件工作后所說的那樣好，而且是很好。我們仿佛能看到上帝為他創造的生命的美和善，而搓著雙手興奮不已。上帝在《約伯記》中對撒旦講話時就斷言他的創造之善美。當時撒旦還沒有墮落成處處與上帝作對的邪惡源泉。在這個故事中，撒旦仍是上帝天庭中的一員，盡管他已經明顯地在變成一個上帝的仆人的資格檢驗官，就如同當今法庭上檢察官總是揭出證人的痛處，削弱其證詞的分量一樣。上帝驕傲地指著約伯問撒旦，他是否已經考慮過上帝的仆人約伯。實際上，上帝是在炫耀，他實際上是在問撒旦：“你不覺得他很了不起嗎？”不管怎么說，是上帝為他消災免禍，讓他飛黃騰達的。讓上帝如此嬌寵的人，本沒有什么自身的長處。上帝是把自己的名譽押到了約伯身上，而約伯不得不忍受種種苦難，因為撒旦希望約伯為自己承受的無名之苦而譴責上帝。

上帝一定看到過他創造的人類高貴、熱誠和慷慨的時刻。當他看到那些不畏暴君的人、那些為信仰而死的人所表現出的正氣和勇氣，當他看到圣方濟各、特蕾莎修女[[4]](#_4_3)、馬丁·路德·金和曼德拉時，上帝一定說過：“不，這個險還是值得冒的。他們沒有辜負我對他們的信任。”上帝會又一次得意地搓著手說，他的所見不僅僅好，而且是很好。

在東開普進行的聽證會上，也有一個故事表現出人類精神的崇高。解放運動之一的泛非大會通過其武裝力量阿扎尼亞人民解放軍，決定加強武裝斗爭，宣布1993年為“大風暴之年”，盡管當時種族隔離政府和反對派的談判已經開始。首先襲擊的目標是1992年11月在威廉王鎮高爾夫俱樂部舉行的品酒會。4人死亡，蓓絲·薩維芝女士是重傷員之一。她接受了開胸手術，在特護病房住了整整7個月。出院時，她仍然生活不能自理，靠她的子女為她洗浴、穿衣和喂食，為她料理我們連想都不愿想的事情。這對她是很大的不幸。她的雙親對此特別想不通，因為他們從來都是教育孩子要尊重他人，無論其種族或地位如何。在當時的南非，這樣做的確勇氣可嘉。他們不明白，為什么在一個反對種族隔離及其瘋狂政策的家庭長大的孩子，反而成為他們竭力相助的人的襲擊目標。他們不能接受沒有特定目標的襲擊，即任何白人都是目標，因為在高爾夫俱樂部舉行的聚會上，任何人都無法區分誰支持誰、誰反對誰。

蓓絲·薩維芝認為她的父親是傷心而死。她告訴我們，即使到了1996年聽證開始時，她仍然不能通過機場的安全檢查。各種警報警燈都會啟動，因為她身上仍存留著彈片。她講述的這場經歷給她帶來的影響，頗為震撼人心：

總之，我必須說，經過這一切創傷之后，我感到更加充實。我覺得對我來說，這的確是一種豐富了人生的經歷，是一條成長的曲線。我借此與遭受同樣創傷的人們產生了共鳴。

她說這一切豐富了她的人生！這才真是出語不凡，再一次表明我們中間的確有出類拔萃的人。如果僅此而已的話，她的話已經不同凡響。可是，當被問及她對給予罪犯大赦有何看法時，她接著說：

這對我來說并不重要。但是，正像我對許多人都說過的那樣，我真心希望的，是以寬容的精神，和向人群扔手榴彈的人見面，并希望無論出于什么原因他也能夠原諒我。我的確很想和他們見面。

她的崇高姿態令我們許多人肅然起敬，并為幾乎所有的受害者—無論黑人還是白人—表現出的寬容大度，而充滿了深深的感激之情。這似乎是我們國家的好兆頭。

在東倫敦同一場聽證會上，我們還聽取了科拉多克四人幫的遺孀們的證詞，其中包括諾蒙迪·卡拉塔、諾布依塞羅·姆拉烏利及其女兒巴巴爾瓦·姆拉烏利。巴巴爾瓦意思是“幸運兒”，而她在聽證會上所說的一字一句，也的確給聽眾帶來了幸運和祝福。

這4個人致力于為其生活的鄉村建立新的社會秩序。鄉村遭受的種族隔離之苦比城鎮更為深重。（不過很難讓城鎮居民相信這一點。他們都認為自己的生活狀態形同地獄。）4人在被綁架和殺害之前，都經常遭到警察的拘留、拷打、威脅和騷擾。

受害者之一福特的妻子諾蒙迪·卡拉塔在我們的第一次聽證會上作證：

［東部省］《導報》送到的時候，我看了看大標題。我的一個孩子說：“媽媽，看這兒！爸爸的車被燒了。”當時，我渾身顫抖，害怕丈夫會遭不測……尼亞米［格尼維，科拉多克四人幫中另一受害者的遺孀］總是非常幫忙，當時我才20歲，不能應付這一切，于是我被送到尼亞米家。我到的時候，尼亞米正在嚎啕大哭……

證詞講到此時此刻，卡拉塔太太忍不住放聲痛哭。這種哭聲幾乎成了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特征之一，人們來到這里，可以哭泣，可以敞開他們的心胸，可以把心中郁悶已久、無人理會的憤怒發泄出來。我宣布休會，讓她平靜下來。重新開始時，我帶領眾人唱起了Senzenina?（《我們做了些什么？》）。

后來，諾布依塞羅·姆拉烏利太太講述了他們是如何對待她的丈夫西塞羅和巴巴爾瓦的父親的：

我閱讀了驗尸文件……在上腹部有25處傷。這些傷表明，他們要么用不同的兇器捅了他，要么許多人同時在打他。下腹部也有傷，但是傷口數量達到43處。我們還知道，他們往他的臉上潑了酸。然后，他們齊腕剁下他的右手，怎么處置的那只手，我就不知道了。

事實上，那只手被泡在酒精里，保存在伊麗莎白港的警察總部。警察就用這被叫做“狒狒之爪”的手，恐嚇拘留的人。他們說，如果不與警察合作，拒不交代，那么這就是他們的命運，而且可能更慘。

巴巴爾瓦（西塞羅的女兒）知道所有這一切。她經歷了母親在安全警察手下遭受的所有騷擾和侮辱。她講述了自己作為一個活躍分子的女兒的故事。這中間既有城鎮人民給予的溫暖和支持，也有警察帶來的無休止的折磨。

她講述完自己的經歷后，說她想見到殺害她父親的人。她說得很平靜，帶著她同齡人少有的成熟和尊嚴。整個大廳靜得能聽到一根針掉在地上，只聽她說：“我們確想寬恕，但不知寬恕誰。”

當時還不知道罪犯的身份。種族隔離政府曾進行過死亡調查，并任命了司法委員會負責將此血腥案件調查到底。警察部門把這一切變成了一場騙局。他們使出渾身解數串通一氣提供偽證。直到罪犯們利用委員會的大赦進程申請大赦時，方才真相大白，揭露出殺害科拉多克四人幫的兇手實際上是警察部門。

1992年9月，發生了后來被稱為“比紹大屠殺”的慘案。比紹在東開普省，是奧烏帕·格闊佐準將統治的“獨立”家園西斯凱伊的首府。開始時他對非國大頗為友好，但后來關系逐漸緊張。他宣布西斯凱伊為該黨的禁地后，關系更加惡化。非國大決定在比紹組織游行，宣傳在所有家園特別是西斯凱伊、博普塔茨瓦納和夸祖魯應有政治活動的自由。（這些以及其他家園都是在種族隔離政府分而治之的政策下建立起來的，其目的是要剝奪所有南非黑人的公民身份，使他們成為遍布南非的、以種族為基礎的、七零八碎的班圖斯坦的公民。夸祖魯抵制住了政府迫使其“獨立”的努力，但三地的領袖都感受到了非國大的威脅。）

非國大舉行政治活動自由游行時，西斯凱伊的國防軍士兵開槍射擊手無寸鐵的游行者，造成30人死亡。28名示威者當場中彈死亡，一個西斯凱伊士兵被同伴誤殺。另一個非國大的支持者于1995年因傷重不治死亡。

委員會就比紹大屠殺進行了兩次聽證會,而第一次舉行的地點就在離慘案發生地點不遠的比紹。現場擠得水泄不通，人群中既有當年受傷的人或死者的親屬,也有參加過那場最終變成了慘案的游行的人。會場氣氛緊張濃烈。一些曾參加游行的非國大高級領導人將出面作證，其中有當時的非國大秘書長謝里爾·拉馬福薩，他后來成為制憲議會的主席，為我們奉上了令世人稱頌的憲法；還有現任水利事務部長羅尼·卡斯理爾斯。

最早的證人之一是西斯凱伊國防軍的前首領馬里奧斯·奧埃爾齊格少將。他激怒聽眾的，與其說是他說話的內容，不如說是他說話的方式。也許他保持著軍人的姿態，充分控制著自己的情感。或許這是軍人本色，不應喜怒形于色。但當人們受到了傷害，感情極其脆弱的時候，這種態度就顯得過于冷漠和鐵石心腸了。他講完證詞后，大廳里的氣氛驟然升溫。

其他證人是前國防軍軍官，包括一個白人，其他都是黑人。白人軍官赫斯特·舒貝斯伯格上校是他們的代言人。他說，的確，他們命令士兵開了槍。會場的氣氛緊張得好像凝成了硬塊。聽眾的情緒越來越充滿敵意。接著，他轉向聽眾提出了不同尋常的請求：

我要說我們非常抱歉。我要說我們終生都將背負比紹大屠殺的重負。我們無法讓它消失。事情已經發生了。但是，我特別請求那些受害者不要忘記—我無法提出這樣的請求—但是求你們寬恕我們，讓軍人們重新回到社會中去，完全接納他們，設想一下他們當時承受的壓力。我只能做到這些。我非常抱歉，這個我可以說，我非常抱歉。

原本恨不得絞死他們的人群此時作出了出人意料的舉動。大廳中爆發了雷鳴般的掌聲—難以置信！氣氛發生了驚人的變化。上校的同事一一表示抱歉，等掌聲漸漸停息時，我說：

我們是否可以靜默一會兒，因為我們現在經歷著極其深刻的歷程。我們都知道，請求寬恕并非易事，寬恕他人也同樣不容易，但我們也都知道，如果不能寬恕別人，就沒有前途。如果夫妻吵架，其中一方不說“我很抱歉”，而另一方也不說“我原諒你”，那么關系就難以維持。我們的總統和許多其他人都為我們做出了榜樣。

誰也沒有料到那天事情的轉機。仿佛有人揮動特殊的魔棒，將憤怒與緊張瞬間化解為了社會寬容、前嫌盡棄的壯觀場面。面對這樣的場面，我們感到自己的渺小，也深深地感謝所謂普通人所表現出來的大度和崇高。

1985年圣誕節前夕，南非軍隊襲擊了內陸高山王國萊索托的首府馬塞盧。襲擊導致9人死亡。4天之后，夸祖魯―納塔爾省的海濱小鎮阿曼澤姆多蒂的一個購物中心發生爆炸，5個從北部來此進行圣誕購物的人喪生。年僅19歲的非國大活躍分子蘇布西索·安德魯·榮都堅持說這是對襲擊萊索托的報復。他被判有罪，判處死刑，并在1986年9月執行。他的兩個同伙也被警察處決。

爆炸案中的死者之一是科尼留斯，即到委員會作證的約翰·史密特先生8歲的兒子。（前面我已經提到他在兒子死后作出的不同凡響的反應。）

我告訴報界，我認為我的兒子是個英雄，因為他是為自由、為被壓迫的人民而死。很多人因此批評我，認為我是個叛徒，并譴責我，但我仍然這樣認為。人人都把非國大叫做“恐怖主義者”，卻看不到事情的另一面。如果我不是因為自己的親身經歷，不是親眼看到［黑人］是怎樣斗爭的話，我也不會意識到這一點。

這番話的確不同尋常。一個父親本來應為自己的兒子被奪去幼小、無辜的生命而怒火沖天。然而，這個白人父親，而且還是個阿非利卡人，所說的話令人感動莫名。這本是我們夢想得到但又不敢希冀的東西。奇跡在我們眼前發生了，我們不是在做夢。我們親耳聽到了他的話，卻又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1993年8月，泛非學生組織（PASO）聯合支持非國大的南非學生大會（COSAS），在開普敦舉行示威游行。學生們砸了很多汽車，全然不顧非國大對其行為的譴責。他們的口號也充滿殺氣，如“一個定居者，一粒槍子兒”、“殺了農場主，殺了布爾人”等。一些年輕的黑人活躍分子在大赦申請中說，是這些口號煽動他們進行了血腥的活動。

艾米·比埃勒是來自美國加州的富布賴特基金資助的西開普大學學者。來到南非之前，她曾長期參加斯坦福大學的反種族隔離學生運動。1993年8月25日，她開車送幾個學生朋友到古古樂圖去。一群年輕人用石頭砸他們的車。艾米和朋友們下車后，人群開始追趕他們，用石頭砸她，用刀砍她。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如此獻身正義的她，竟死在她支持的人們手中。

她的家人顯然悲痛欲絕。然而，他們沒有滿懷仇恨、尋求報復，沒有反對那些殘忍地殺害了親人的兇手申請大赦。比埃勒夫婦參加了大赦申請聽證，并表示完全支持和解與大赦進程。他們與殺害女兒的兇手的家人擁抱在了一起。

更值得稱道的是，他們建立了艾米·比埃勒基金會，其宗旨是要幫助鎮上的年輕人，而鎮上的居民很可能就有人參與殺害了他們的孩子。比埃勒夫婦經常回到南非，關照基金會的事務，并經常經過他們的女兒命歸九泉的地方。他們作證說，女兒的死使他們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他們花費了大量時間、精力和金錢，幫助女兒死去的那個社區的年輕人。他們熱誠地致力于拯救古古樂圖的青年，拉他們走出命中注定的死胡同，把他們從暴力犯罪中解救出來，走上具有責任心的成長之路。

20世紀80年代，非國大開始爆炸行動。它聲稱爆炸的目標是安全部隊人員或其工作場所，如警察局和軍事設施。但是，與非國大宣布的意圖相反，爆炸中死傷的大部分是平民。

第一次大規模爆炸發生在1983年5月20日比勒陀利亞的教堂街。威力巨大的汽車炸彈在南非空軍總部所在的市中心爆炸，21人死亡，219人受傷。其中11位死者為空軍總部工作，兩位是非國大武裝力量成員，其余均為平民。

219名傷者中，有一位雙目失明的內維爾·克拉倫斯先生。他費盡周折才從空軍得到傷殘賠償和撫恤金，但是他卻對違反人權案件委員會說：“我對汽車爆炸案的罪犯，無絲毫怨恨，從來沒有過，將來也不會有……”

策劃這場爆炸的人申請大赦時，他參加了聽證會。主要申請人是阿布巴克·伊斯邁爾先生。內維爾·克拉倫斯沒有對大赦提出異議。相反，他走到已經為造成平民的傷亡而道歉的伊斯邁爾先生面前，與他握手，并說盡管他的行動讓自己雙目失明，他還是要原諒他，希望攜起手來，為所有人的幸福共同努力。他后來說，他們的手緊握在一起，仿佛不愿松開一樣。他們握手的場面在電視上播放，并登載在報紙的頭版頭條。這比語言更能說明和解與撫慰進程的意義，成為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標志之一。

我把到委員會作證的受害者形容成“出色的”、“非凡的”和“特別的”，他們也的確名副其實。但是從另一重要意義上來講，他們又不是“出色”、“非凡”和“特殊”的，因為他們并非唯一的例外或是不合常情。否則，南非應對分裂的、可怕的、傷痕累累的過去的方式，就不可能成為世人仿效的典范，因為那樣說來它就不可重復。那種說法也有不顧事實之嫌—比埃勒一家就是例證。他們不是南非人，而是美國公民。因此，南非人沒什么特別。或許更好的說法是，每個民族都有平凡的人能夠成就不凡的事，都有人民在面對過去時可以讓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進程成為可行的選擇。犯下滔天暴行的人是如你我一樣的普通人，很可能就是自家鄰居；同樣，那些顯示出非凡的寬容和大度精神的人，也可能就是附近的街坊。令人欣喜的是，寬容與和解在哪里都是可能的，而且也確實常常無聲無息地發生著。

下面的故事發生在美國。瑪麗亞塔·杰埃格和丈夫帶著5個孩子在蒙大拿州度過了愉快的暑期野營假期。假日的最后一天，她最小的孩子7歲的蘇西失蹤了。瑪麗亞塔抱著一線希望，盼著找到女兒。一天晚上，劫持蘇西的人打來電話，她以為有希望了，但那人不過是想嘲弄她。最終，罪犯落入法網，孩子的尸體也找到了。她見到了殺害女兒的兇手，并說她寬恕他。下面就是她對這段經歷的講述：

我終于認識到，真正的正義不是懲罰，而是恢復，不一定是恢復原來面目，而是恢復本應該具有的狀態。在我信仰的希伯來和基督教的教義中，那里描寫的上帝是充滿慈悲和愛心的上帝。上帝尋求的不是懲罰、毀滅或把我們置于死地。他總是不懈地努力著，幫助和撫慰我們，讓我們恢復與和解，讓我們重新獲得我們生而應有的豐富而充實的生活。現在，這就是我要對殺害我女兒的兇手行使的正義。

盡管他可被判死刑，但我覺得以蘇西的名義處決劫持犯，會玷污了她的可愛、美麗和善良。她值得我們用更加高尚和美好的方式來紀念，而不是把這個已經毫無招架之力的囚徒，以既定的方式冷冰冰地處死，無論他的罪行是多么該死。我覺得我對她最好的紀念，不應是做出我所痛恨的事，而是告訴大家每一個生命都是寶貴的，都值得保留。因此，我要求檢察官采納另一判決—終身監禁，不得保釋。我的要求得到了滿足，而且這一判決作出后，罪犯才供認了殺害蘇西和另外三個孩子的罪行。

我承認，一開始我真想親手殺了這個家伙，但他的罪行結案后，我深信我最好和有益的選擇莫過于寬恕。在失去女兒后的20多年里，我一直在幫助受害者和他們的家人，而我的經驗一再得到證實。受害者的家屬當然有權感到憤怒，這是人的正常反應，但是始終抱著復仇心理的人，最終只能給罪犯又送去了新的受害者。他們為過去困擾、折磨，無法解脫，生活質量受到嚴重損害。無論我們多么有理，我們的不寬容只能傷及自己。氣憤、仇恨、惱怒、痛苦、報復—這一切是死神的精靈，會像奪去蘇西的生命那樣，也奪去我們的“一部分生命”。我相信，我們要成為全面、健康和快樂的人，就要學會寬容。這就是瑪麗亞塔福音中永恒的教訓和經驗。盡管我不愿事情如此，但從我女兒之死中得到生命禮物的第一人就是我。[[5]](#_5_3)

故事震撼人心。

無獨有偶，愛爾蘭總統瑪麗·麥卡利斯在其著作《不屈的人生—亂世之愛》[[6]](#_6_3)中，講述了格登·威爾遜在其女兒慘遭殺害后的非凡舉動：

能達到如此平靜的精神狀態，絕非一般人之所為。我想他們該是某種圣人，不是那些被美化、被冊封的圣徒，而是與他們在一起我們可以感到上帝就在身邊的那種人，因為無論他們身處何處，都有上帝相伴。上帝不是他們的保鏢，也不會像蘇聯坦克一樣為他們開道。他的陪伴就如同女高音的純凈聲音與妙曲相伴，如同露滴與玫瑰相依。

格登·威爾遜就是這樣一個人。他是那么恪守仁愛的準則，以至當自己可愛的女兒瑪麗在恩尼斯基林爆炸案中慘遭不幸時，愛和寬容的話語是那么從容地從他的口中道出，自然得如同孩子的眼光必然追逐著母親。他的話讓我們羞愧，讓我們始料不及。他的話和我們所想到和習以為常的是那么不同。這些話帶著平靜和超然，來到了我們甚至不忍目睹的丑惡的地方。然而，他也遭到了誹謗，而且令人難以置信地收到大包大包充滿仇恨的信件。人們叫喊著，你怎么膽敢寬恕？寬恕殺了自己女兒的兇手，你算什么父親？他們好像從未聽說過愛和寬容的教義，好像是有史以來第一次聽別人講話，而從不知基督曾經說過“父親，原諒他們，因為他們不知自己的所為”。一個教徒就格登·威爾遜的事對我說，“這個可憐的人一定是悲傷過度了”，好像給予愛和寬容，是意志脆弱而非精神力量的表現。

上帝可能的確有后悔把我們造出來的時候，但是我想更多的時候，上帝看到的是那些在邪惡、酷刑、侮辱和痛苦的暗夜中閃亮的人，是那些勇于寬容、具有崇高精神和寬宏大度的人。他們驅散了陰霾，帶來了清新的空氣，改變了事情的面貌。人們因此滿懷新的希望，希望絕望、黑暗、氣憤、惱怒和仇恨不會最終占據上風，希望喪盡天良的罪犯找回他們的人性，而化敵為友的新局面得以最終形成。這不是不負責任的胡思亂想。這樣的事已經發生，而且正在發生，噩夢有望過去，亂麻終將解開。上帝擁有一支出色的人馬和非凡的同道。

我們每個人都有成就大善的能力，上帝也一定因此會說值得冒險把我們創造出來。非同一般的是，全能的上帝要依靠我們—我們這些渺小、脆弱、不堪一擊的人，才能實現他要達成的善良、正義、寬容、撫慰和大同。上帝只有我們。希波的圣奧古斯丁說：“上帝不能沒有我們，就如同我們不能沒有上帝。”

一個冒冒失失的年輕物理學家對一個土里土氣的俄國牧師，陳述了所有無神論的理由，然后傲慢地說：“因此，我不信上帝！”那個小牧師不僅不生氣，反而平靜地回答道：“哦，不要緊。上帝是相信你的。”

上帝相信我們。上帝依靠我們幫助他把這個世界變成他所希望的樣子。

[[1]](#_1_10) 詩名“The Suffering God”，引自北愛爾蘭Gorrymeela News雜志，1988年秋冬季號。

[[2]](#_2_2) 一首民間贊美詩，曾在自由運動支持者中傳唱，現已改編為南非國歌。

[[3]](#_3_2) 祖魯語，保安。—譯注

[[4]](#_4_2) Mother Teresa，印度天主教仁愛教會創建人，1979年獲諾貝爾和平獎。—譯注

[[5]](#_5_2) R. D. 英賴特與喬安娜·諾思合編：《透視寬恕》（Exploring Forgiveness），威斯康辛大學出版社，1998年。

[[6]](#_6_2)Unreconciled Being ― Love in Chaos，倫敦與伯克姆斯特德，1997年。

# 第八章 “我感到如重見光明一般”

頗有一些人對委員會不屑一顧，嘲笑它是Kleenex紙巾委員會，因為證人在公開聽證會上常常痛哭流涕。還有些人希望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失敗，他們傲慢地質問委員會究竟成就了什么和解，揭露了什么真相。他們挖苦我們，說我們得到的不過是些嘩眾取寵、毫無根據的信口胡說。

如果我們問這些諷刺家他們自己為促進和解有何作為的話，往往只能聽到他們嘟嘟囔囔為自己辯解。他們好像忘了，如果沒有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進程，沒有不進行報復以及南非人應努力建立一個沒有種族或派性沖突的新國家這一過渡協議，他們可能根本沒有在這里高談闊論的一天。我們是多么迅速又是多么容易就認為一切理所當然啊。南非的很多白人都認為，他們有權得到和解和寬恕，而無須出半點力去幫助這一關鍵而艱難的進程。

（這是籠統地講，當然任何籠統的說法都會忽視了那些甚至在種族隔離壓迫最為深重的黑暗歲月里也堅持正義的出色白人。他們中間許多人也遭受到白人同胞的敵視。他們被排斥，甚至常常被拘捕、折磨，遭受了在這個國家所有敢于站出來逆潮流而動和被詛咒的人所遭受的痛苦。他們對我們斗爭的貢獻無可限量、不可或缺，我要向他們致以深深的敬意。）

盡管如此，我必須沉痛地指出，許多白人都過快且過于輕率地忘記了，我們國家的確處在災難的邊緣，完全可能陷入吞噬了諸如波斯尼亞、中東和北愛爾蘭這些地方的那種屠殺和動亂。我們應該感激涕零，因為我們的局面完全不同，我們的總統是寬容與和解的國際偶像，我們這塊土地上有那么多人追隨著他。我望眼欲穿地盼望著，盡管遭受了不必要的痛苦但仍愿意寬恕罪人的黑人所表現出來的寬宏大度，能夠在白人中激發同樣的寬容精神。

這些就是詆毀我們的人，他們不完全是但大部分是白人。如果真的問我們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到底取得了什么成就，回答是我們受命全面展現在我們負責調查的34年中對人權的嚴重違反行為。委員會應該促進民族團結與和解。必須強調，其任務是促進而非實現這些目標。它應該對一項本應為全國性的事業作出貢獻，而且可能是顯著的戰略性貢獻。每一個南非人都有責任認識到，這不是一項我們可以漠不關心的事業。它是一個長期持久的過程，每個南非人都有義務為此作出貢獻。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是一個生死攸關的進程。它的成功與否關系到我們民族的存亡，關系到我們全體人民和每一個人的存亡，因為沒有寬容，沒有和解，我們就沒有未來。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問委員會成就了什么，為時尚早。但在我們開展工作的兩年多時間里，的確取得了重大成就。

前一章列舉的和解與寬容的事例，并非僅有的成就。我們發現，許多來到委員會的人事后都認為，陳述自身經歷本身，就讓他們得到了解脫，感到了寬慰。接受和承認他們的確曾深受痛苦，對他們來說就是一劑暢快的良藥。只要有一個人有這樣的感覺，我們委員會就不枉存在。很多人向我們表示了同樣的感受，這使我們不由地希望能給更多的人發泄憤怒、解脫負擔的機會。

在第二章中，我講述了科拉多克四人幫之一馬修·格尼維的弟弟告訴我，他的嫂子恩亞梅克在委員會作證后，他們全家感到如釋重負。根據烏班圖之道，她的經歷等于他的經歷，因為烏班圖說他們所有格尼維家族的人都是一體的。他們在相互依存的整體中相互關聯，一個人的經歷就是所有人的經歷。恩亞梅克意思是“忍耐的人”、“耐心的人”。恩亞梅克·格尼維作證時，向我們講述了他們全家聽到地方法官對其丈夫之死進行的第一次質詢結果時，是何等失望。他們被告知，他和其他同志被不明身份的人所殺，而實際上安全部隊的介入一直是公開的秘密。

……我們一家人努力使第一次質詢公開進行，而他們［國家］卻只希望事情秘密進行，盡快處理。我們通過律師進行了反抗，最終事情稍微公開了一點。但是……這沒有帶來任何結果。然后，我們又不得不經歷第二次漫長的質詢，身心都受到嚴重傷害，我想我們當時也抱著很高的期望。我記得當聽到調查結果時，我們是多么的失望。我不知道最終等待我們的是什么，到委員會來也是抱著同樣的心情……之所以［對到委員會來］遲疑不決，就是不知道這里會給我們帶來什么。我得到的消息很少。但現在來了之后，我在別人的經歷面前感到慚愧。我可以很高興地說，我很高興我來了。

人們將自己脆弱的一面公開展露后找到的那種感覺，讓我們感嘆不已。我不能自稱自己預見到，所有到委員會來的人，在講述其悲慘遭遇后都會感到寬慰和復原。盡管作為牧師我應該稍許了解人的靈魂和精神世界，但我不是專業心理學家。聆聽人們敞開心扉，在講述中恢復完整的自我，是難得的榮幸。我感謝上帝讓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提供了安全和溫暖的氣氛，使人們可以盡情地傾訴。

盧卡斯·斯克維培里這個年輕人講述自己的遭遇時說，臭名昭著的開普敦警官H. C. J. “巴里”·巴納德朝他的臉部開槍，致使他雙目失明。然后他說：

我覺得……到這里講述我的經歷，就好像讓我恢復了視力，重見了光明。我覺得一直讓我悶悶不樂的原因，是我不能講述我的故事。但是現在……來到這里，講述我的故事，我感到如重見光明一般。

參加這一進程的殊榮，足以抵消很多人表現出的尖刻。這些人拒這一進程于門外，使自己失去了難得的獲益機會。

最為艱苦的聽證會之一，是對溫妮·曼德拉的“足球俱樂部”的活動進行的為期9天的馬拉松式調查。盡管人們眾說紛紜，但就是這樣熬人的聽證會也帶來了積極的影響。由于受害者的陳述，也鑒于法庭對其綁架和傷害行為的判決，委員會根據《促進民族團結與和解法案》第29條傳她到場。這條規定是我們可以傳喚證人進行調查。在通常情況下，調查會秘密進行，但由于她的堅持，聽證會公開進行，意圖是讓她能夠回應所有對她的猜疑、指責和影射。

無可否認，她的確是個出類拔萃的不尋常的女子。當丈夫被判終身監禁關在大牢時，種族隔離制度用盡一切手段對她進行騷擾，企圖摧毀她的意志。她曾被拘留，被警察監視，甚至被從索韋托趕到了離自由州近480英里的布蘭德堡，被迫與操塞索托語的人們一起生活，而當時她并不懂當地語言。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讓她的精神崩潰，讓她與人民隔絕。她成了被遺棄的人，成了自費的囚犯。她被禁止參加集會，即不能同時與一個以上的人接觸。在通常為期5年的管制期間，未經準許，她不得擅離指定的司法區域。她不能去影院、教堂，不能野餐。如果沒有準許，她甚至不能參加家人的婚禮或葬禮，即使申請也常常被駁回。一個被管制的人不能與另一個被管制的人聯絡，沒有部長的批準，言論不得被引述。無論平常還是周末，從晚6點到早6點必須閉門不出，名副其實地慘淡度日。許多種族隔離的反對者都遭受了同樣的命運，在未經適當程序的情況下就被管制起來。部長既是公訴人也是法官，既然不知道管制的理由和根據何在，也就無法提起上訴。這一切毫無法治可言，而對西方宣傳的理由則是必須這樣才能打擊共產主義。實際上許多此類犯法者都是虔誠的基督教徒。

溫妮·曼德拉非同一般。她具有超群的個人魅力，在受管制前曾是極有號召力的演說家。當我們的大部分領袖要么流放要么坐牢時，她在集合群眾方面起到了關鍵作用。她對反種族主義斗爭功不可沒。她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政治家，完全懂得如何讓所謂的普通人激揚起來。當他們痛苦時，她會出現在他們中間。政治領袖爭取大眾支持時，她鞍前馬后地奔忙。即使現在因綁架賽伊佩伊而名譽掃地，她也仍然具備東山再起的實力。非國大基層黨員對她的支持始終是穩固的，到1999年又開始增強。

她在布蘭德堡時，我曾去看望她，為她帶去圣餐，在我的車里一起享用。遠處的山坡上，安全警察坐在車里嚴密地監視著她的一舉一動。周末她不能走出庭院，于是我們常常一個在籬笆這邊、一個在籬笆那邊享用圣餐。我常常想，我們的國家在世人面前裝扮成一個基督教國家—且不論其中的含義—而我們卻不得不在這樣的狀態下享用圣餐。

把她趕到布蘭德堡帶來了適得其反的結果。她很快開始身體力行地啟發這個質樸鄉村的人們的覺悟。布蘭德堡是一個灰蒙蒙的貧民小鎮。她種了一塊草坪，辟了一個菜園，很快一個個小菜園和巴掌大的小草坪開始在布蘭德堡出現。她開辦了一個診所和圖書館，阿非利卡人開始要求當局把她遷走，說她是個煽動者，自從她來了之后，本地人就不那么守規矩了。人們仰慕她，熱愛她。她不是個可以小瞧的人物，我覺得她也知道自己有多大的影響力。她自信但不傲慢。我非常喜歡她，她的兩個女兒親熱地叫我“叔叔”。她是海外抵抗運動，特別是旅美非洲人的寵兒，被人們稱為“國母”。

種族隔離當局對她施加了巨大的壓力。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學到一條人生哲理，我們最好還是夾起尾巴做人，而更為重要的是，我們要寬以待人，因為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完全了解他人的處境。我并不是要一筆勾銷曼德拉夫人對那些可怕事件或可能參與的行動的責任，更不是要縱容這種行為。然而，她的確在斗爭中作出了杰出的貢獻。我們誰也不能肯定自己在同樣的壓力下就不會屈服。的確有人挺過來了，但這毫無意義，因為我們每個人都不同，都以不同的獨特方式作出自己的反應。

進行為期9天聽證會的唯此一人。可以想見，如果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以同樣的方式對待一個阿非利卡人，會引起怎樣的抱怨和軒然大波。有些總是另有圖謀的人聲稱，這樣做正逢非國大領導層求之不得讓她難堪、以削弱她在人民中的威信的時候。委員會希望進行秘密聽證這一點，就足以駁斥這種指責。我們決意了解這個不凡的人物，了解她對違反人權重大事件的深刻影響。是她自己堅持進行公開聽證，并招致公開宣傳的。

1997年11月，約翰內斯堡西郊的梅費爾加強了戒備。媒體全副武裝蜂擁而至，而身著優雅時裝的曼德拉夫人也沒讓眾人失望。她的眾多支持者也到了場，其中有盡情歌舞的年輕人，也有不茍言笑、身著顯眼制服的非國大婦女聯盟的大嫂們前來聲援她們的主席。這些女士一度把聲援的標語掛到了會場里，我不得不出面制止，指出這是蔑視聽證會的行為。盡管聽證不同于法庭審判，但許多法庭的規矩是保留的。（例如作偽證的證人可以像在法庭作偽證一樣被判刑。）

律師小組代表與事件相關的人參加了聽證。我們阻止了交叉訊問，讓他們感到有點不快，但是我們畢竟不是追究事實、定罪量刑的法庭。我們的目的是盡量揭示真相，但又必須不斷提醒人們聽證結束不會作出無辜還是有罪的判決。委員會將在最終的總報告中，宣布違反人權事件的責任所在。

曼德拉夫人把所有指控都不屑一顧地指為“荒唐”和“可笑”。她幾乎不動聲色。可能唯一讓她有所觸動的，就是維尼主教一番感人肺腑的話。在直接向喬伊斯·賽伊佩伊太太為沒有更多地保護她的兒子表示歉意后，這位被她無故誣蔑為虐待兒童的主教對她說：

我們曾在我的住所見過面，你可以想見，我對你的感覺非常復雜。我渴望我們能夠和解。你關于我的有些言論，非常非常深刻地影響了我、傷害了我，讓我無比心痛。我不得不專門找個地方學會如何寬恕你。當然，你可能不需要寬恕，或者認為我原本就該寬恕你。為了這個國家，為了我相信上帝深愛的人民，我努力尋求著與你和解的方式。因此，我才坐在你面前跟你說這番話。

聽證結束時，委員會休會，研究對曼德拉夫人及其足球俱樂部的調查結果，并寫進了1998年公布的《報告》中。但是在這之前，我滿懷熱誠地向她提出請求。首先，我向聽證會講述了我們兩家的關系：

我只想說，我們和曼德拉一家關系非常緊密。我們住在有時被稱為貝弗利山［索韋托的西奧蘭多］的同一條街上。我們的孩子在斯威士蘭上同一所學校……曼德拉夫人是我的一個孫子的教母，那孩子是在曼德拉被釋放后的那個禮拜日受洗禮的。

我談到我到布蘭德堡的探訪，并把她稱為自由的象征：

我們永遠不會忘記她為斗爭所作出的卓越貢獻和她那打不垮的意志。為摧毀她的意志，一切手段都用上了。她激勵著無數的人，對斗爭的貢獻是不可否認的。她是她丈夫最合適的代表。

接著，我向曼德拉夫人發出呼吁，重申了聽證會的目的，講述了我對一些著名領袖人物的表現的喜憂參半的感受。這些人在聽證會上陳述了他們為阻止足球俱樂部的行為而進行的干預和努力。

我們努力建立一個新的、不同的制度，要讓新道德、原則、真誠和責任成為日常準則。我們之所以說犯罪、家庭暴力、無視環境、腐敗、自私存在和盛行，是因為我們需要一個新的道德秩序和對權利的尊重，作為治療這一切的抗生素。

有些人痛不欲生，但也為在聽證會上發生的一切而歡欣鼓舞。讓他們感到痛心的是一些斗爭的著名領袖的表現。他們道德的敗壞，令人震驚不已。當然也有與他們形成鮮明對比的例外，比如阿扎爾·卡查利亞、墨菲·莫羅貝，兩位循道宗主教，西尼·穆法馬蒂［現任負責警察部門的內閣部長］……

我們必須要證明，新制度有質的不同，有本質上不同的新道德。我們必須站起來維護善、真和愛，而不是向強權低頭。

然后，我開始我的呼吁：

我承認曼德拉夫人在我們斗爭歷史中的作用，但也必須說的確出了問題，而且是嚴重的問題。究竟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們誰也無法預見—我們只能說，我為仁慈的上帝而活。的確出了問題，以致許多領導人必須介入這一問題的解決。

［1990年］……看到溫妮和丈夫從維克多·維爾斯特監獄手挽手走出來，看到他們在他獲釋后的那天走在主教廷，真是好極了。

［1998年，當足球俱樂部的活動迫使教會和公民領袖采取行動時］我是被邀請來與你對話的教會領袖之一。……我來和你會談時，你不能見我們，因而無法會談。你說，你在學習……

當時我要跟你說的，也是我現在想要對你說的。我深深地愛著你，愛著你的家人，我是以這樣的身份對你講話的。當時我會對你說，我們舉行一個公開會議，讓你在會上站起來說，出了問題，的確出了問題，但我不知道為什么。會有人愿意歡迎你的。我仍然歡迎你，因為我愛你，而且愛得很深。如果你能說出出了問題，說出“我很抱歉。我為自己在這些問題中起的作用道歉”，會有很多人愿意歡迎你。

我相信我們是不可思議的人。很多人都會抱著原諒你、歡迎你的急切心情，沖到你的面前。

我請求你，我請求你，我請求你。我還沒有就發生的問題調查出任何結果。我是作為生活在這個社會中的一個普通人在講話。你是一個偉大的人，你不知道如果你說出“對不起，出了問題，原諒我”，你將會更加偉大的。我求你了。

曼德拉夫人回應道：

非常感謝你充滿智慧的一番話。這是我一直都知道的你作為神父的一面，希望這一面沒有改變。我要利用這個機會告訴［阿布巴卡·］阿斯瓦特博士[[1]](#_1_13)我是多么的抱歉，告訴斯登皮埃的母親我是多么的抱歉。幾年前當事情鬧得沸沸揚揚的時候，我曾向她道過歉。我要說的確出了問題，我完全同意，我們也都知道是什么因素導致了問題的發生。我為過去痛苦歲月中所出現的嚴重問題，表示深深的歉意。

話說到這里，我宣布休會。

這聽起來好像是個不冷不熱的請求，但即使對半心半意的寬恕請求，我們也不能表示不屑。說出“我很抱歉”從來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在任何語言中，這都是最難吐的字眼。即使在床笫之間，我都覺得很難跟太太道歉。我可以想見在電視鏡頭前、在大庭廣眾之下要說出這幾個字，又是多么艱難。

先知以賽亞說上帝的奴仆非常溫順，甚至不會吹滅一個火星。我想這是曼德拉夫人第一次公開道歉，對她這樣一個高傲的人來說，這的確非同一般。在聽證過程中，媒體拍下了她和賽伊佩伊太太的合影。有人說這是委員會有意安排的，因為促成這兩個人之間的和解，會大大提升委員會的威望。但實際上，這是賽伊佩伊太太主動提出的，她本身就是一個不計前嫌的了不起的人。

我的同事、違反人權案件專門委員會的副主席雅思明·蘇卡，向南非廣播公司電臺記者介紹了公眾，特別是白人對我的呼吁的反應。

我認為有些人誤解了他的舉動，以為他是在給她找臺階下。但我認為事情本該如此，本來就該說：出了問題，我們要對此負責。我覺得那一時刻非常感人，可以說是委員會的一個閃光之處。

我沒時間考慮如果曼德拉夫人反駁會出現什么后果。我滿懷熱誠的請求很可能被置若罔聞。幸虧她作出了相當積極的反應，我也可以第二天放心地乘飛機到開普敦趕赴另一個緊急會議。說得輕一點，我感到如釋重負。

但是，在夸祖魯―納塔爾省一個警察的案件中，我們可以看到如果一個人主動努力求得寬恕會得到什么結果。1988年12月，布特萊齊領導的因卡塔自由黨和與非國大結盟的聯合民主陣線打得不可開交。警察上校布賴恩·米歇爾命令一群臨時警察向聯合民主陣線的支持者開槍。這些警察被戲稱為“Kits”警察（Kits在阿非利卡語中意為“速成”），因為他們只經過初級訓練就被拉出來對付人民了。他們往往紀律渙散，有時酒氣熏天就上班了。他們的裝備是霰彈槍。城里的青年跟他們搗亂，他們和其他警察一樣，被蔑視為走狗。因此，他們一般不會對“制度”的反對者心慈手軟。但這一次，他們聽錯了命令，攻錯了目標。他們沒有襲擊聯合民主陣線的支持者，反而槍殺了托拉斯·費得農場11個守夜的婦女和孩子，使這個不問政治的村子沉浸在悲傷之中。米歇爾被判有罪，并受30年監禁。在聽證會上，他請求得到被他傷害的人們的寬恕。

我只能請求直接或間接卷入此案并受到影響的人們……考慮寬恕我……我已經失去了生活中的一切……

托拉斯·費得農場的人們說他們可以寬恕他，但他必須積極參與到被他毀掉的社區的重建中來。米歇爾做了一件很有勇氣的事。他要求委員會安排他訪問農場。事情很可能出問題。會議一開始緊張而艱難，大家都有些不自在，農場的人自然抱著敵意。他遲疑了一下，開始對人們講話：

我想感謝你們允許我今天來到這里，感謝到目前為止你們對我表現出的善意。有人告誡我今天不要來。盡管如此，我還是來了，因為我知道這樣做是對的。

我得知許多在1988年離開這個地區的人還不能重返家園。我認為，必須想辦法讓這些人回到自己的土地，耕種自己的土地。還必須實現這個地區分歧嚴重的各政黨之間的和解。

氣氛開始變化，開始緩和。有一兩個受害人還不大情愿寬恕他，但大部分人都為他的到來感到高興，等他離開時，已經是親熱地向他揮手告別了。這一出緊張而輕松的會面上了電視，并在南非廣為報道。這對暴力和動亂不斷的夸祖魯―納塔爾省來說，是件大好事。我肯定，這件事也會鼓勵其他人走上化敵為友這條雖然艱辛但最終回報豐厚的道路。

米歇爾因為參與秘密策動政治團體間的爭斗而付出了沉重代價。他的太太與他離婚，他很長時間見不到兒子。我贊賞他把自己的悔恨化為幫助受害人實際行動的意愿。或許這樣的賠償應該成為準予大赦的條件之一。這樣，所謂得到大赦的人白占了便宜，而受害者依然貧困痛苦的言論，就會不攻自破了。

另一個故事同樣表明，在其他方式失敗的情況下，委員會是可以揭出真相的。1988年8月31日凌晨，炸彈爆炸的巨響震撼了約翰內斯堡的科特索大廈，南非教會理事會的所在地被夷為平地。無人重傷，這簡直是個奇跡。一個守夜人從電梯上被拋下來，也只受了輕傷。對面老人公寓的窗戶被爆炸的沖擊力炸得粉碎，像飛彈一樣散射出去，但住戶都逃了出來，沒有重傷員。科特索大廈前的街道白天總是車水馬龍，火車站就在附近，行人熙熙攘攘，小販往來叫賣，一片熱鬧。到我前去觀看現場時，見到大廈門廳中一幅耶穌護衛一座城市的掛毯在一片狼藉中絲毫無損。這或許就昭示著真與善終將取勝。

我與大廈有著相當緊密的聯系。大廈正是在我擔任教會理事會主席期間在德國教會的慷慨支持下買下來的。我作為南部非洲都主教，趕乘能夠搭乘到的最早一班飛機從開普敦飛到出事地點，對理事會及受到嚴重傷害的工作人員表示聲援。我和當時的秘書長弗蘭克·契卡尼巡視現場時，對他開玩笑說，我交給你一座宏偉大廈，你怎么能讓它遭到如此下場呢！大部分人都認為即使沒有符合庭審要求的證據，我們也知道這不過是種族隔離政府的又一骯臟伎倆。因此，我們誰也沒有理會政府宣傳機器隨后的報道。當時的法制及秩序部長阿德里安·弗洛克居然宣布非國大應對科特索大廈爆炸事件負責。當時非國大仍是被禁的政治團體，其成員動輒被稱為受到“共產主義煽動”的“恐怖分子”。他居然有膽量指名道姓地說出警察當局聲稱的幕后策劃者。一個叫薛利·古恩的女士受到指控，在未經庭審的情況下，帶著她還是嬰兒的兒子被關了6個月。

大部分白人都深受政府控制的宣傳機器的影響，他們不假思索就接受了政府的解釋。對他們來說，這不過是那些野蠻家伙的又一恐怖行動，為的是要推翻為白人提供了世界上一流生活水平、讓本地人循規蹈矩、敬畏上帝的基督教政府。大多數白人都相信弗洛克，并為能夠如此迅速制伏恐怖分子的警察部門感到自豪。他們可以高枕無憂了，因為安全得到可靠的保障。如果我是白人，恐怕也會有同感。只有心懷慈悲，才能放棄一個給自己帶來如此多的特權、優惠和好處的制度。我總是對那些反對給他們帶來巨大好處的制度的南非白人欽佩不已。

如果沒有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世界和南非恐怕永遠無法了解科特索大廈事件的真相。不可能指望警察揭自己的瘡疤，整個世界會繼續認為非國大是罪魁禍首，當然有些人也不免嘀咕，對一個堅決反對種族隔離、常常被稱為“穿教袍的非國大”并被指責為非國大恐怖主義擋箭牌的組織，非國大怎么能做出這種事呢？政府有時聲稱教會理事會是非國大的補給站，樓里藏著非國大的武器。白人中又有許多人相信這一派胡言。他們就不問一句：既然警察證據在握，為什么不干脆搜查大廈，向世界揭露教會理事會，讓他們永遠失去作為以和平方式促進變革的組織的名聲呢？（果真如此，幾乎所有海外教會和政府都會拋棄南非教會理事會，視其為恥辱，理事會也會因此失去最重要的資金后盾。）但是，政府說什么，白人就相信什么。他們不想問那些難堪的問題—大樹底下好乘涼，何必把大樹砍倒呢？

后來，曾向媒體斷言非國大一手制造了爆炸事件的前內閣部長弗洛克先生在其大赦申請中披露了事實真相。正如他明確宣布的那樣，這一恐怖行動實際是他手下的部門所為。本該維護法律和秩序、懲治恐怖分子的警官們，竟親手制造了嚴重的城市恐怖事件。這清楚地表明可憎的種族隔離制度道德敗壞，不得不靠如此邪惡的手段茍延殘喘。

這也是為什么警察部門無法解決我國歷史上許多懸案的原因。是誰殺害了史蒂夫·比科？是誰把“培伯克三人組”殘忍地引向死亡？是誰殺害了“科拉多克四人幫”？又是誰炸毀了南非工會總部大樓和羅馬天主教總部？警察部門無法破案，因為他們自己就是罪魁，并企圖用謊言蒙騙公眾。這些犯罪不是偶然的，不是像種族隔離政府的維護者所稱是個別“壞家伙”所為。這是種族隔離企圖破壞法制、垂死掙扎的一種表現。這個制度毫無正義可言，已經爛透了。這一切是其本性使然。

弗洛克先生披露，科特索大廈爆炸事件是在前總統博塔主持的一次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后，根據他的指示進行的。博塔先生和一些人聲稱此事件不構成對人權的嚴重違反，因而不屬委員會的管轄范圍。但是，事件中無人傷亡，恰是罪犯們的大幸。執行者之一尤金·德考克上校告訴委員會，他們接到命令，如果有人干擾爆炸，即使是警察也格殺勿論。政府顛覆其本應盡職維護和保衛的法律，是無論如何不能為人接受的。

值得稱道的是，弗洛克先生在申請大赦后，就惡毒誣陷古恩女士一事向她深表歉意。盡管什么都無法補償她失去人身自由和遭受不公的痛苦，但令人欣慰的是，她至少因為這一暴行所造成的傷害成功地將政府送上了法庭。

契卡尼博士在反對種族隔離的歲月里，經受住了炸彈襲擊、牢獄的酷刑和對他的叛國罪審判。一天，在去納米比亞的途中，他突然身患重病。他康復了，但后來才意識到這一切是在他換了衣服之后發生的。他幾乎忘了這件怪事，直到他在美國幾乎死在餐桌旁。這件事救了他的命，因為他太太所在的威斯康辛大學有個學者正在研究毒藥。結果發現，他吸收了噴灑在衣服上的有機毒藥。大部分人都懷疑，這是政府為保住政權玩弄死亡游戲的又一例證，這一次是暗殺反對派。如果沒有大赦進程，我們還得繼續憤怒和懷疑下去，繼續為不能找到確鑿證據印證我們的猜測而懊惱不已。

現在真相大白了，因為委員會在1998年6月就前政府的化學及生物戰計劃，舉行了公開聽證會。在這些公開會議上揭示出的一切令人不寒而栗。新的民主政府對公開聽證表示不快，擔心公開揭露某些秘密計劃，會置其于違反它所簽署的不擴散條約的境地。我們做出了令人滿意的安排：當政府力圖對聽證加以限制時，我裁定聽證必須公開進行，因為我們是在努力培養一種透明、負責和尊重人權的新文化，但我們會采取預防措施，防止有損國家安全或導致違反不擴散條約的消息泄露出去。

我們很快搞清了，與種族隔離政府所聲稱的恰恰相反，其化學和生物戰計劃并非僅僅用于防衛目的，而是具有很強的攻擊性。令我膽寒的是，一切都做得那么科學、嚴謹、冷靜。在此之前，我們就聽到過提交給委員會的許多事實細節。但是，一塵不染的實驗室中穿白大褂的人們，在設計這些攻擊性計劃時也有考慮不周的地方，他們背棄科學，為邪惡服務。參與初步調查的委員會工作人員值得稱道，開普敦大學的學者幫助我們的工作人員解析復雜的科學公式，同樣值得褒獎。

聽證會上展示的證據表明，科學家、醫生、獸醫、實驗室、大學和具政治傾向的公司，通過廣泛的國際網絡支持了種族隔離。科學實驗的目的是為了給某些人群帶去疾病，損害其健康。霍亂、波特淋菌、炭疽病、化學毒藥及鎮靜劑、搖頭丸等（用于集體控制的）毒品的大量生產，都是這一計劃中的項目。我們現在不得不問，開普敦有色人公寓毒品泛濫，這究竟是不幸的社會現象，還是和化學與生物戰計劃存心破壞這些社區的風化有關呢？

一切都顯得有點離奇古怪，某些方面甚至像詹姆斯·邦德電影中的情節。下毒的工具包括特殊的雨傘、改錐和其他可以成為致命武器的東西。但是，利用科學對付無辜的人們，讓我不由得想到達豪集中營的恐怖。對我來說，化學與生物戰計劃是種族隔離最沒有人性的一面。我可以接受其維護者會盡一切努力垂死掙扎，但從沒想到他們會敗壞到如此地步。計劃的領頭人是一個心臟病專家烏特·巴森醫生，媒體稱之為“死亡醫生”。當不得不來到委員會時，他表現得頗為冷漠，和我們捉著迷藏，稱他已經受到刑事起訴，為我們作證可能會讓自己罪責加重，因而不能提供證詞。他的舉動帶著挑釁，出席聽證時，他穿的是曼德拉總統喜愛的那種色彩鮮艷的“馬蒂巴”上衣。

該計劃耗資巨大。其研究卻建樹平平，而執行者的不稱職，更是令人瞠目結舌。這對計劃謀害的目標反而成了幸事。幾乎置契卡尼博士于死地的神秘行動也揭開了蓋子。在他的一次旅行中，行李箱被做了手腳，內褲被浸上毒藥，但浸得不夠。可見，執行下毒命令的人不稱職，讓他撿了條命。據說計劃中有一個項目，是要找到一種專門針對黑人的細菌，以降低黑人的生殖能力。

科學家沙爾克·范·倫斯伯格醫生是證人之一，他在聽證會上說：

曾有計劃用不留痕跡的重金屬毒藥鉈摻入曼德拉總統在普爾斯莫［監獄］使用的藥品。曼德拉釋放后，我在和［另一個研究人員］安德烈·伊梅爾曼談話時……他很肯定地說納爾遜·曼德拉的大腦功能肯定會逐漸受到損害。

感謝上帝，他們都未能盡職。我們民族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曼德拉這樣一個寬容與和解的熱情倡導者。

1998年6月14日，即化學和生物戰聽證會后的那個禮拜天，我應邀到比勒陀利亞林伍德一個白人富人區的荷蘭新教教堂布道。這也是一些前政府要員的教區。教堂里要人云集，這也是我第二次進入虎穴。

直到最近，白人的荷蘭新教教會一直堅定地支持種族隔離。它為種族隔離提供神學依據，而且甚至在政治家之前就提出某些立法，以上帝的名義主張種族的隔離。他們利用巴別塔、人們被分散并因語言不通而無法溝通以及“含”（Ham）的咒語（他的子孫后代被詛咒永遠做“奴仆的奴仆”）等故事，讓本地人循規蹈矩。用在巴別塔的故事中上帝對人類罪孽的懲罰，來解釋上帝的神圣意愿不免奇怪。這完全忽視了在《使徒行傳》第二章中記錄的第一個基督圣靈降臨節，在教會看來這是對巴別塔的徹底扭轉。大部分教會都譴責種族隔離為異端邪說，而荷蘭新教教會卻騷擾那些反對其立場的人，并宣布其為異教徒，其中就有繼我擔任南非教會理事會秘書長的貝葉爾·納武德博士這樣的出色人物。

但是，這個長期從神學上堅持種族隔離的教會，終于放棄了這一立場。它把過去受到迫害和具有長遠眼光的見證人請到了宗教大會上，并公開為教會給他們帶來的痛苦表示深切的歉意。看到貝葉爾·納武德這樣的上帝的忠實維護者恢復了名譽，令人很是欣慰。很少有教派會如此直言不諱地承認自己行為的錯誤。我自己所在的圣公會在其教義、宗教大會及大會的決議中，一向反對種族隔離，但它卻是以種族隔離的形式存在的。當然，南非是一個種族隔離的社會，很難有非種族主義的教區，但圣公會卻遲遲不肯承認它說的是一套，做的卻是另外一套。許多白人教民拒絕和家庭幫工一起領圣餐，但就是在種族隔離制度下他們也沒有理由這樣做。教會建立一個多世紀后，才在1960年任命了第一位黑人主教。政府并未下令讓教會根據種族給牧師發放津貼，但實際上白人牧師比黑人牧師的薪酬高得多。因此，我們圣公會的人和荷蘭新教教會相比，也沒什么好自得的。

為比勒陀利亞之行做準備時，我心中忐忑不安，因為那里的許多白人，特別是阿非利卡人，都視我為惡魔，稱不上是基督徒。他們懷疑，我主持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工作，實際上是要追殺阿非利卡人。然而，我受到了熱烈歡迎。教堂里擠滿了人，音樂美妙極了。一群孩子手持蠟燭，列隊走進來。我講的經文是《羅馬書》5 : 8中我最喜愛的一段：“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我進行的唯一布道，就是上帝是以慈悲的心懷無償地愛著我們，我們不需要取悅上帝以換取他對我們的愛。

接著我說，阿非利卡人認為他們在南非的政治、社會和社區生活中，只有兩種選擇，即要么做統治一切的人上人，要么做卑躬屈膝的人下人，任人踐踏。我說，現在還有激動人心的第三種選擇，即熱誠地歡迎新制度，用他們掌握的巨大財力、技能和經驗，幫助建立人人得益的社會新秩序。

我告訴他們，化學和生物戰聽證會揭示出的一切是多么讓我心痛。我祈禱，在白人中間，特別是在阿非利卡人中間，能夠出現領袖人物，幫助我們正視這一切，并且明確道歉，而不要自作聰明，虛情假意地讓道歉成為空話。這是一個驚人的時刻。人群中有幾個人在啜泣，奧奇·魯本海默牧師走上講臺，和我站在一起。他的雙眼噙滿淚水，忍不住在低聲哭泣。他說，他擔任隨軍牧師30年，從不知道有這種事在計劃中或已經發生。他哽咽著請求我的寬恕。我們在講臺上擁抱在一起，人群中發出了激動的歡呼聲。

上帝在我們這塊土地上成就了一些離奇的事情，而這就是其中不凡的一件。這件事能在比勒陀利亞富人區的荷蘭新教教堂中發生，就顯得更加非同尋常。這就如同美國南部的白人牧師在黑人牧師布道的教堂里，為隔離黑鬼而賠禮道歉；又如同以色列前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到約旦河西岸為巴勒斯坦領土上的猶太定居點賠禮道歉一般。我們共同的祖國的確充滿了希望。只有最為冷酷的人才會對此無動于衷。這個例子，再次顯示了上帝通過委員會實現的非同尋常的和解。

在委員會的早期工作中，我們在開普敦附近的帕爾舉行過一次聽證。當時最重要、最感人的，莫過于荷蘭新教教會主要神學院所在地斯泰倫勃斯的白人長老會發表的講話。他們坦言沒有遵從耶穌基督福音書中的要求和戒律，這是我們從他們口中聽到的最直接、最明確的懺悔。長老會對自己與非正義的社會政治制度沆瀣一氣，而不是和窮人、下層人及被壓迫的人們站在一起，并未含糊其辭。在往往是自我狡辯的氛圍里，這不啻是一股清新的空氣。

在帕爾舉辦了一個特別展覽，展示種族主義歷史和反種族隔離斗爭的重大時刻。其中一個部分是關于征兵的，展品之一是士兵華萊士·麥克格萊格在納米比亞爭取獨立的斗爭中使用過的軍服和武器。他出生在阿非利卡人家。他母親安娜瑪麗還不能接受兒子已戰死邊境的事實。在書面陳述中，她對我們說：

我被告知，我的兒子在［納米比亞北部］離奧沙卡提幾公里的地方被殺。他被裹在厚厚的密封塑料袋里運回了家。我們接到命令，不得打開塑料袋。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的兒子四肢還完整。他叔叔雙手摸遍了塑料袋，確認了這一點。我是從他那里聽說的……

我知道這是軍事法律。即使孩子躺在那里死了，也不能再看他一眼。給華萊士下葬的那天，他的棺材也沒有打開。我最后一次看到兒子，已經是10年前了，而為他安葬也已經9年，但我仍在掙扎著完成對華萊士的悼念。

有時我懷疑裝在塑料袋里的究竟是不是他。如果我沒能親眼看著他離開，我如何能在心中讓他安息呢？當我失去我深深愛著的母親時，我看到了她，觸摸到了她，因而能夠與她分離，繼續生活下去。但是在華萊士身上，卻有那么多沒有解開的疑問。

我痛苦掙扎著，我想知道他究竟死在哪里？怎么死的？死的時候，有誰和他在一起？有沒有人曾試圖幫他保住性命？是哪位醫生救治他的？我從未得到問這些問題的機會，也沒有人對我兒子的死給我任何解釋……

我有時仿佛看到華萊士就在大街上。我清楚地記得有兩次，我都以為自己看到了他。其實只是個像他的人而已。在兒子死亡和誕辰紀念日上，我尤其感到痛苦。1月份，他就應該是30歲了。我把他的所有照片都保存在相冊中，以安慰自己的心靈。可是當許多事情仍是懸念的時候，這樣做是很難的。

委員會安排麥克格萊格一家和曾與他們的兒子一起行動的人見了面。他描述了華萊士死時的情景，安娜瑪麗·麥克格萊格太太一直低聲念叨著：“Hy is rerig dood（他真的死了）。”一旦事實確鑿無疑了，她似乎就能夠接受這一災難，將一切了結了。她不必再自我折磨，妄想著部隊搞錯了，她的兒子還活著。

我無法忘記一個到委員會作證的母親的凄慘哭聲。她告訴我們她兒子失蹤了。她認為他可能已經死了。她不能肯定，但覺得他已經不大可能還活著，因為他音訊全無，也沒有什么被流放的傳言來打破一直折磨她的沉寂。她從心底里發出請求：“你們難道不能找到他的一塊骨頭，讓我好好地為他的遺骸下葬嗎？”

反種族主義斗爭經受了殘酷的考驗。特務們總是趁著夜色，綁架被他們懷疑為“恐怖分子”的人或者解放運動的地下干部，以及尚屬合法的反種族隔離運動的領頭人。然后，他們將人質押到偏遠的警察局或農場，酷刑折磨，最后常常把這些人殺掉。他們還經常越過南非邊境，理直氣壯地進入鄰國，侵犯這些國家的主權與領土完整，劫持他們想要的人，并隨心所欲地進行處置。許多人就這樣失蹤了，剩下的只有母親悲傷的哭聲。沒有委員會，這哭聲只能隨風飄去，消失在無奈的嘆息中。

差不多有200多人失蹤。掌握了大赦申請中的信息之后，我們的調查人員奔赴到全國各個角落調查。警察和其他安全部門似乎頗為成功地爭取到了個別農場主和幫手的合作，把不少人掩埋在鮮為人知的墓地，幫他們掩蓋著黑暗的秘密。如果沒有那么多尋常白人百姓自愿與國家合作，種族隔離恐怕垮臺的時間要早得多。或許他們的確相信自己是在為抵制共產主義的泛濫作出一份貢獻。否則，很難理解為什么普普通通的守法公民，竟能夠一而再、再而三地參與如此殘忍的行動。難怪一些解放運動組織認為，農場主，特別是邊境地區的農場主，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平民，而是軍事機器的一個有機部分，理應成為軍事打擊的目標。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駁斥了這一觀點，但不難理解為什么有人堅持此論。

有些農場神秘地掩埋了不止一人，成為了死亡農場。一次，委員會的調查人員打開了三個墳墓，以為每個墳中可以找到一具尸體，但實際卻是4具，一共12具死尸。所有人都為之震驚。尸體的發掘是在警犬幫助下，由懂得識別地表各種痕跡的專家進行的。病理學家和法醫專家幫助我們整理尸骨。

許多受害者的家人掘墓時在場。他們一定希望墓是空的，他們還可以指望自己的親人可能還活著，還能聽到他們熟悉而輕快的笑聲，看到他們說話時叉著手的樣子。我們總是以各種方式維持著自己的希望，盡管內心深處我們知道這一切都是枉然。否則，我們可能覺得生活無法忍受。

尸骨挖出來后，這些家庭還得搞清楚究竟是不是自己親人的遺骸。值得慶幸的是，警察部門對這些可怕事件都一一記錄在案。種族隔離制度銷毀了許多罪惡文件，但沒來得及全部毀掉，因此有時我們可以相當肯定地確認死者身份。而死者的身份毫無疑問，有時也頗為揪心。當一個墓穴打開后，一個人說：“那是我弟弟。我認得那雙鞋，是我給他買的。”

談到記錄，我記得委員會工作后期，我們的調查組搜查了很多警察局，提取幸存的檔案，并發現了許多恐怖的照片。安全警察似乎經常把其戰利品帶到這個靠近邊境的警察局，上刑，然后殺害受害者。從照片上看，被燒掉的肢體顯示他們好像使用了焊槍。要是果真如此，這又是怎樣的慘死啊！施刑者如何能忍受那惡臭和慘叫？他們或許想用照片恐嚇其他受害者。看到這些照片，我幾乎支撐不住。那些能做出這種事的人，一定異常冷酷。

我們的小組打開了多處墳墓。領導夸祖魯―納塔爾辦事處的委員理查德·萊斯特講到其中一個墓地時說：

至今縈繞我心頭，并且我終生也不會忘記的……是在夸祖魯―納塔爾挖掘的第一個墳墓。這是一個年輕女子［費拉·恩德旺德維］的墓，她是斯威士蘭非國大民族之矛的高級成員。她遭一個叫安迪·泰勒的臭名昭著的安全警察綁架，被帶到納塔爾中部警察分局租用的一個偏遠農場。她被赤身裸體關在一間小屋里。我們了解這一切，是因為殺害她的人申請了大赦。他們關押和折磨她的目的，是要說服她做內線。

后來他們覺得她已經沒用了，就讓她跪下，從腦后給了她一槍。他們挖的墓穴很深，但不夠長，因此必須將她仰面放進去后，再把她的雙腿蜷起來。我們發現她的尸體時，看到腰上放著一個藍色塑料袋。我們問……這是什么。他們說，審訊和受刑時，她用塑料袋遮蓋著身體，想要維護一點女性的尊嚴。對我來說，這不僅說明了殺她的人是怎樣的人，也說明了像她這樣的人、那些死去的人，又是怎樣的人。他們說：“她非常勇敢。”

在我們處理的墳墓發掘案中，有50多起案件受害者的家人得以將親人的遺骸安葬。非國大干部的葬禮得到軍葬禮遇，并有內閣部長或副部長出席。所有安葬了親人的家庭，都對委員會深表謝意。現在他們知道了親人的遭遇，可以在心中有個了斷了。

[[1]](#_1_12) 阿斯瓦特博士是索韋托的一位醫生，斯登皮埃死后幾星期，阿斯瓦特在一次手術中被殺。據說他是在治療了這位受傷的男孩之后被謀殺的。

# 第九章 我為什么做這份吃力不討好的工作？

很多時候，我都覺得我的腦子是不是出了毛病，居然答應接受主持這個特殊委員會的工作。每當我意識到委員會中各種關系遠沒有到達理想狀態的時候，就忍不住暗自氣餒。我已經指出，我們能在性別、種族、政治派別、年齡、社會地位、宗教信仰、職業和主張等諸方面，廣泛代表南非社會，是一件大好事。但委員會這一值得稱道的特點，也意味著我們必須經過一定的時間，才能成為一個有機整體，一個可以相互信任、協商一致的團體。

在相當一段時間里，我們每個人都想讓別人知道自己不是可以小瞧的。我們花費很多時間，開辟自己的小地盤，確保自己不被忽視，讓自己的意見受到重視。如果時間充裕，可以進行團隊建設的話，這一切都不成問題。然而，我們面對著繁忙的日程安排，而且必須立即動手為我們承擔的非同小可的任務搭建基礎設施。這種爭權斗勢，令人頭疼得要發狂。當然，大部分同事都工作得非常勤奮。其中有一位對委員會的目標盡心盡職，甚至在我們向曼德拉總統提交了《報告》，她自己的任期也已經結束后，還自愿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處理委員會未及處理的問題。

由于我們在極大的壓力下工作，大家都神經緊張，時有摩擦。我們都能把矛盾控制在一定程度，作為一個比建立之初更為團結的群體完成工作，已經非常了不起。我們活像一群神經質的歌劇女主角，動輒就會為雞毛蒜皮甚至捕風捉影的事而感到不快。

或許，我們沒有意識到，我們所有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種族隔離的打擊，都帶著這樣那樣的創傷。這個邪惡制度所傷害的人，遠比我們想象的多，因為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我們都受到過種族隔離不同形式的傷害。參與委員會的工作后，我和其他人才意識到這一點。更準確地講，這一意識如同一記重錘把我們打醒。無論是支持者、罪犯、受害者，還是這一罪惡制度的反對者，我們的人性都受到了觸動。沒有種族隔離，我們所有南非人就不會成為我們后來所成為的整體。那些曾享有特權的人對一切越來越漠然和無情，越來越失去人性，因而也越來越不成其為人。他們失敗了，因為這個世界的構造，要求我們必須遵守其道德法則，不然就要付出代價。其中的法則之一，就是我們被《圣經》中所說的“生命之束”（the bundle of life）綁在了一起。我們的人性和其他人的纏繞在一起。我們之所以為人，是因為我們有所歸屬。我們為群體、為歸屬、為家庭而生，并生活在微妙的相互依存的網絡中。的確，“人獨居不好”[[1]](#_1_15)，因為任何人獨處都無法保持人性。無論情愿與否，我們都是彼此的兄弟姐妹，每個人都是可貴的生命。這不以人種、性別或政治、經濟、社會和教育地位為轉移。每個人不僅應當得到尊重，而且應當作為上帝形象的化身受到敬仰。如果以任何不及于此的方式對待他人，就不僅僅是邪惡的、痛苦的，而且簡直就是褻瀆神靈，因為這等于向上帝的臉上啐唾沫。如果這樣做，就不能逃脫違反宇宙法則的后果。

正如彼得·斯多利主教在溫妮·曼德拉的聽證會上尖銳指出的那樣，反對種族隔離的人，也可能成為自己最為痛恨的那種人。令人悲哀的是，他們常常變得像他們所反對的人那樣殘忍、墮落。受害者往往主觀上接受了統治者強加給他們的定位，甚至開始認為自己大概就是其主子告訴他們的那種人。因而，他們也常常會認為值得為統治階層的價值觀念而奮斗。由于自我憎恨和自我蔑視作怪，受害者的內心形成極為負面的自我形象。這種形象侵蝕著自愛和自信，蠶食著他們的自我。這也是美國黑人相互殘殺、自我毀滅的禍根。社會制度讓人們充滿自我仇恨，并使他們朝這個目標邁進。他們恨自己，并通過毀掉那些他們學會憎恨的類似這一自我的人而毀掉自己。

不公正，特別是種族不公的最為褻瀆神靈的后果之一，就是它可以讓上帝的孩子懷疑自己是不是上帝的孩子。南非成了受傷者之間的戰場—他們或是身體遭受重創，或是心靈飽經摧殘。或許那些聲稱自己沒有受到肉體和精神傷害的人，才是真正需要憐憫的人。

委員會的任務就是要幫助受到創傷的人民愈合傷痛。委員會的成員并非高人一等，并非向貧窮、不幸的受害者予以施舍。我們帶著自身的負擔而來。我們同樣受到這一制度的影響，它為南非定了性，讓她自我殺戮，向自己開戰，讓她成了世界的棄兒。所幸的是，這個世界沒有看著我們胡來而袖手旁觀，而是為我們祈禱、愛我們，為我們感到震驚、抵制我們、制裁我們，直到1994年4月21日出現舉世矚目的奇跡時，又繼續支持我們。

我不是太聰明。如果聰明的話，就應該知道我們一起步就邁錯了腳，因為我們在第一次會議上任命和推薦的所有工作人員都是白人。我們都急切地想盡早開展工作，于是我建議讓我做主教時的私人助理和秘書，擔任我在委員會的私人助理，因為他不僅了解我的脾氣秉性，更重要的是他能讀得懂我的手書。此外，我的前新聞秘書擔任了新聞總監，因為我們需要和媒體盡快聯絡。伯萊恩博士也作出了類似的安排，讓現任秘書擔任他在委員會的秘書。這些任命幾乎未經討論就執行了。當我和伯萊恩博士建議由一個在人權案中嶄露頭角的年輕白人律師擔任委員會的執行秘書時，卻捅了馬蜂窩。委員們雖不明說，但卻明白無誤地表明對究竟由誰執掌委員會深感憂慮。是由我運籌帷幄，還是僅僅充當伯萊恩的黑色門臉？他是個堅定的強硬派，“斗爭”記錄無懈可擊，但卻可能成為南非反種族隔離政治斗爭中的仇恨對象，被認為是想利用委員會實現個人野心的白人自由派。事情何至如此，誰也說不出個究竟。但是，水已經給攪渾了，近兩年之后，人們才開始認為我們實際上站在同樣的立場上，抱有許多共同的憂慮。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還經歷了其他一些小差錯。第一批工作人員上任后，我們很快就碰到了一個棘手的問題。西開普地區辦事處任命的第一批人中，有一個是一位委員會成員的配偶。這種情況本身并非一個大問題，問題出在這位委員是面試小組的成員，而面試她的配偶時，她本應有先見之明，要么回避，要么聲明相關利害。地區辦事處的大部分同事都對她的原則性毫不懷疑，對她參與面試沒有什么異議，不擔心她的判斷力會因為裙帶關系受到影響。但其他同事則不能茍同。正當我們舉行東倫敦第一次聽證會時，正當我們手頭事情繁多的關頭，這件事被揭露出來。這對夫妻的白人身份，更讓事情雪上加霜。不過令人費解的是，面試小組還有其他成員，如果這個人真的不合格，他們勢必會拒絕錄用，但人們對此卻視而不見。

于是，在本應全力以赴利用第一次聽證會有效宣傳委員會的關鍵時刻，我們不得不一心二用。第一次聽證的效果以及給媒體和公眾留下的印象，對受害者是否愿意前來作證具有重要影響。因此，為這樣的事分心，的確非常不合時宜。我還擔心某些媒體無法抵制這類花邊消息的誘惑，早就把委員會視為追殺阿非利卡人和非國大打擊政敵的工具的人，更會對此熱心。委員會中某些人和媒體打交道時非常幼稚，為自己出現在報章、電視上而自命不凡、洋洋得意，忘了應保守法律規定的秘密。

我們懊惱地發現，委員會漏得像個篩子。根據法令規定至少應在聽證舉行前保密的消息，不斷被泄露公開，更增加了相互的不信任。我們不知道敏感的材料是否會不合時宜地泄露和公開。我得學會拋球游戲，在空中同時拋接幾個球—擔當起團隊所有成員的領導職責；讓每個人都感到自己是特殊的、受到珍視的，并為委員會帶來了不可或缺的價值；向媒體提供他們應該得到的消息，防止得罪媒體，影響這個進程。

幸運的是，我有一個記者出身的出色的新聞總監，他備受媒體尊重。總體上，我也和報道委員會工作的媒體保持了很好的關系。很久之前我就決定，在我的公共生涯中，要盡量接近媒體。在斗爭的艱難日子里更是如此，因為我們自己的力量有限，需要媒體幫助，與種族隔離政府資金雄厚的宣傳機器較量。我還決定，最好是采取直截了當、保持透明的策略，這樣我有時不得不說“無可奉告”或“稍等片刻”時，記者們會信任我，知道我不是故意不吐露消息。我們也認識到，搶先把自己的消息發出去實為上策，因為這樣常常會削弱后續消息的力量。如果讓人首先抓住把柄，不得不申辯解釋，那就再狼狽不過了。一旦需要申辯，就等于已經輸了這個回合。因此，我盡量避免出現過多的秘密。人人都喜歡權力。最令人興奮的莫過于擁有秘密。但如果外面的人不知道你有這樣的寶貝，擁有秘密又有什么意義呢？我們努力防止這種炫耀的誘惑，盡量爭取媒體的信任。盡管如此，我們還是不時因走漏了消息而處境尷尬。

就這樣，在第一次聽證會上，我們本該集中精力進行熬人的聽證，現在卻擔心如何應對媒體就任命委員會一位成員的配偶一事可能提出的尖銳問題。幸而要么消息沒有走漏，要么媒體認為和在委員會聽到的令人心碎的證詞及展示的創傷相比，這件事根本不值一提。如果我們表現得鎮定自若、成竹在胸，那么我們非得是天才演員，平靜的水面下其實是涌動的暗流。

或許我應該更好地享受清晨的時光。我努力讓自己的思緒平靜下來，靜坐著與安詳、親切、慈愛的主同在，分享或接受一份神圣的安寧。每日的圣餐也是一種難得的享受，我通常在辦公室或飯店的房間里，和我的私人助理、新聞總監及負責保衛我安全的警官一起享用。只要在開普敦，我們都會星期五到圣喬治大教堂去。知道有那么多南非和世界各地的人為我們熱誠祈禱，令人無比欣慰。沒有這一切，我知道我一定會垮下來，始終伺機破壞的邪惡勢力，就可能阻礙愈合一個民族創傷的不凡之舉。我們會被分裂和導致失敗的勢力壓倒。我們幸運地一直保持著與善之源泉的聯系，這不僅靠我們自己的努力，更多的是靠許多人的愛心和關注。

《舊約》中說，一次，先知以利沙和仆人被一群敵人包圍。先知出奇地鎮靜，泰然處之，而仆人卻越來越不安。先知請上帝打開仆人的眼睛，于是他看到自己一邊的人遠遠多于敵人。我們南非人在自己的生活中就經歷了這一切，即善的力量實際遠比邪惡強大。我們在委員會也遇到過幾次這樣的情形，對那位委員會委員配偶的任命即是一例，一個原本可能鬧翻天的事情，最終還是友善解決了。可我寧愿委員會沒有經歷過這樣的插曲。但看看委員會的組成，想想種族隔離給我們造成的惡劣影響，這樣想未免天真。即使不是這個問題，也會有別的問題出現。這幾乎是我們正視各自的過去、正視整個國家的過去的一個必經階段。我們是航行在驚濤駭浪間，指望我們一帆風順，未免太過烏托邦和超理想主義了。

還有一次，我接到報告說委員會的一個小組在處理與比紹大屠殺相關的證人時有失公正，報界對此大量報道。我對媒體說，我們深知，法律要求我們不偏不倚，這樣來自沖突各方的人們才能感到聽證對他們是公正的，他們沒有受到歧視。我說，我們不可能讓人們認為我們偏向一方而破壞了我們事業的成功，我們破壞不起。

那個小組的成員認為我讓他們當眾出了丑。不久，他們在委員會的一次正式會議上提出此事，說他們不認為自己做了什么需要道歉的事。他們覺得，他們對曾支持種族隔離制度的人所提的問題和所抱的態度，是公平和恰當的。當然，他們也承認自己完全了解這些人幫助種族隔離制度給受害人帶來的痛苦。我強調，他們完全有自由擁有自己的感覺，但必須謹慎地保證公允和不偏不倚地處理所有案件。我指出，對他們的批評，并非來自那些對委員會抱有敵意的記者，而是那些希望看到我們成功的人。我的同事們堅持認為自己沒錯，而且對所有并非一貫客觀或支持斗爭的媒體抱懷疑態度。這次會上，顯然大家并非同聲相應。抱有反對意見的委員寫了一份書面材料，其中一段對我的原則性提出質疑。我對整個事件非常重視，我們的工作可能因此受到無法彌補的損失。于是，我說我不可能在我的誠意受到攻擊的環境中工作。我還說，如果他們不重新考慮他們的聲明并認識到其行為的嚴重性，我將提出辭職。最終我們還是找到了圓滿的結局—那個段落被撤回，而這一次的內部危機和辭職威脅也沒有透露出去。但是，我們為此事都付出了身心兩方面的代價。

我們在努力學會相互信任，成為一個更為團結統一的整體。這中間我們遇到不少坎坷和波瀾，但和涉及一位委員的指控相比，這一切就是小巫見大巫了。在一次大赦聽證會上，一位委員被指控曾參與了聽證所涉及的事件，即1993年12月30日阿扎尼亞人民解放武裝對開普敦郊區瞭望區海德伯格酒館的襲擊，至少也是個同謀。事件中，兩名武裝分子對酒館的客人開槍掃射，造成3名婦女死亡，6人受傷。他們還向人群中投去裝滿釘子的手榴彈，幸而沒有爆炸，否則死傷人數還要更多。在被指控的6人中，3人被判長期監禁。正是審議這3人—漢弗里·盧楊鐸·基昆發、維伊希勒·布賴恩·馬達斯和祖拉·普林斯·瑪巴拉時，一個證人認出了作為委員和調查部領導的杜米薩·恩徹貝扎先生。

在調查這些大赦申請的過程中，調查組在過去警察的檔案里，找到一個叫貝納特·斯巴亞先生的書面陳述。陳述中說，斯巴亞在海德伯格酒館襲擊事件后不久，在開普敦的黑人小鎮古古樂圖，看到一群武裝分子在一輛以恩徹貝扎先生名字注冊的車里。斯巴亞先生說，他還見到一張紙，上面畫著去海德伯格酒館的路線草圖。委員會調查人員和斯巴亞先生進行了面談，他進一步證實了陳述中的內容。在1997年10月的聽證會上，他就所作的陳述出面作證。當問到斯巴亞先生是否能夠認出他在古古樂圖看到的站在車邊上的恩徹貝扎先生時，全場都屏住了呼吸。他緩緩地在屋子里走著，經過恩徹貝扎面前，然后又折回，說他就是那天晚上他見到的人。

與這一證詞及指認相比，委員會內其他的事情都變得像周末野餐那樣輕松。聽證結束我回家時，心里多么希望這不過是一場可怕的噩夢，一覺醒來我們會看到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仍是秩序井然、有條不紊地工作著。然而不是這樣，這就是嚴酷的現實。報紙為此刊出大幅標題，電視連續播放斯巴亞先生在屋里緩緩走動最后停在目瞪口呆的恩徹貝扎先生面前的畫面。值得稱道的是，恩徹貝扎先生沒有做出什么一時沖動的反應。我心懷忐忑地相信他是正直和無辜的。斯巴亞先生經受住了恩徹貝扎的律師窮追不舍的犀利盤問。許多人都說，他的表現非常出色。盡管他只是個沒受過教育的花工，但卻非常自信，不任人擺布。他似乎講的是實情，我們的確遇到了大麻煩。幾個月前，我們的調查人員就聽說了這份陳述的事，但我們錯誤地認為，通過一種恩徹貝扎回避的內部調查，可以在聽證進行之前解決問題。但我們沒有做到，現在事情公開化了，整個委員會的工作都受到了威脅。

這個特殊案件如同委員會本身的O. J. 辛普森案，對工作人員來說尤其如此。他們幾乎按種族分裂成相等的兩個陣營。認為斯巴亞先生講的是實情的人，覺得他太老實，不可能編造出他所講的一切；只有一種解釋，即他沒有編造。斯巴亞的大部分支持者都是白人。同樣，也有人深信恩徹貝扎的話，認為他是無辜的，而這些人大多是黑人。種族隔離真是貽害深遠。

你可以想象委員會的敵人是什么感覺。當我們被頭上的陰云壓得喘不過氣來的時候，他們卻在郊游。這件事從根本上動搖了我們。如果發生在委員會建立之初，我們必毀無疑。但兩年后的今天，我們已經建立了更多的相互信任。委員們幾乎一致接受恩徹貝扎的正直不容懷疑，我們相信他的話。這里面有些值得慶幸的事，但更多的是矛盾和沮喪。

在指認恩徹貝扎引起軒然大波幾天后，斯巴亞便惴惴不安地要找我談話。他坦白說給警察的書面陳述和后來的證詞都是假的。他說海德伯格酒館襲擊事件發生時，他恰好因非法販賣小龍蝦被捕。他被警察酷刑威逼作了偽供，陷害恩徹貝扎。當時，恩徹貝扎被警察認為與阿扎尼亞解放武裝及泛非大有牽連，面臨著一系列指控。他在數次政治審判中為他們擔任律師，和1981年被殺的德班律師格里菲斯·姆先格一樣，成了警察的眼中釘。

說我們如釋重負，還不足以表達當年的情形。我們還爭分奪秒地要讓整個世界了解這一情況。我帶著斯巴亞先生參加了記者招待會，他的辯護律師也在場。一場噩夢不可能有比這更好的結局了。對那些盯在我們身后恨不得現在就給委員會下訃告的人，這是最好的駁斥。這些日子里，可憐的恩徹貝扎如同生活在地獄里。雖然幾個同事的支持可聊以自慰，但這哪里敵得過工作人員中半數和外面的大部分人都對你譴責呢！禿鷲在頭頂盤旋，吃不吃掉你只是早晚的問題。

盡管斯巴亞先生進行了坦白，委員會還是決定請曼德拉總統緊急任命一個司法調查委員會進行徹底調查。總統爽快地答應了我們的請求，任命了德高望重的憲法法院法官理查德·戈德斯頓，并要求他盡早提交報告。我認為在法官的報告出來之前，恩徹貝扎暫時回避委員會的工作是明智之舉。但他拒絕了，因為他說這等于承認自己有罪，而他完全是清白的。

戈德斯頓法官行動迅速，很快就提交了報告。他認為指控是錯誤的，恩徹貝扎無罪。他批評委員會沒有在指控剛出現時就要求進行獨立調查。我應該對此負責，因為我的確希望通過內部調查把事情查個水落石出。我想另一個動機是我希望盡量避免委員會出丑，盡量庇護同事。這不是明智的決定，也表明保持透明是多么重要，對所有人都有好處。但是，這段經歷再次表明舊制度即使壽終正寢，也會想方設法拔除身上的肉中刺。如果不能排除這種影響，我們還會為那個時代的警察系統付出代價。

前總統曼德拉的確是個了不起的人。這已經是盡人皆知的事實，再說就有點陳詞濫調了。他知道恩徹貝扎會坐臥不安地等待戈德斯頓的報告。因此，一拿到法官的報告，他就急切地要讓恩徹貝扎知道他完全無罪，打電話把這個好消息告訴了他。但是，我對這一不顧禮儀的舉動卻感到不快，于是打電話給總統秘書，說她應該告訴總統我不高興，因為作為委員會的主席，我應該第一個了解報告的內容。我剛掛掉幾分鐘,總統就來了電話。他說：“姆彼羅［我的非洲名字］，你是對的。我應該先告訴你，但我為那個年輕人擔心。我道歉。”像他這樣如此屈尊的大人物，我所知道的沒有幾個，但他在全世界都被認為是一個特殊的人。

每次我想低頭認輸的時候，這樣的事情就會發生。真和善終于占了上風,而我又一次意識到能參與如此非凡的試驗是何等的榮幸。于是我又抖擻精神繼續前進，直至遇到下一次迎頭打擊。

還沒有來得及說“種族隔離”之前，又一次危機在1998年10月29日我們向總統提交《報告》前夕意外地發生了。現在我更明白了什么是“雞沒孵出來前先別忙著點數”。

建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所依據的法令規定,委員會意在對個人、機構或組織進行不利調查時，必須書面通知調查對象。這類通知送達過個人，也送達過各種黨派。每個調查對象都有機會向委員會提供進一步證據，修正不利調查的結果。所有得到通知的一方，都有機會與委員會對話，但只能書面進行，因為根本就沒有時間聽取為數眾多的可能被指控為罪犯的人的口頭陳述。在非國大的案件里，各種問題已經在三次涉及其政治和武裝領導人的聽證會上得到明究細查，他們也得到了充裕的時間對通知予以答復。

非國大要求和委員會舉行特別會議，討論通知里的內容。我必須說，我們中有些人對此十分吃驚，因為對非國大來說，通知不過是一個形式而已。幾經推敲的調查結果，都是以非國大自己遞交的翔實、全面、坦誠的材料為依據的，其中包括為違反人權行為表示遺憾。這些行為有時是解放運動的特工在執行非國大的政策，有時是因為他們沒有完全遵守非國大的指示，還有一些則是干部對種族隔離當局的報復行動。

比如，非國大為在地雷戰中造成的平民傷亡（地雷戰也因此而終止）以及比勒陀利亞教堂街爆炸事件中傷害了無辜，而表示歉意。非國大還承認，有些女性成員在設在安哥拉和其他地方的軍營被奸污，領導層為此承擔起了道義和政治責任，不愧為表率。這一原則立場在非國大的最高領導層身上得到合乎邏輯的表現，他們集體象征性地請求大赦。這一姿態高尚、可敬，充分說明他們沒有拋棄自己的隊伍，而是情愿代為受過。可惜《促進民族團結與和解法案》中沒有集體申請大赦的條款，但是這一舉動背后的動機是值得稱道的。因此，我們沒有想到他們會給我們帶來什么麻煩。

委員會代理主席杜米薩·恩徹貝扎委員和非國大進行了頻繁的聯系，指出所有收到通知的人都應立即以書面形式就相關問題向委員會作出答復。非國大秘書長許諾向委員會提交該黨的書面答復，因此他覺得問題已經妥善解決。但是，非國大直到超出了我們規定和他們許諾的最后期限，才遞交了答復，然而《報告》已經付梓。

這一切發生時，我和伯萊恩博士都在美國做訪問學者，他在紐約大學法學院，我在埃默里大學坎德勒神學院。我們原計劃回國參加委員會交接之前的最后一次會議。交接儀式本該是一次盛大的活動，到會的將包括受害者代表、外交使團以及各宗教團體和非政府組織的代表。南非廣播公司屆時將在電視和電臺進行實況轉播。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將登臺亮相。

最后一次會議差不多就是例行公事。我們已經變得非常親密并共同經歷了那么多難熬的日子，在最后一次正式會議上，大家不免情緒激動，依依不舍，甚至黯然神傷。我們首先宣布，大赦專門委員會的兩位委員已被任命擔任全國副總檢察長的要職，而兩位也非常稱職。然后，又講了些閑雜事項。接著，猶如晴天霹靂，一位委員提出重新審議非國大要求召開一次會議的要求，因為有些委員認為應該召開這樣一次會議。重新審議開始時已經是11點鐘。我和其他委員力圖說明，這樣做只能讓大禍臨頭，因為這可能被解釋為向執政黨獻媚，任何其他個人或組織都沒有得到過類似的待遇。有些委員敦促說我們應該審議非國大遲交的書面回復，而兩天后共5卷、2700頁之巨的《報告》就將印好，并提交曼德拉總統。

審議非國大在我們的寬限期后才遲遲提交上來的答復，甚至可能帶來更為災難性的后果。即使他們能有理有據地說明為什么委員會應該修正其調查結果，我們修改《報告》的最終結果，只能是讓幾乎所有的人都說，有充分的證據說明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不過是非國大的馬屁精和吹鼓手。這一點似乎不言而喻，但那些敦促重新審議整個問題的同事們卻固執己見，堅持與非國大舉行會議或審議其答復，即使《報告》提交在即，也毫不動搖。

我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委員會的信譽和聲望明擺著受到了威脅。任何理智正常的人都不會愿意冒險抹殺委員會的卓越成就，破壞民族和解的工作。我想盲點之所以稱為盲點，大概確實有看不到的地方。即使伸出手在眼前晃，不愿或不能看見的人也還是看不見。我看到整個進程將毀于一旦，腦子里一片空白。對那些不幸的受害者來說，這莫過于最大的惡作劇。他們為了民族那么慷慨、那么高尚地放棄了自己的權利，而現在我們卻要朝他們臉上吐唾沫，以此作為對其寬廣胸懷的回報。

我們很少投票表決，但這一次卻必須在緊張的氣氛中投票作出決定。贊成與非國大開會的一方以微弱之差失敗。然后，我們投票表決是否審議非國大的書面答復。結果，7票贊成，7票反對。僵局。我從未使用過自己決定性的一票，但這次我投了非國大的反對票。本該親切友好、完全不存在爭議的最后一次會議，竟搞得劍拔弩張。

有些同事似乎知曉非國大決定如果不開會就將我們告上法庭的意圖，可能是想避免這種尷尬局面的出現。得知這一消息后，我肝膽俱裂。在按期提交《報告》的前一天，非國大居然做出這種事—他們居然請求最高法院下令阻止我們發表《報告》中任何涉及非國大違反人權行為的部分，除非我們審議其答復材料。一切都那么不可思議。德克勒克也提出申請，要求刪除對他不利的調查結果。他的行為我們尚可理解，甚至可以說這是他的一貫特點。但是，一貫支持和解進程的非國大做出這樣的事，卻是大出意料，而且完全有悖其特性和態度。

從開普敦到即將舉行交接儀式的比勒陀利亞途中，我心情十分沉重。我們的法律部和律師委員通宵達旦準備提供給法院的有關材料。法院將在儀式前不久宣布其判決。我們繼續著各項準備工作，好像頭頂沒有高懸達摩克利斯之劍。我們為世界各地的記者開辟了專門場所，使他們能在儀式開始前的三四個鐘頭里閱讀長達5卷的《報告》，準備頭版消息。

法院的裁決下來了，非國大敗訴，并承擔全部費用。消息傳來，我們不事聲張地慶祝著。我禁不住感謝上帝，我們終于沒有讓受害者失望。整個儀式盡管比原來增加了悲哀的色彩，但卻非常隆重，既莊重，也不無歡慶，悲哀與歡笑、淚水和狂舞交織在一起。在我們的頂級唱詩班悠揚的歌聲中，總統和我翩翩起舞，跳起了后來被稱為“馬蒂巴漫步”的舞步。

當我把真皮裝幀的《報告》遞交給曼德拉總統時，心中充滿感激之情。我感謝上帝這樣善待我們，讓我們挺過了許多艱難的時刻；感謝讓我們能夠竭盡所能揭示真相；感謝我們這個機構能夠為人們帶來了結、安慰與和解；感謝我們能夠正視魔鬼；感謝上帝給了我出色的同事；而最應當感謝的還是那些來到委員會向我們、向世界敞開自己的人們。他們置自身于不顧，在恢復自己尊嚴的同時，也幫助我們重新獲得了人性。

正如圣保羅所說，我們是名副其實的、脆弱而有缺陷的土陶。至高無上的榮耀無疑是屬于上帝的。

[[1]](#_1_14) 《創世記》，2 : 18。

# 第十章 “我們原來不知道”

正常、體面、敬畏上帝的南非白人，何以能夠對一個剝削、壓迫和踐踏與他們共享一塊土地、共有一個家園的人們的制度視而不見呢？如果沒有這些少數特權階層的支持，種族隔離一天也不可能存在。如果像他們許多人后來所稱，他們“原來不知道”，為什么白人中又有人不僅知道官方政策的毒害，而且譴責這一邪惡政策，并努力結束這一政策呢？如果那些大大受益于種族隔離的人不是在縱容或聽之任之的話，那么這些人又為什么會遭到其他白人的排擠和敵視呢？

應該指出，許多白人生長在這一制度中，他們不知道還有什么其他制度，對此抱著默認的態度，因為這種現狀給他們帶來莫大的舒適。這個制度并不幼稚，而是極為精密復雜的。黑人城鎮往往設在白人的視野之外，眼不見自然容易心安理得。如果是白人，就必須愿意費上些周折，才能見到黑人城鎮。有些人確實這樣做了，但大部分人更愿意待在郊區安閑、富有的舒適窩里。我們—南非的黑人和白人—罹患了精神分裂癥，我們在身心兩方面都生活在兩個分割的、相異的世界里。我任主教時，住在絕對是開普敦高檔郊外社區的主教廷。這個區的富足可以和世界上任何地方相媲美，有的是豪宅大院、花園泳池。即使離像蘭加或古古樂圖這樣最近的黑人城鎮，也有相當遠的距離，而其他方面就更是大相徑庭了。如果不是真的想要親眼看一看黑人城鎮，白人一般不會涉足這里，甚至不愿打此經過。一個正常的白人為什么要找這個麻煩呢？

不過今天卻找不到一個曾經支持過種族隔離的人。但是，委員會想要搞清楚為什么這樣一個不可接受的制度竟存在了這么久。《法案》要求我們搞清嚴重違反人權狀況發生的“先例、條件、因素和背景”。為有利工作，我們進行了所謂“機構聽證”，由主要社會機構的代表陳述其與種族隔離的關系。

法律界、醫療部門、商界、宗教界、工會及媒體，對我們的邀請作出了積極反應。有些機構允諾前來陳述，但未能守信。其他機構則斷然拒絕，其中包括代表白人農場主的南非農業聯盟和白人的礦工聯盟。在南非進行大規模投資的跨國石油公司沒有答復。我們就青年、征兵、監獄等問題舉行了聽證，還專門召開了婦女聽證會。

在大部分聽證中，觀點通常都因種族界線而歧異。黑人自然而然對這些機構在支持和維持種族隔離中的作用持批評態度，而同一機構中的白人則為維持壓迫現狀申辯。一個人的觀念的確要視其人及其所在而定。許多白人支持征兵—在種族隔離制下只限于白人—因為他們相信政府的觀點，認為文明生活的最后堡壘受到了共產主義的威脅。大部分白人視希望廢除征兵的白人青年為懦夫和叛徒，而反對派則認為征兵無異于參與保衛他們所憎惡的制度。有人提醒我們要警惕以偏概全，情況比乍看起來復雜得多，需要進行慎重和細致的分析。

機構聽證揭示出，在這個國家里，大部分人被有系統地、蓄意地排斥在政治決策進程之外。這繼而意味著他們被排斥在任何權力和有影響的領域之外，經濟、社會各個領域無所不包。最明顯的例證莫過于在社會生活中沒有一個非白人擔任要職，保證了他們的聲音能被聽到，他們的觀點受到重視。大部分白人從自己的角度看問題，這也不足為奇。他們的價值觀被認為是四海皆準的，所有人都應該符合歐洲中心論的觀點，否則就是下賤的異類、怪胎和被驅逐的對象。大部分白人對此不假思索就接受了，而這些觀點又得到有效保護白人利益的現狀的鼎力支持。

許多機構在種族隔離制下的運作方式，在媒體聽證會上可見一斑。白人掌握報紙的所有權。新聞從白人的角度報道。即使自認為是自由派并可稱為反種族隔離的報紙，也長期認為形容一場事故中“一人和四個土民”受傷，無可厚非。白人記者和編輯似乎從來沒想到，這恰好揭示了其內心的態度。盡管沒有明言，但潛意識里，他們認為黑人不像白人一樣也是人。可能有人對此說法大為光火，但聽者所得之意的確如此。

整個國家其他事情的規范，也證明種族主義深深侵入了南非人的生活秩序。因而，這些同樣的報紙一貫使用政府偏愛的說法，將被黑人稱為“自由戰士”的人說成“恐怖分子”，也就不足為奇了。他們本來可以使用較為中性的詞匯，如“造反派”或“游擊分子”。南非政府懂得必須以恐怖主義置解放斗爭于不義，因為他們知道這會引起白人及國際社會中許多人巴甫洛夫條件反射式的反應。

號稱反種族隔離的報社，在其新聞采編室里卻實行著這一制度—諸如飯廳、廁所之類的公共場所均按種族進行隔離。黑人員工無論是進修機會還是工資，總是非常背運。報社亦不反對進行自我新聞檢查，以免觸怒政府，并美其名曰規避法律控制。當種族隔離政府關閉黑人報紙《世界報》（The World）后，屬于同一家報業公司的白人報紙進行了不冷不熱的抗議，還旁敲側擊說《世界報》是在玩火，結果燒了自己。白人記者的報道往往比黑人的更受青睞，即使后者的第一手經驗更多也無濟于事。黑人記者報道安全部隊對黑人的殘暴行為時，其稿件一般都以有誹謗之嫌被修改得語氣較為緩和。我們現在當然知道，黑人記者是如實報道的。編輯也會氣憤地抗議，說自己不是種族主義分子。不，他們要的是“客觀描述”。他們并不在意從誰的角度定義“客觀”二字，因為他們的標準被認為是普遍標準。被指責為種族主義者，會令他們大驚失色，但事實上，如果黑人一詞和他們對自己人的認識及其“正當標準”相沖突時，他們便拒絕接受。黑人中無人能夠旗鼓相當地與其抗爭。這些報社甚至出版了城鎮版，似乎要顯示他們承認對什么有新聞價值存在著不同的觀點和認識。許多黑人對此態度頗為矛盾，因為城鎮版的存在似乎正是遵循了政府各種族各自發展的旨意。

政府威脅要嚴辦那些“沒有紀律”、惹是生非、鼓動黑人的報紙。這一招的確奏效。那些報紙的業主們乖乖就范，做了政府的幫兇，甚至關閉了一家勇敢地擁護被壓迫者斗爭的報社。這家報社就是擁有一些出色編輯的《蘭德每日郵報》（Rand Daily Mail）。它一直是政府身上的芒刺，在同業的壓力之下，只好關閉。政府懂得既相對自由又順從聽話的報業的價值。這可以起到很好的對外宣傳作用：“南非沒那么壞吧？至少其新聞業是自由的，有批評精神的。”阿非利卡新聞界則大言不慚地頌揚和支持種族隔離政府。阿非利卡報社對此毫不諱言。他們堅定地站在國民黨和政府一邊，大部分是黨的喉舌。

電子媒體情況亦然。南非廣播公司掌握在阿非利卡兄弟會這一秘密社團手中。該會成立于1918年，旨在促進阿非利卡人的利益。其觸角無所不在，深入到教會、學校、商業、文化界、大學、專業人士、國防軍、體育和媒體之中，當然還包括政府的政策。它的政策成了政府的政策。如果不是這個強大無比、無所不在的秘密社團的成員，要想在阿非利卡人世界中的任何一個領域出人頭地，機會等于零。違背其戒律和決定，就休想取得成功。

于是，南非有了一致的最高德行：不要與制度作對。最高德行的基礎，就是對兄弟會言聽計從。這可能也是為什么人們沒能培養出提出尖銳問題的能力的原因。對大部分人來說，只要某個權威人士發話了，事情就有了定論。就算并非不可能，至少他們覺得很難區分什么是權威、什么是專斷。最后連最為奇怪的事情也可以接受，因為他們已經培養起從眾的本能。由于日元的巨大能量，來訪的日本商人被尊為“榮譽白人”。在南非出生的華裔是“非歐洲人”，而出生在中國的中國人卻自然而然地被歸入歐洲人之列！好在這一切并未產生重大影響，否則真是荒唐至極。有些人甚至因為被錯誤地劃歸到其他種族而自殺，因為種族歸類關乎所有的自身價值和特權。它決定了你可以住在哪里、可以和誰結婚、孩子可以上什么學校、你可以做什么工作，甚至死后可以葬在哪里。

南非廣播公司的主席一度是兄弟會的頭目，而阿非利卡人大權在握，甚至監督為非白人提供各項服務的咨詢委員會都由清一色的白人組成。我們得知，廣播公司雇用的黑人，無論培訓或使用的設備，都要次人一等，工作時間也安排得別別扭扭。他們被禁止目視白人婦女，違規就要受罰。不可思議的是，員工紀律條例中規定，員工可以在解雇和受鞭刑之間作出選擇。在我們的媒體聽證會上，人們才第一次得知這驚人的內幕。黑人員工成了這種野蠻政策的受害者。

這一切之所以可能，完全因為種族主義意識形態盛行。如果總統不喜歡電視新聞中的某個詞，就可以中斷新聞，必須立即修改。沒人覺得這有什么不正常。這就是過去的南非，政府掌管一切，沒人敢提出質疑。身為國家總統的博塔是個剛愎自用、喜怒無常的人。他脾氣暴躁，據說七尺的漢子、他的內閣大臣竟讓他尖酸刻薄地訓斥得哭起來。沒人敢惹他，他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

在聽證過程中，宗教界比其他機構都更誠實地坦白自己的錯誤和與種族隔離現狀合作的事實。他們承認，他們的確公開和尖銳地批評種族隔離，但在機構的運行中卻實施著種族隔離。有些機構分裂成種族集團。弗蘭克·契卡尼博士就曾被同一教派—使徒信心會的白人成員所帶領的安全警察審訊并拷打過，而那個人結束拷打后竟徑直到教堂做禮拜去了。（這個教派的兩個陣營在一次感人的彌撒中和解，白人教徒請求黑人教徒寬恕。）在真相與和解進程中，宗教界認為他們在幫助人們撫平創傷、鼓勵信徒的和解與補償方面，肩負著特殊的責任。

白人農場主和從事商業性農業的人不僅是最初占領土地之行為的受益者，而且得益于臭名昭著的1913年《土地法》，獲得了大片土地。他們以極為優惠的條件，首先從國家，后來從土地銀行得到補貼和貸款。他們有源源不斷的廉價勞動力，因為通行證法禁止黑人在糧食生產上與備受寵幸的白人農場主競爭。實際上，黑人曾一度成長為成功的農民，對白人造成了現實的威脅。政府把黑人趕離土地，讓他們去做礦工。有人建議，教會應該仔細審查其土地的獲取方式，如果是以不正當的手段取得了土地，就應該物歸原主。人們也敦促教會研究如何緩解無地農民對土地的渴求。

醫療部門也是按種族分裂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南非沒有培養過一個黑人醫生。1990年以前，醫學院對黑人學生存在嚴重的歧視。他們常常單獨上課，幾乎被禁止在白人身上做解剖實驗，而且幾乎從未在婦科和產科做過臨床診斷。得到同樣的資歷后，他們卻掙不到和白人同事一樣的工資。但醫療界最可憎的表現體現在其與安全警察的合作中。一些地區的醫生完全違背醫德。在檢查被拘留者時，他們根本不遵守醫生和病人的保密原則。他們總是在有警察或獄官在場的情況下檢查病人。他們屈從于警方的壓力，在未經病人許可的情況下，就將檢查報告交給警方，根本置病人的利益于不顧。最為臭名昭著的例子，當然是前面講到的史蒂夫·比科一案，醫生們將病人的死活交給了警察。有些醫生教警察如何不留痕跡地進行拷打，告訴他們犯人還能承受多久。另一些醫生則拒絕給受傷的激進分子治療，理由是警察需要從他們身上得到更多的消息，或者他們不能幫助恐怖分子。

法律界也好不到哪里。直到1990年，一些地區的律師協會仍拒絕黑人加入，使黑人律師難以從業。種族隔離時期的一條法律禁止黑人在白人區設立事務所。現任大法官伊斯梅爾·馬霍麥德曾不得不鉆到白人同事事務所的廁所里吃午飯，而白人則在專用的白人餐廳用餐。他要工作時，必須搞清哪位白人同事出庭，以便暫時借用其辦公室。種族隔離制將他劃為印度裔人，因此他不得在過去最高法院的上訴庭所在地布隆方丹過夜。于是，當他在南非最高法庭辯護時，不得不在開庭期間日行400英里，往返于約翰內斯堡和布隆方丹之間。（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現在作為大法官，他的官邸就在布隆方丹！）在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負責審理的時間段里，幾乎所有法官都是白人男性，無論承認與否，他們都為自己的職責打上了白人的烙印。

不幸的是，南非的法官高高在上，幾乎被奉為圣人。他們極少有人能真正進入站在面前的被告的世界，因為那些人是黑人，而種族隔離制下黑人的經歷，黑人所遭受的屈辱、剝削和壓迫，對他們來說是個未知世界。因此，很少有法官會理解或同情黑人的政治抱負。法庭之外，他們見到的黑人只有家里的仆人，也不可能問這些人黑人究竟有何感受。黑人因政治罪受審時，作為賦予白人特權與霸權的統治階層一部分的白人法官，幾乎無人同情試圖推翻他們已習以為常的制度的人。因此，大部分黑人將其視為壓迫制度的組成部分。法官和律師不假思索地參與了極為不公的司法體系。大部分的法律甚至不加掩飾，毫無公正可言。

在種族隔離制度下，南非白人混淆了“合法”和“道義上正確”這兩個概念。因此，當我和另一些人指出不公正的法律并不一定要遵守時，他們大為惱火。他們對教會和大眾民主運動及其所領導的抵制不公正法律運動，非常不滿。許多南非白人認為非法等于不道德。如果向他們指出世界上存在著禁止夫妻同床共枕的法律，他們似乎不明白基督徒的義務是要服從上帝的法則，而不是哪個人的法則。上帝的法則告訴我們，上帝結合的人，任何人都不能拆散。（在控制黑人人身自由的法律下，如果妻子到丈夫做合同工的白人城鎮找他，并同宿在男性宿舍，就是違法。）

當我們問法官和律師為什么與違背正義的種族隔離制合作時，他們往往說最高權力在議會，給司法部門留下的回旋余地很小。當被問及為什么不辭職，拒絕與不公正的制度合作時，他們說他們害怕政府會任命更不具正義感的人，保住一點正義的機會總比沒有好。我認為，議會的最高權力只有在真正的民主國家，議會確實代表人民時，才能實現。南非顯然不在此列。能有相對堅持法治的法官在位當然不錯，但是如果他們辭職，或許種族隔離的丑惡可以更早更深刻地暴露在世人面前。這樣的立場可以加速種族隔離制的滅亡。南非政府利用了司法獨立。

有些法官向委員會提供了精彩的陳述，但遺憾的是他們拒絕出面作證，聲稱這將有損其獨立性。這樣的托詞很難站得住腳。委員會是一個獨特的機構，幾乎沒有重復這一進程的可能，因而也不可能形成先例。法官和其他到委員會作證的人一樣，不會被送上被告席，而是要和我們一道探討問題究竟出在哪里，構建怎樣的司法系統才能幫助我們創建尊重法治、尊重人權的文化。或許我們沒有動用委員會的權力傳喚這些法官是個錯誤，因為他們始終違背事實，堅持自己沒有責任。大部分黑人都認為司法界是邪惡制度的同伙。他們使這一制度得到了本不應得的合法性，玷污了整個司法制度。

我們黑人的理解，是黑人在南非的法庭上處于極為不利的地位。法官中不乏可敬的例外，他們不僅竭力為處于最不利地位的人們擠出一點正義的空間，而且完全沒有參與制定那些可惡的法律條款。但是，他們大部分人都拒絕接受一般都是黑人的被拘留者指控遭受酷刑的證詞。即使有醫學證據支持指控，他們也總是相信警察。一位高級警官向委員會證實了我們認為檢察與警察部門之間存在合作的直覺。在調查激進分子神秘死亡案時，情況更是如此，地方法官幾乎總是判決無人有罪。他稱，在一次質詢中，檢察官把將向他提出的問題和他應該提供的答案，都事先交給了他。

現在司法界在變革，有更多的女性和黑人被任命為法官。但最近的4個案子，讓許多人認為這一系統仍為種族隔離心態所左右。我們的總統納爾遜·曼德拉被破天荒地傳去作證，案子涉及他任命一個司法委員會調查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為白人控制的足球業時所憑借的依據，結果法庭判他有罪。另一個案子，一個白人殺害了一個黑人嬰兒，但僅被判了緩刑。第三個案子，兩個白人警官用鐵鎬掄向人群，造成兩人死亡，但法官量刑極輕。第四個案子，一個白人用槍嚇唬一個黑人婦女，把她趕出他的地界時，將她槍殺了，但也只被判緩刑。這類事情無法讓從來就不相信這一制度的人們對它建立起信心。

至于工商界，大部分黑人都認為所有公司都參與了種族主義的資本主義，與種族隔離統治者沆瀣一氣，以賺取最大利潤。工商界，特別是礦山，得益于嚴格限制黑人人身自由、使他們不能在公開市場上自由出售勞動力的通行證法。這些邪惡的法規將班圖斯坦（黑人家園）變成了源源不斷地供應廉價勞動力的基地。合同工只有在就業期間才被允許進入白人城鎮。他們被迫住在單性別宿舍，黑人的家庭生活因而受到極大影響。通行證法及其他法律，使白人的公司得以積聚大量資本，并壟斷股票交易。

聯合國的一份報告[[1]](#_1_17)指出，南非的貧富差距令人瞠目結舌，為非洲大陸之最。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認為這種情況隨時可能導致災難，必須立即消除這一差距。委員會收到的建議，包括征收財產稅、一次性公司和個人所得稅，或要求在約翰內斯堡股票交易所上市的私營公司將其市值的1%作為捐款，用于黑人的發展。委員會讓專家們去決定這些建議的可行性，但在報告中明確指出一點，即如果種族隔離受害者的物質生活沒有得到切實改善，我們就可以跟和解告別了。沒有某種補償，就不可能有和解。

我們進行的婦女聽證會，揭示了女性非凡的毅力和勇氣。統計表明，婦女到委員會作證時，講述的幾乎都是他人的經歷；而男人作證時，幾乎無一例外講的都是自己的經歷。因此，我們認為有必要進行專門的婦女受害者聽證會，聽取與女性相關的犯罪和違反人權事件。婦女在無人陪伴時似乎比男性受到了更大的傷害，折磨她們的人更容易利用她們的親人打擊她們，比如謊稱孩子生病或生命垂危。許多人訴說遭受過性虐待，性別成了侮辱她們的手段。她們或遭奸污，或在月經期間無法洗浴，或遭警察謾罵，說她們之所以參加解放運動，是因為找不到男人，實際上是男戰士的免費妓女。

我在受害者聽證會上第一次意識到，我們欠女同胞的太多，沒有她們就沒有我們取得的自由。我要為她們在斗爭中發揮的卓越作用，向她們致敬。一天，我的夫人麗雅指著一個汽車保險杠上的貼條喜不自禁，上面寫著：“想和男人平起平坐的女人沒有野心！”南非婦女的確了不起。

好壞參半

我們委員會確實帶來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美好事物。在伊麗莎白港進行的一次違反人權案專門委員會聽證會上，艾維·格琴納女士講述了白人女獄官艾琳·克魯斯對她的照顧：

同一天晚上，我看到燈光亮了，牢房的門開了。我不知道是誰打開了牢房。我根本就沒看。她對我說：“艾維，是我。我是克魯斯中士。我給你拿了點藥來。”她晃晃我，讓我把藥吃下去。我告訴她我連東西都拿不起來，不過我可以試試。我跟她說我會盡一切努力。她說：“沒關系，別擔心。我會幫你的。”她讓我吃下藥，然后開始給我按摩。這樣下來，我至少可以努力睡下。

幾天后，一家地方報紙《東部省導報》（Eastern Province Herald）在頭版刊出艾維·格琴納和艾琳·克魯斯擁抱的照片，并附有以下報道：

昨天飽受折磨的激進分子艾維·格琴納和她的救命天使—善良的女獄官重逢。在她經過數小時安全警察的殘酷審問后，是這位女獄官握著她的手，為她療傷。當兩個人流著淚悲喜交加地在露臺上擁抱在一起的時候，37歲的艾琳說：“我從沒想到你會記住我。”59歲的艾維答道：“可我被打之后，是你夜里來到我的牢房幫助我的。這樣的人，你能忘嗎？”

“那是兩個人、兩個女人的相逢。”艾維追憶道，“我們是那么心心相印。她給我拿來干凈毛巾，噓寒問暖。關系是那么融洽。”艾琳答道，幫助艾維時她覺得自己不過是在“盡職”。

如果說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盡善盡美，其成員無可挑剔，則未免言過其實，而且完全是事與愿違的。事實顯然并非如此。我們都有缺點，和其他人一樣，既有才干，也有錯誤。誰也不能以道德模范的標準來對我們指指點點。只可惜我們不是，這令我們無比沮喪和懊惱。不難看出，委員會如同牧師的雞蛋[[2]](#_2_5)，部分是好的。委員會的確有非凡之處，也取得了顯著成就，但有些事情我們完全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有些事還可以做得更好。但事情就是這樣，我們是在未知的海洋上航行，而且常常需要靈活應對即時出現的情況。能夠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要歸功于所有參與這一進程的人們。

在我看來，委員會的最大不足就是未能吸引大部分白人參與真相與和解進程。這當然可能因為我們的過錯，但也可以肯定，我們的白人同胞也犯了一個錯誤。因為與此同時，他們也拒絕全身心地歡迎新制度。我認為，他們花費了過多的時間無病呻吟，尖刻挑剔，在無中生有或真正找到現任領導人的短處時，過早地喜不自禁。他們對自己失去部分政治權力過于憤恨不滿。問題是，他們認為在任何社會政治體制中，只有兩個選擇：要么做人上人，要么是人下人。在這樣的意識中，沒有參與和共享權力的一席之地。

可悲的是，南非白人沒有一個自己的、有分量的領袖—也必須是他們自己的領袖—告訴他們：“白人同胞，覺醒吧！如果說你們失去的是絕對的政治統治，那么情況的確如此，但是你們手中仍然掌握著很多權力。你們仍掌握著大部分經濟權力，你們幾乎沒有金錢上的損失。你們沒有被趕出美麗的家園，沒有生活在棚戶里。你們受到了比黑人強出許多的良好教育，這也賦予你們很大的權力。你們可以熱烈地歡迎新制度的到來，并以自己的資金、才干和技能，助其一臂之力。我們已經非常非常幸運。讓我們以自己的所有，促進新制度的成功。否則，總有一天，黑人會因政治變革沒有給他們帶來物質上的實惠而憤怒，那時候就沒有曼德拉這樣的人物控制他們了。新制度的成功才是我們的最大利益之所在。沒有我們的合作，它會失敗，而我們也會和‘泰坦尼克號’一起沉入大海。”

盡管我們進行了不懈的努力，但仍未贏得因卡塔自由黨的全面參與。我們的確進行了努力。他們的正式參與最多只能說是不冷不熱，更多的時候是敵對的表現。我們向該黨領袖布特萊齊指出，其組織的普通黨員只有在違反人權案件專門委員會作證后，才能根據《促進民族團結與和解法》被確定是否屬于受害者，是否符合享受總統基金賠償的條件。直到我們這樣聲明之后，他們才告訴其黨員應該到委員會作證。如果他們這樣做了，就會被轉給賠償與復原專門委員會，包括進賠償金受益者的名單。我們不得不在很短的時間內，處理大量在規定期限的最后時刻才遞交上來的申請。有些受害者可由大赦專門委員會直接轉給賠償與復原專門委員會，但大部分受害者一般是通過違反人權案件專門委員會轉交的。未能及早爭取到因卡塔自由黨的參與，成了我們的又一缺陷。

在賠償與復原的過程中也存在缺陷。首先，大赦申請成功的人立刻就自由了，而受害者則在我們的《報告》遞交一年之后還在等待最后的賠償。這令我們非常沮喪，前文已經述及。我也講過，許多受害者感到，到委員會作證是個轉折點，使他們能夠為過去畫上句號。但是，包括委員在內的一些人批評我們沒能提供長期的心理咨詢和幫助。當然，我們有自己的咨詢員，給予證人的支持和同情遠遠超出一般刑事法庭。但是，很可能有些人在委員會面前重新揭開自己的傷痛后，由于沒有得到足夠的專業幫助化解自己的憤怒，反而加重了創傷。難就難在我們得到的授權是進行調查，向政府提出賠償與復原建議，而非實施。因此，我們無法得到足夠的國家撥款，為受害者提供比咨詢員更為廣泛的心理及其他方面的咨詢和支持。我們非常感謝進來填補這一空白的非政府組織和宗教團體，但如果這本身即是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使命的一部分，情況會大為改觀。當然，能到委員會作證的不過是受害者中的代表，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得到了這樣的機會。最終，我們的建議還是要靠政府和公民社會通過賠償和復原計劃，來維護受害者的利益。

盡管委員會和大赦專門委員會通常合作得很好，有時也難免遇到問題。起草法案時，國民黨擔心委員會對舊制度存有偏見，因而任命一位法官擔任大赦專門委員會主席，并規定大赦決定不得再由委員會審議。因此，這個專門委員會享有特別的自主權，其決定只有法庭可以審議或推翻。在曼德拉聯合足球俱樂部和溫妮·曼德拉的聽證會期間，我們得知37位非國大領袖獲得大赦。他們申請大赦的動機可嘉—他們要表示他們對其干部的行為負集體責任。然而，在《促進民族團結與和解法》中沒有在未列舉具體罪行的情況下，給予集體大赦的規定，就連我們中間不是律師的人，都對專門委員會的決定頗感不妥。但我們被捆住了手腳。我們要提出反對意見，就只有將自己的專門委員會送上法庭。我們試圖通過談判和非國大達成一致，以避免冗長的官司。國民黨知道我們在這一過程中做出的努力，為了搶功，他們先告上了法庭。最后，我們和國民黨的申請同時在法庭審理，專門委員會的決定被推翻。國民黨毫無原則的行為，令我作嘔。他們明知事實并非如此，仍然把我們首先想到的行動鼓吹成自己的勝利。對委員會偏袒非國大的指責從未間斷過。我真高興自己沒有政治家那份腦筋。明擺著的原則性，有些人就是可以視而不見。

委員會的成功之一，是舊制度下的許多警察都來到委員會申請大赦，揭露過去的所作所為。我們掌握的大部分真相，都是從罪犯口中得到的。某些人批評說我們公布的真相，不過是在偏向受害者的聽證會上得到的不實指控和責難。而罪犯所提供的恰好是對這種批評的有力回擊。受害者聽證會上的證詞，遠不及大赦聽證會上揭露的暴行那樣令人震驚。像喬伊斯·穆提姆庫魯太太這樣的母親可以說她的兒子在監禁之后頭發脫落，身體變形，不得不依靠輪椅，后來人干脆消失得無影無蹤。她可能會猜測其中有安全部隊的參與。知道一切的警察部門可能成功地讓法庭阻止她在證詞中對他們指名道姓。但是，最終揭露殺害她兒子的兇手的人，不是她，而是那些申請大赦的兇手本身，那些為阻止她作證而故意當庭撒謊的人。誰也沒有承認在她兒子被關押期間曾經對他下毒—據醫生診斷，這正是造成他下肢殘疾和脫發的原因。但是，殺害他的人坦白并揭露了令人作嘔的事實細節—他們綁架了斯皮維·穆提姆庫魯，在咖啡中下毒，朝他頭部開槍殺害了他，然后焚毀了尸體。焚尸共持續了6小時之久，他們輪流加柴，翻動大腿，以便全部燒成灰燼。然后他們將骨灰撒進了附近的魚河（Fish River）。他們把這一切告訴了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在此之前，他們一直在穆提姆庫魯失蹤案的調查中串通作偽供，而且是在宣誓后這樣做的。高級警官執法違法，公然提供偽證。在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進程中，罪犯必須徹底披露真相方可換取大赦，而在法庭上他則通過撒謊維護自己的清白。

我們幸運地得到許多警官前來申請大赦，但非常悲哀的是軍隊，即往日的南非國防部隊（SADF），卻幾乎不與委員會合作。這在我們挖掘真相的工作中留下了一大空白。有些重要人物申請大赦，完全是因為與其聯合行動的警察提出了申請，逼不得已而為之。我們的傷口要徹底愈合，和解要徹底有效，就必須了解更多的真相。

總體戰略

南非國防部隊是博塔為對付共產主義的“全面進攻”而制定的“總體戰略”的一部分。南非處于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有效控制之下。該機構名義上隸屬內閣，但實際上統治國家的正是控制了政府思維的所謂“安全官僚”。進入80年代時，整個國家幾乎處于戰備狀態。我們經歷了人權狀況的進一步惡化。從那之后，如果質疑政府的決定，亦即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決定，就是不愛國。一切都成了當權者規定的國家安全的附屬品。南非白人覺得有個外部的壞世界要來侵犯他們，毀掉他們享有的“南非生活方式”。這個敵對世界想要推翻基督教政府，代之以不信上帝的、沒有民主的共產主義獨裁統治。種族隔離政府的宣傳機器不失時機地指出，我們北邊接受了社會主義制度的非洲國家都遭受了災難，實際上，它聲言這些國家之所以停頓不前，就是因為被不可靠的、不中用的黑人接管了。

當時，美國、蘇聯兩個超級大國正在進行冷戰。他們用盡各種伎倆，特別是利用在不同戰區的代理國，顯示威力，建立霸權。這一時期，任何政府只要聲稱自己反共，無論其人權記錄多么糟糕，都會得到美國的大力支持。因此，種族隔離政府大大得益于里根總統臭名昭著的“建設性接觸”政策。美國對反種族隔離的情緒只是開些空頭支票，他們聲稱與種族隔離當局這樣無法無天的政府保持關系，比孤立和排斥它，可以更好地施加影響，使其棄惡從善。

我曾徒勞地試圖說服里根總統和英國的撒切爾首相，通過經濟制裁，以和平方式帶來南非的變革。1984年我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后不久，在白宮會見了里根總統及其內閣，但仍沒有取得結果。我向他展示我的南非護照時，他感到有些吃驚，因為我不能得到正常的南非護照。真正讓他感到吃驚的，是護照上對我的國籍的記錄：“目前無法確定。”我和撒切爾夫人一起飲茶，在唐寧街10號一起度過了近一個小時。她光彩照人，我覺得她的確非常有魅力，與她不能容忍任何軟弱的鐵娘子形象形成鮮明對比。但是，我沒能說服她相信制裁的重要。正如她在講到另一件事時所說，本女士不是讓人耍的。幸而，兩國人民最終還是聽取了我們的呼吁，實行了一定程度的制裁，特別是美國的制裁。這大大加快了種族隔離制度的滅亡。但直到那時，這兩位西方主要領袖都堅決反對制裁。

里根政府資助了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游擊隊，顛覆桑地諾解放運動。他們支持菲律賓馬科斯總統的高壓政府，同時還在安哥拉的內戰中，支持若納斯·薩文比的爭取安哥拉徹底獨立全國聯盟，反對當時親馬克思主義的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南非緊隨其后，支持安盟，因為南非也在打擊納米比亞的解放運動西南非洲人民組織，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為西南非洲人民組織在安哥拉提供了基地。

南非實行了所謂熱線追蹤，軍隊襲擊了設在所謂前線國家的所謂恐怖主義基地和營地，前線國家包括博茨瓦納、萊索托、斯威士蘭、莫桑比克、安哥拉、贊比亞、坦桑尼亞和津巴布韋。他們這樣做，嚴重違反了這些國家的領土完整，目的是要迫使他們停止給流亡者和南非的解放運動提供庇護所。為加強軍事打擊，南非還實行了顛覆政策，支持這些國家的反對派，培養走狗。它在莫桑比克支持阿豐索·德拉卡馬的全國抵抗運動，對執政的解放陣線黨進行殘酷的戰爭。全國抵抗運動對自己的莫桑比克同胞犯下了滔天罪行—他們實施割耳、削鼻、切嘴唇或是其他肢解刑罰；綁架整村的人，包括兒童、婦女，并經常奸淫婦女；強迫男童參軍等。莫桑比克和安哥拉被內戰搞得滿目瘡痍，南非的顛覆政策無疑在其中起了一定作用。

在1989年10月發布的題為《種族隔離恐怖主義》的報告[[3]](#_3_5)中，南非國防部隊從1980年到1988年進行的顛覆活動共造成：

· 150萬人死亡；

· 400萬難民；

· 600億美元的經濟損失；

· 10萬頭大象和犀牛死亡，象牙和牛角被用來“補償”南非為莫桑比克全國抵抗運動和安盟所提供的武器。

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仍在付出慘重代價，其大部分耕地無法耕種，因為地里仍然埋著地雷。1999年5月，若阿金·希薩諾總統在首都馬普托的一次會議上說，莫桑比克需要60年才能清除干凈剩余的200萬顆地雷。1993年以來，在耗資高達160萬美元后，有6萬顆地雷被宣布是安全的。南非國防部隊對這一災難、對安哥拉仍然戰火不停的內戰，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發現南非國防部隊對多起嚴重違反人權案負有責任。在1978年南非國防部隊進行的一次襲擊中，600個納米比亞人在安哥拉的卡辛格營地被殺。西南非洲人民組織稱卡辛格是個難民營，但南非國防部隊堅持說那是個軍營，因而理所當然可以成為軍事打擊目標。在我們的《報告》中，我們認為襲擊造成營地許多平民傷亡，是對人權的嚴重違反。

委員會本希望有更多的南非國防部隊的人出來作證，并得到更多的合作，以便揭開屠殺政策之謎及其導致的后果。我們了解的一點，是從80年代中期起，這一政策導致了南非決策的日益軍事化。

任何軍隊的目的，都是要殲滅敵人，掃除敵方軍備。它的存在是為了摧毀和消滅敵人。隨著80年代反種族隔離運動的加劇，軍隊的矛頭日益對內。于是，嫌疑犯和罪犯不再被抓起來，而是被消滅掉。這樣的事就發生在了南非學生大會的4個人身上，賓波·馬迪凱拉、恩辛克·馬塔巴尼和范亞娜·恩拉坡3個少年被殺，贊迪斯勒·姆斯受傷。1982年2月，安全警察引誘他們來到約翰內斯堡以西克魯格思道譜的一個廢棄礦井。申請大赦的警官包括威倫·斯庫恩、亞伯拉罕·格羅貝拉、揚·克埃茲和克里斯蒂安·羅利奇。他們告訴委員會，一個保安說學生們想得到武器并訓練，然后殺死準尉警官姆克斯。克埃茲認為，與其逮捕這些激進分子，不如殺了他們。現場布置得好像這些少年把自己炸成了碎片。大赦聽證會上，我們問申請人是否知道這些少年的年齡，他們是不是恐怖分子，警方是否還考慮了其他殺害方式。罪犯們由一個高級警官指揮，是一個準將下的命令。之所以作出這樣的決定，顯然是因為依法處理嫌疑犯非常困難：逮捕嫌疑犯，并在法庭上提供不可置疑的證據，證明其參與、策劃或計劃顛覆活動，談何容易。不，那樣做太費時間，與其逮捕不如殺了。

國家安全委員會在80年代的會議紀要中，充滿了“壓制”、“消滅”之類的字眼，而種族隔離政府的領導人卻想讓我們相信，這些其實沒什么大不了的，意思不過就是拘留或者禁止而已。執行命令的人卻幾乎始終將其理解為殺死、謀害或暗殺。

在我們的《報告》中，我們列舉了一些安全委員會文件和政治家在公開場合或議會演說中使用的詞匯（阿非利卡語的英語譯文引自《報告》）：

· “elimineer vyandelike leiers”（“消滅敵人領袖”）

· “neutraliseer”（“壓制”）

· “通過正式和非正式的治安手段壓制造成威脅的人”

· “毀滅恐怖分子”

· “fisiese vernietiging—mense, fasiliteite, fondse, ens.”（“形體上  
的毀滅—人，設施、基金，等等”）

· “uithaal”（“拔掉”）

· “uitwis”（“掃除”）

· “verwyder”（“除掉/讓……失蹤”）

· “maak’n plan”（“制訂計劃”）

· “metodes ander as aanhouding”（“除拘留以外的其他方式”）

· “onkonvensionele metodes”（“非常規方式”）

在公開場合，種族隔離政府使用的就是下述這類語言：

安全部隊將狠狠打擊他們［非國大］，在哪里發現就在哪里打擊。我說的話就是政府的政策。我們不會坐等他們跨過我們的邊界。我們將不斷地偵察。我們將確定目標，把這些恐怖分子、他們的同道和幫兇碾碎。[[4]](#_4_5)

警察和士兵就是以此為依據理解接到的命令的。某些政界、軍界和警方的領導人面對自己的尷尬處境時，承認有些詞句的確“含糊其辭”，但又申辯說他們沒有讓其下屬去違法。任何人都會忍不住反駁：“好了，住口吧！”如果他們只想授權監禁、逮捕、禁令或驅逐，那為什么不發出明確無誤的命令呢？

約翰·范·德梅爾維將軍曾是德克勒克手下的警察頭目、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和安全警察司令。他因一系列謀殺案申請大赦。他的話更直截了當一些。我們的《報告》中引述了他在武裝部隊聽證會上陳述的證據：

所有［交給安全部隊的］授權，都是為了防止非國大/  
南非共產黨達到其革命目標，而且我們常常需要在前政府的同意下越出法律的界線。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南非警察，特別是安全部隊的行為中有違法的成分。

而且：

如果你跟一個士兵說“消滅敵人”，視情況而定，他很可能理解為殺死。話可能不止一個意思，但具體來說也只有一個意思。

在他作證時，委員會曾給他施加壓力：

委員會：我問你，你同不同意使用諸如“vernietig”、“uitroei”、“uit te wis”、“elimineer”［“毀掉”、“鏟除”、“掃除”、“消滅”］等字眼，會導致死亡？你同不同意呢？

德梅爾維將軍：是的，主席先生。

我們越是逼近那些執行命令的人，得到的答案就越直接。警察安全部門負責情報的頭目阿爾夫·烏斯圖贊告訴我們：

“拔掉”、“消滅”這些詞從來都是明白無誤的，意思就是這個人必須殺掉。

有些前內閣成員向我們提出，對下令進行謀殺和破壞負有責任的，應該是博塔周圍的一小撮人。但是，在1990年德克勒克先生開始談判后首先為種族隔離表示道歉的國民黨高級官員雷昂·維塞爾斯先生，則認為這不能成為借口：“我進一步認為，我不能利用‘我們原來不知道’這樣的政治辯解，因為我相信在很多方面我們是不想知道。”

這些陳述表明，要想堅持說種族隔離政府從未準許暗殺反對派這一立場，是幾乎站不住腳的。我們在《報告》中也指出，有證據顯示，自1978年博塔首先作為總理然后作為總統掌權后，國家就開始使用非法手段對付反對派。這種罪惡行徑從他又延續到其繼任者德克勒克。國家開始犯罪，因而很難再被認為是合法政權。據前內閣部長弗洛克先生說，是博塔下令在1988年8月炸毀南非教會理事會總部科特索大廈的。

委員會認為，國家安全委員會未預見到采用日益軍事化的戰略可能造成的后果，非常令人遺憾。我們發現，他們根本沒有采取任何措施區分參與軍事行動的人和以和平方式反對種族隔離的人。“恐怖分子”一詞使用范圍甚廣，沒有確切的定義。所有反對派都被視為理應消滅的對象。

我們發現安全委員會的文件是“裝聾作啞、推諉責任”的極好范例—政治家們故意將其指令巧妙措辭，使他們這些安全部隊暴行背后的始作俑者，可以將責任推到下屬身上。

說出道歉

1996年末的大赦聽證會上，有證據揭露出是博塔親自下令炸毀科特索大廈的。我們的副主席埃里克斯·伯萊恩，盡管被誣蔑為反阿非利卡和對國民黨有失公正，卻建議我到開普南海岸的喬治城，拜訪退休在家的前總統。

這些年我曾幾次與博塔先生見面。第一次是在1980年，我作為南非教會理事會的秘書長率教會領袖代表團，到比勒陀利亞的聯邦大廈與他及其內閣見面。同事中有些人批評我們和非法政權的頭目打交道。但是，我認為摩西盡管知道法老鐵石心腸，卻還是接近他。當時和解并不吃香，但我堅定地投身其中，和現在毫無二致。會見中，我向博塔先生提出了幾條建議，如果當時被他采納，就會為我國的和平談判打下基礎。會談氣氛親切，但我們力圖開始對話的努力終告失敗，因為我們一口回絕了他讓我們到納米比亞―安哥拉邊境的南非國防部隊“作戰區”進行宣傳的要求。后來我們得知，在他會見我們的時候，其政府卻試圖從背后顛覆我們。他們利用政府秘密資金，支持南非基督教聯盟這一右翼私人機構，反對南非教會理事會。

1986年我和南非教會理事會的同仁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我當選開普敦主教。我再次試圖說服博塔先生，希望能夠奇跡般地說服他改變立場，為和平解決創造機會。這一次是單獨會見，氣氛依舊親切，但我沒有得到任何妥協。盡管會見后他在記者面前和我熱情地握手，但照片中的我臉上卻帶著不自在的表情。

和博塔先生的第三次也是最艱難的會面是在1988年。我請求他免去6個人的死刑，他們被控在1960年曾發生過大屠殺的沙佩維爾殺死了一個被懷疑為政府奸細的人。會見的前半部分是友好的，我們兩人冷靜地討論了他是否應該動用總統特權。法庭在那個星期內停止了處決，并給這幾個人減了刑。接著，他掉轉話題，開始指責我和其他教會領袖為反對對幾個政治組織進行的限制而領導的到議會的非法游行。他遞給我一封有關此事的信，而信的內容已經提供給議會成員和媒體。我對此提出了抗議。然后，他又攻擊說我在一個葬禮上舉著共產黨的旗子，我讓他拿出證據，因為我知道他說的不是實情。我坐在他開普敦的辦公室里，暗自思忖著我是洗耳恭聽呢還是據理力爭。他可是一個能把自己的內閣部長都逼哭的人。我心想：這些家伙讓我們的人民受苦，如果非破釜沉舟不可，那就這樣吧。他不能這樣威嚇我。我對他說我不是小孩子，他沒有權利對我這樣說話。我是他的客人，他應該以禮相待。可惜我們最后竟真的像孩子一樣相互指責。會見結束時，我說我對他的話持嚴重的保留態度，他則還嘴說：“那就帶著你的保留，走吧！”我走了出去，會見不歡而散。不久，教會開展了我們稱為“堅持真理運動”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那年晚些時候，科特索大廈遭炸彈爆炸。

1988年后，博塔先生患中風，被德克勒克領導的內閣成員趕下臺，一直退休在家。年屆八十的他現在已完全退出公共生活。他最后一次在新聞中露面是曼德拉總統拜訪他的時候。他當時告訴記者，自己不愿與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有任何瓜葛。

伯萊恩博士建議我看望博塔先生，是為鼓勵他與我們合作再做一次努力，因為他主政南非時，正值種族隔離壓迫最深、“總體戰略”達到巔峰的時期。他還曾多次主持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會議。我本沒有必要去看博塔先生，委員會可以向任何人發出傳票，并有權搜查和沒收。但我還是同意前往，希望以此告訴阿非利卡人我們并非一心想侮辱他們，也不是要把他們追殺到底。我飛到喬治城，在他女兒的家里和他親切見面。他的女兒是個殷勤的主人，為我們端上茶水和阿非利卡點心，整個氣氛與我們會面涉及的可怕問題大相徑庭。博塔先生在向我遞上一份書面材料后，同意與委員會合作，書面回答我們向他提出的問題。他指出需要經驗豐富的律師協助工作，并需要查閱政府文件。他問我是否可以利用我對曼德拉總統的影響力，為龐大的律師費用和使用必要的政府文件取得資金支持。

回到開普敦，我立刻就這兩個問題去見曼德拉總統，并立即得到他的同意。我們想方設法遷就博塔先生，一再延遲他遞交材料的最后期限。在此期間，他的夫人去世了。我認為，向博塔先生及其支持者表明我與他并無個人恩怨，極其重要。于是，我再次飛到喬治城，參加了他夫人的葬禮。我知道許多黑人對我這樣做輕則覺得奇怪，重則感到氣憤。的確，事后一個黑人記者找到我，讓我務必向聽眾解釋我為什么在場。

博塔先生花了將近10個月的時間才回答完我們提出的問題。與此同時，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會議記錄中不斷揭示出新內容，于是我們決定請包括博塔先生在內的一系列前軍政要人舉行聽證會。書面答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接受，但這不同于面對面的問答，一個回答可能引出更多的問題。我們被告知博塔先生身體欠佳，于是同意推遲他的出席。我們甚至建議在喬治城舉行聽證，以免他飛往開普敦旅途勞頓（盡管他與一位較為年輕的女士訂了婚，飛去看她的行程不亞于飛往開普敦）。這對委員會來講，不僅費用更高，而且更不方便，因為我們不得不把翻譯設備帶到喬治城。委員會和他的律師進行了冗長的談判后，他宣布委員會是場“鬧劇”，拒絕出席聽證。我們發出了傳票，但他應該到場的那天，他卻派律師帶著書面答復來了。

西開普的首席檢察官決定以拒絕傳票罪傳訊博塔先生。即便如此，我們也沒有放棄努力。他的案子在喬治城的地方法院開庭后，我們繼續談判，希望達成妥協，爭取他到委員會作證。我們提出在附近的飯店進行聽證，并可事先將問題提供給他。我們還說他的醫生可以在場，必要時我們可以暫停聽證，等他身體狀況恢復為止。這樣的聽證用不了一天就能完成。我們的律師和博塔先生的律師之間進行了好一番討價還價。我們已經盡量遷就，但最后他還是拒絕了我們的建議，于是法庭審理繼續進行。只有邪惡之徒才會說我們是在糾纏一個疾病纏身的老人。許多黑人認為我們過分遷就，實行雙重標準，對曼德拉夫人是一個樣，對許多人認為給他們造成巨大創傷和痛苦的人卻百般呵護。

過去，博塔先生以他的冷酷和暴躁而暢行無阻。誰也不想和他針鋒相對。他以為這些規則仍然適用，但時代已經變了。他可以在關起門來的情況下，在舒適的飯店里接受調查，回答事先已經得到的問題。他選擇了繼續做個頑固不化的老頭，但卻因此大吃一驚。他不能凌駕于法律之上。他做夢都沒想到的事發生了。他這個曾讓內閣部長們膽寒的前國家總統，被送上被告席，接受一個黑人法官的審判。這在道義上也說得過去。公訴方傳了幾個證人，其中包括警察死亡小組總部的前頭目德考克上校。德考克毫不掩飾他對政治領袖的蔑視：“我自己和安全部隊的其他人……被膽小的政治家特別是國民黨里的人出賣了。”他對法庭說，“他們想得到羊羔，但卻不想看到流血和屠殺；他們是膽小鬼。”所有這些都被媒體大加報道。

人們擔心，博塔先生可能成為右翼分子騷亂和暴力的焦點，但這種情況沒有發生。參加庭審的只有他的一些家人。審判加上延遲，共持續了兩周時間。如果他接受我們的建議，問題一天就能解決。

我也被傳出庭作證，因為他稱我曾向他保證不會讓他到委員會作證。在他的律師對我進行了兩天交叉訊問后，我覺得走下證人席之前，我必須最后一次向他呼吁。我向法庭請求：

閣下，我可不可以就說一件事？我認為我們還有機會—盡管這是法庭，而且我也不想表示被告有罪。我在此代表由于各屆政府—包括他曾領導的政府—所執行的政策而遭受巨大痛苦的人們。我想向他呼吁。我呼吁他利用法庭提供的機會，說他自己本不想造成人們的痛苦，本不會下令或授權……我只是說他所領導的政府給人們造成了極大的痛苦，引起了極大的憤怒。我們的人民希望成為這個國家與和解的一部分。希望博塔先生能夠說出“對不起，本政府的政策給你們帶來了痛苦”，就說這些。他能不能讓自己說出“我很抱歉，本政府的政策給你們帶來了巨大痛苦”呢？這樣做意義重大，我呼吁你這樣做。謝謝。

博塔先生對我的呼吁卻只是大發雷霆。他被指控有罪，法官判他緩期監禁和罰款，但由于小小的技術問題，監禁被取消了。（我們過于遷就他，發出傳票的時間過遲。發傳票的那天，我們的授權到期，而曼德拉總統還沒有簽署新的授權。）政治上、道義上，他都付出了代價，他不得不面對其政策的受害者和執行者，政治上遭到孤立。法庭上，他是那么可悲，我都替他感到遺憾。他的頑固正是一些人希望看到的—舊制度的領導人得到了應得的報應，但這違背了委員會的意愿。

對德克勒克先生于1990年2月2日在議會宣布的富有勇氣并具劃時代意義的決定，我已經進行過熱烈的贊揚。任何事情都無法抹殺這一重要里程碑。我們本來很可能卷入流血沖突的。如果當時他能夠毫無保留地為種族隔離表示歉意，就的確達到了偉大的層次，會作為杰出的政治家記錄在南非的史冊上。令人悲哀的是，在1990年至l993年的新憲法談判中，他可能被在1992年只有白人參加的大選中贏得的對其政策的支持沖昏了頭腦，認為可以通過削弱其主要談判對手曼德拉而繼續掌權。當時，曼德拉已越來越成為他的強勁對手；所謂“黑對黑”的暴力在升級，并發生了多次屠殺事件。他可以聲稱安全部隊并沒有煽動暴力，即便煽動了也是個別“壞蛋”的責任，是個別現象。對此我恐怕難以相信。我無法相信，80年代至少有一個內閣部長和兩個警察局局長參與的人權暴力事件不過是個別人物的失常之舉。

我對德克勒克先生并無敵意。在宣布1993年和平獎得主前夕，挪威諾貝爾委員會打電話給我，征求我對給德克勒克先生和曼德拉先生共同頒獎的意見。我對此表示熱烈支持。如果我表示反對意見，委員會應該會重新考慮其意圖，否則咨詢我的意見就毫無意義了。如果我當時知道現在了解的一切，我一定會堅決反對。實際上，1996年到委員會作證時，德克勒克先生為種族隔離表示了深深的歉意，但又擺出種種借口，使其歉意失去了意義。如果他能像其前內閣同事、外交部長“皮克”·博塔或雷昂·維塞爾斯那樣真誠而坦率地道歉，該是一個多么偉大的人啊。他無法看清種族隔離丑惡的本來面目。他是個出色的律師，字斟句酌地護衛著自己的立場，但這只能削弱他的形象，使他成了一個沒有寬廣胸懷的矮小之人。我希望他能夠意識到，他在1998年宣布的成立和解機構的想法，只能給他所執行的政策的受害者傷口上撒鹽。

但是為了上帝的慈悲……

在委員會的機構聽證中，可以感到對人們產生影響的各種力量的強大。那么多的白人能夠過著正常的生活，享受自由和特權，我們對此不應感到震驚。讓我們吃驚的，不是許多白人最終接受了沿襲已久的種族主義價值觀和態度，并沒有真正思考過種族主義政策對其同胞的影響。真正令人驚嘆的，是那些—我始終認為是為數眾多的—沒有屈從于滲透到生活中每一個方面的邪惡風氣的人們。這些不平凡的人們不僅抵制住了種族主義主流文化的誘惑，而且希望結束這一制度。如果考慮到種族隔離一方集結的各種強大力量，那么善于塑造白人的態度、思維方式和世界觀，他們能做到這些就更不一般。我們看到過種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實際控制了每一個機構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一切都在教白人以特定的方式思維和行動。我們甚至可以說，他們被程序化了。

70年代初我第一次去尼日利亞時，感到自己也被程序化了。駕駛我乘坐的飛機的，是尼日利亞飛行員。南非沒有黑人做這個工作，因此我為黑人的成就倍感自豪。飛機順利起飛，但接著就遇到了氣流干擾。我們一會兒飛行在這個高度，一會兒又跌落下去。飛機顛簸著向下掉。我被自己的發現所震驚了，我發現我在暗自對自己說：“我真希望駕駛艙里有個白人。這些黑人能讓我們順利過關嗎？”這完全是無意識和自發的。我根本無法相信我也被這么徹底地洗了腦。我會矢口否認，因為我為自己呼吁黑人的覺醒而頗感自豪，但在危機中，更深層的東西顯現了出來：我接受了白人的定義，認為白人比黑人更優越、更稱職。當然，這些黑人飛行員讓飛機順利地著了陸。

我們不能低估條件反射的力量。這也是為什么我認為對違反人權的罪犯，我們應該多一點寬容和理解。這并不意味著我們要縱容他們及南非白人實施或允許實施的行為。但如果我們更多地意識到我們和他們一樣容易受到影響的話，我們的判決或許會多些愛心。這可以使我們的判決少一點武斷和魯莽，為一些人敞開大門，讓他們寬容自己的軟弱和怯懦。這或許可以讓他們更情愿承認自己的脆弱，因而更容易承擔責任。這也可能讓我們在判決的時候對自己說：“為了上帝的慈悲，讓我前行。”

換言之，希望是有的。之所以有希望，是因為罪犯—以及得益于種族隔離的人—被認識到他們也是人，就算并不堅定，但只要走出自我開脫或拒不認錯的模式，說一聲“對不起，請寬恕我”，就可以棄惡從善。

經歷了委員會的艱苦工作后，我深深地感到—真的是一個異常振奮的認識：盡管邪惡遍地，我們人類還是有向善的非凡能力。我們可以非常善良。正是這一點讓我即使在最艱難的情況下，也滿懷希望。

[[1]](#_1_16) 《人類發展報告》，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年。

[[2]](#_2_4) 指質量優劣兼備，源出1895年Punch雜志所載一位膽小的助理牧師與主教共餐時分得一只壞蛋，卻說此蛋也有部分是極好的。—譯注

[[3]](#_3_4) 《種族隔離恐怖主義：顛覆報告》（Apartheid Terrorism：The Destabilisation Report），菲利斯·約翰森和大衛·馬丁合著，英聯邦秘書處、詹姆斯·卡利出版社及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聯合出版。

[[4]](#_4_4) 國防部長馬蘭將軍1986年2月4日在議會上的講話。

# 第十一章 沒有寬恕，真的沒有未來

1994年盧旺達發生種族屠殺，近50萬人喪生。一年后，我訪問了這塊滿目瘡痍的土地。我是作為全非教會大會主席前往的。在為期10年的兩屆任期中，我努力通過教事訪問，把全非大會帶到成員教會去，特別是那些經歷著這樣那樣危機的國家。我和大會的其他負責人訪問過內戰中的尼日利亞、利比里亞、安哥拉及其他國家。我們也去慶祝勝利，比如慶祝埃塞俄比亞以民主代替了壓迫和非正義。但我們通常是去處在苦難中的國家，對基督教徒表示聲援。大會的領導層去了盧旺達。

我們訪問了首都基加利附近的一個村子恩塔拉馬，圖西族人在這里的一個教堂被掃射槍殺。新政府沒有清理尸體，因此教堂就像個墓地，尸體仍保持著一年前屠殺時的樣子，惡臭撲鼻。教堂外堆著被兇殘殺害的人的頭骨，有的上面還扎著彎刀和匕首。我想祈禱，卻忍不住哭泣起來。

此情此景令人深感不安，它像一塊石碑，記錄著我們人類對自己的同胞可以達到何等的兇惡程度。這些兵戎相見的人們常常是曾住在同一個村莊、說同一種語言和睦相處的人。他們相互通婚，而且信奉同一種宗教，大部分是基督教徒。殖民主子希望通過偏向圖西族，打擊胡圖族，維持其歐洲人霸權，為最終釀成非洲當代史上最為血腥的屠殺播下了種子。（另一個部族叫特瓦族，人數少得多。）這場屠殺沒有把人類一切罪孽都歸咎于種族主義，因為盡管是白人煽動的種族內亂，真正的屠殺卻是黑人殺害黑人。

在離教堂幾公里的地方，一些婦女在修建住所，她們把它叫做曼德拉村。這將成為種族屠殺后一些寡婦和孤兒的家。我和開展這個項目的婦女運動領導人進行了交談。她們說：“我們必須悼念死者，為他們哭泣。但生活還得繼續，我們不能永遠哭泣。”多么令人贊嘆，多么不可摧折！在恩塔拉馬，我們可以說看到了死亡和十字架。在曼德拉村，則有復活、新生活、新開端和新的希望。婦女再一次表現出了她們的堅韌和滋養生活的本能。

我還參觀了擁擠的基加利監獄，里面塞滿被懷疑參與屠殺的人。他們幾乎都是胡圖族人，有婦女、男人甚至孩子，男女老幼、三教九流無所不包，其中還有教士、修女、教師和律師。有些人因窒息而死。我對巴斯德·比齊蒙古總統說，那個監獄隨時可能發生災難，它只能增加人們的痛苦記憶，加深胡圖族人對圖西族人的仇視。

訪問期間，我還參加了在基加利大體育場舉行的集會。人們在經歷了如此深重的創傷之后，還能這樣唱歌、跳舞、歡笑，真是令人驚嘆。包括總統在內的大部分政界人物都到會了。我應邀布道。我首先表達了非洲其他地區兄弟姐妹的哀思，因為人們都為這里的屠殺和破壞大為震驚。（現在看來，如果國際社會聽取了當時發出的各種警告，或許聯合國能夠調集足夠的資源進行干預，種族屠殺很可能不會發生。盧旺達人對聯合國頗為憤怒，受害者和幸存者都對這種情況帶來的災難性后果深感失望。）我說，盧旺達的歷史是典型的人上人和人下人的歷史。人上人緊緊抓住其既得特權不放，人下人則竭力要把他們推翻。得手后，新的人上人便開始反攻倒算，讓新的人下人為他們高高在上時造成的所有痛苦付出代價。新的人下人像憤怒的公牛一樣進行還擊，試圖推翻新的人上人，全然忘記了新的人上人認為自己是在為現在的人下人在位時所造成的痛苦而報仇雪恨。這是復仇與反復仇的悲慘歷史。我提醒圖西族人，他們等了30年才討還了他們認為強加在自己身上的不公正。我說，胡圖族人中的極端分子也完全可以等上30年甚至更長時間，推翻新政府，大肆反攻復仇。

我說有人在議論建立法庭，因為人們不愿看到罪犯逃脫懲罰。但是，我擔心如果他們真想得到的是一報還一報的正義，那么盧旺達已經嘗到了它的滋味。無論如何，大部分胡圖族人都無法相信法庭判定他們有罪是因為有確鑿的證據，也不會相信世界上任何法庭面對同樣的證據都會判定他們有罪。他們大部分人都會認為，他們被判有罪不是因為他們的確有罪，而是因為他們是胡圖族人。他們會等待報復的那一天。到時候，他們會讓圖西族人為惡劣的監獄條件付出代價。我告訴他們，必須打破貫穿其歷史的報復與反報復的怪圈。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放棄報復性的正義，實行復元性的正義，升華到寬恕，因為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

盧旺達總統對我的彌撒表示了極為寬容的態度。他說，他們愿意寬恕，但就連基督都說，魔鬼不可寬恕。我不知道他在何處為自己的話找到的根據，但他的一個觀點還是得到了一些共鳴，即有些惡行是不可寬恕的。我自己的觀點與此不同，但聽眾對我非常公平友好。后來，我對議會和政界領袖發表了講話，他們沒有因為我反復呼吁實行寬恕與和解、放棄相反的做法而把我轟下臺來。

為什么沒人反駁我？這些創傷深重的人們為什么會聽進這樣的逆耳之言呢？他們之所以聽我講，是因為南非發生的事值得他們三思。這難道不是解決沖突的一種可行方式嗎？過去刀兵相向的人不能努力和睦相處嗎？全世界都認為南非會被血洗，但這種情況沒有發生。接著，全世界又認為民主選舉的新政府上臺后，那些長期被剝奪了權利、人格尊嚴被無情地踏在腳下的人們，一定會反攻倒算，進行無情的報復，讓他們的祖國再次遭受蹂躪。但是相反，我們成立了無與倫比的委員會，人們講述其傷心欲絕的故事，受害者表達了寬恕的意愿，而罪犯在坦白了確鑿的惡行后也請求得到他們所傷害的人的寬恕。

整個世界無法相信自己的所見所聞。1999年4月，聯邦德國前總統里夏德·馮·魏茨澤克在聽說了我國的情況后，在柏林的一次研討會上說：“未來有了新的希望。”南非人非同尋常地實現了從深重的壓迫到相對平穩的民主的和平過渡。他們以自己處理既往的嶄新方式，讓世界耳目一新。可能一開始他們對自己能在重新回顧過去的可怕情景時表現得那樣鎮定也感到震驚。這一現象整個世界不能不重視。正是這一點，使我能夠在盧旺達的兄弟姐妹面前講在其他條件下可能被認為是無情和無理的一番話。

世界其他一些地方也在努力正視和理清其沖突與紛爭的歷史。我在訪問這些地方時，也有同樣的感受。1998年，我訪問了都柏林和貝爾法斯特。兩地的人們都非常欣喜地聽到，我們南非的經驗表明沒有任何情況是完全令人絕望的。大部分人都會說我們面對的問題無可救藥。我說：“我們的確經歷了一場可怕的噩夢，但噩夢結束了。”愛爾蘭人已經走上結束噩夢的路，不是已經有了《耶穌受難節協議書》（Good Friday Agreement）嗎？我說，他們不應該為實施這一關鍵協議道路上的障礙而灰心喪氣。我們的經驗是，常常哪里有突破，和平的敵人就會在哪里加倍進行破壞。我說，愛爾蘭人應該加倍努力，提高警惕，不要與結束其“麻煩”這樣一個近在眼前的珍貴禮物失之交臂。

我告訴他們，在南非，我們常常有坐過山車的感覺。有時我們為新的關鍵性倡議的出現而歡欣鼓舞，和平與正義似乎近在咫尺。當我們以為只剩最后的一圈時，可怕的事情就會發生—屠殺、僵局、局勢處于崩潰的邊緣、某個代表威脅退出等，我們會跌到絕望和喪氣的谷底。我告訴他們這是正常的。最終的報償是驚人的，他們不應該放棄建立新愛爾蘭的夢想。那時他們會驚訝地發現他們竟蒙昧了那么長時間，會意識到善良、和平與寬容是那么美好而且那么簡單，而他們卻浪費了多少時光和生命。我提醒他們，我們本來也覺得達到現在的地步不可思議。我們的夢魘結束了，他們的也必將很快結束，如同晝夜相隨一般。

他們聽了這番話，如同聽到圣賢的哲言。我的話之所以可信，是因為我們實現了相對和平的過渡，找到了處理遺留問題的新途徑。我敦促他們不要為在解除武裝問題上遇到的僵局而絕望，希望我的話對他們有所助益。在貝爾法斯特，那么多樂于奉獻的人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在被斗爭撕裂的社區不停地工作，在彼此疏離的受傷的人們之間搭建橋梁，擔當著和平與和解的非凡的代言人。我對他們說，任何事情都不是徒勞的，他們的努力即使失敗了，也沒有煙消云散。不，他們可能想不到，他們的工作已經滲入了周圍的環境。我們知道的確如此。別人無需告訴我們，我們就知道家是美好的，因為我們能感受家的共鳴，這是刻骨銘心的東西。我們知道何時教堂里散發著智慧、神圣的芳菲，知道何時這里回蕩著祈禱聲。我們幾乎能夠嗅到神圣的氣息，感受到前人的力量和虔誠。一個祈禱聲不斷的教堂與充滿音樂會堂氛圍的教堂，有著本質的區別。因此，我告訴那些為和平與和解努力的人們，不要為看不到進展而放棄他們至關重要的工作。根據我們的經驗，沒有什么是徒勞的，時機成熟，一切都會結合在一起。回首過去，人們會意識到自己作出了多么重要的貢獻。他們就是亙古存在的走向統一與和解的宇宙運動的一部分。

讓我們生活在友誼與和睦中，一直是上帝的意志。這正是伊甸園這個故事的要旨，那里沒有流血，甚至沒有出于供奉宗教的流血。雄獅和羔羊一起嬉戲，所有人都是素食者。后來上帝希望所有所造之物能夠享受的和諧被徹底動搖和打破，影響到所有上帝的造物。人類成了一群榆木腦袋，相互指責，兵戎相向。他們和造物主被離間。現在他們竭力躲避曾一起漫步伊甸園的上帝。所造之物現在張開了“血盆大口”，友誼被敵對代替。人類在被蛇咬到腳跟之前，會把它碾得粉碎。這個故事正是通過《圣經》極富想象力的詩一般的語言，講述了生存的真理。

那些不能升華到詩人境界的凡夫俗子，會對這樣富有想象力的敘述不屑一顧。然而，即使我們懷疑是否真的存在伊甸園那樣的神秘和諧，除非遲鈍，否則不會有人懷疑我們的確在親歷所有存在的根本破裂。時間脫了節，生活中充滿分歧、不和諧、沖突、動蕩、敵意和仇恨。我們的世紀是人類歷史上最為血腥的世紀。如果大自然沒有被糟蹋和濫用，就無須有生態保護運動。水土流失侵蝕了原本肥沃的良田，土地現在只能長出荊棘。河流、大氣被盲目地污染，我們為臭氧層損耗和溫室效應可能帶來的災難而憂心忡忡。我們在自己的世界里還不太自在，到處都彌漫著對失去的樂園的懷戀情緒。

信奉者說我們可以把人類的大部分歷史，形容為對和諧、友誼與和平的追求史，而我們人類似乎就是為此而生的。《圣經》把這一切描述為上帝領導的恢復原始和諧之戰，他希望雄獅再次與羔羊同眠，他們不再習武練兵，因為刀劍被鑄成了鏵犁，長矛被彎成了吊鉤。在我們的內心深處，我們知道我們可以成就更好的東西。我們不時可以看到我們本來應該具備的好的一面展現出來，例如自然災害發生時，我們會同心協力進行抗爭，整個世界都包融在巨大的同情和慷慨之中，一時間被我們關懷的人性、一種普遍的烏班圖精神綁在了一起。這好的一面還體現在得勝的國家制訂馬歇爾計劃，幫助過去的敵國進行重建的時候；體現在我們建立聯合國組織，讓全世界的人可以會聚一堂避免戰爭的時候；體現在我們簽署保護婦女兒童權利憲章的時候；體現在我們禁止殺傷性地雷的時候；體現在我們一致禁絕酷刑和種族主義的時候。在這樣的時候，我們就能體會到，我們被創造出來是為了共存，為了友誼、集體和家庭，我們原本應該生活在相互依存的微妙網絡中的。

在事物的核心，存在著一種不易察覺的運動，逆轉著離間、破裂、分歧、敵意和不和諧的可怕離心力。上帝啟動了向心的進程，開始了向著中心，向著同一、和諧、善良、和平與正義，能夠掃除一切障礙的運動過程。耶穌說：“我若從地上被舉起來，就要吸引萬人來歸我。”[[1]](#_1_19)他被釘在十字架上，雙臂伸展，仿佛要擁抱一切，將所有的人、所有的物都擁進他無所不包的懷抱，讓萬眾萬物都有所歸依。沒有局外人，一切都在內中，都相互歸屬。不存在什么外人，每個人都是一個家庭、上帝的家庭、人類的家庭的成員。沒有什么猶太人或是希臘人、男人或是女人、奴隸或是自由人—沒有分裂與隔離，所有的區別構成了一個統一體的豐富多樣性。我們有區別，因而我們才能懂得我們彼此需要，因為沒有一個人可以絕對自給自足。一個完全自給自足的人，不是一個完整的人。

上帝的意志是要把天上、人間的萬物，結合在基督的整體中，而我們每一個人都參與了這一偉大運動。因此古生物學家德日進[[2]](#_2_7)在其著作《神界》（Le Milieu Divin）中說：

我們有時不禁認為，在創造世界的歷史中，同樣的東西總是一再重復。這是因為相對我們每個短暫的生命而言，季節過于漫長；相對我們有限而膚淺的認識來說，變遷過于巨大和深刻，以致我們無法看到所有物質和精神的不懈進步。讓我們相信啟示，它又一次在我們凡人的不祥預兆中，忠實地支持著我們。在一切平凡的表象之下，在我們有功無功的忙碌之中，一個嶄新的地球正在形成。

一天，福音書告訴我們，人類和上帝之間的緊張關系，將達到這個世界規定的極限。……在萬物中悄悄增長的基督的存在，會突然顯現出來，如同兩極之間的閃電。它將打破所有遮蔽了各種物質的障礙和將它困住的滴水不漏的靈魂，侵入大地。上帝之子的引力如同閃電、猛火和洪水一樣，席卷宇宙萬物，將它們重新統一和歸屬于一身……正如福音書中警告我們的，揣測這一勢不可擋的事件何時以何種方式發生，是徒勞的。但是，我們必須做好準備……這可能就是至高的基督功能，也是我們宗教最顯著的特點……只有我們的熱烈企盼，才能使耶穌基督早日到來……我們基督徒作為以色列人的后人，肩負著讓希望之火在世界上永遠燃燒的責任。耶穌升天不過20個世紀，我們的期待取得了什么結果呢？

幼稚的急躁和認識上的失誤，使第一代基督徒認為基督很快就會歸來，結果令我們產生了失望和懷疑。我們對上帝的信仰由于世界對善行的抵制而被破壞。悲觀情緒使我們……認為這個世界邪惡得無可救藥。于是，我們讓火焰在沉寂的心中逐漸熄滅了……實際上，如果我們真誠的話，我們就必須承認，我們已經沒有任何企盼了。[[3]](#_3_7)

因此，我可以對貝爾法斯特的優秀人民說，什么都不是徒勞。他們的行為促進了和解。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延遲或促進、阻礙或推動處于宇宙中心的進程。基督徒會說結果是毫無疑問的。耶穌基督的死和復活使這一點無可置疑，即善良、歡笑、和平、同情、溫存、寬容與和解，將取得最后的勝利。對種族隔離的勝利，就是這個烏托邦式夢想的有力證明。

愿這樣的時刻早日到來，男人（和女人）被喚醒，覺悟到在包容一切的創造上帝之子的作業中，世界的一切運動緊密相連。當他們投身于自己的任何一項任務中時，都將清楚地表明，他們的工作無論如何微不足道，都將被宇宙的中心接受并妥善利用。[[4]](#_4_7)

1989年圣誕節，我訪問了圣地，并有幸參觀了耶路撒冷的亞德瓦謝姆大屠殺博物館。當媒體問及我的感受時，我說令人心碎。我說我侍奉的上帝自己也是猶太人，他會問：“但是，寬容哪里去了？”這句話如同水濺進了油鍋。我遭到一致譴責。我也對巴勒斯坦人受到的待遇表示了不滿，我認為這種狀況與猶太先知的教導以及我們基督徒追隨的猶太拉比的要求，相去甚遠。我被指責為反猶太主義，在我下榻處附近的耶路撒冷圣喬治圣公會大教堂墻上出現了亂涂的標語，上面寫著：“圖圖是黑皮膚的納粹豬。”

因此，1999年1月舊地重游時我有些忐忑不安。我將訪問西岸，在一個圣公會教堂布道，并參加佩雷斯和平中心的會議，我是中心的理事會成員。但我的擔心是多余的。耶路撒冷的會議組織者不得不謝絕人們的到來。我們所到之處，都顯示出南非發生的一切使這里的人們著了迷。前總理、外交部長和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西蒙·佩雷斯稱贊我們的和解進程為歷史上絕無僅有。

在擠得水泄不通的耶路撒冷會議上，以色列人對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進程及寬恕與和解的概念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我指出，我們在南非認識到，槍桿子打不出真正的安全。只有當為眾人敬仰的中東的所有居民都認為其人權和尊嚴得到尊重與維護，真正實現了正義的時候，真正的安全才會到來。我沒有改變自己的觀點：我仍然認為有寬容的必要，必須既保證以色列國的安全，也保證對巴勒斯坦人的正義和公平。在以色列，人們已經對我另眼相看。

顯然，在諸如盧旺達、愛爾蘭、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這樣的國家和地區，南非所經歷的進程，證明了他們的國土上所缺乏的東西的價值。人們聽到了逆耳的話，但不會指責我無情無理。更重要的是，似乎聽到我的話的人，都從南非的經驗中看到了希望。我們幸運地得到了敢于冒險的領袖人物的祝福—當請求得到或給予寬恕時，就是在冒險。

如果你請求得到一個人的寬恕，你可能遭到回絕；你曾傷害的人可能拒絕原諒你。如果你是受傷害的一方，希望給予寬恕，那么冒的險就更大。罪犯可能傲慢而冷酷或毫不覺悟，不會或不愿道歉或請求寬恕。因而他或她無法接受別人給予的寬恕。這種拒絕可能破壞整個過程。我們南非的領導人可以說他們甘冒一切危險，走完坦白、寬恕與和解的路。他們似乎賭贏了，因為我們的國土沒有遭受似乎不可避免的災難。

關鍵是，當某種關系受到損害或可能崩潰時，罪犯應該承認真相，準備并愿意道歉。這大大有助于寬恕與和解的進程。這并非易事。我們都知道承認錯誤對我們大部分人來說是多么艱難的事情。這也許是世界上最難的事—在幾乎每一種語言中，最難啟齒的都是“我很抱歉”。因而，那些被指責犯下滔天罪行的人以及他們為之服務的群體，總是找出各種借口為自己開脫，甚至不承認自己能干出種種暴行，這也沒什么奇怪的。他們采取否認策略，聲言某某事根本沒發生過。當證據確鑿時，他們便裝傻充愣。德國人說他們根本不知道納粹想干些什么。南非白人也用了同樣的遁詞。前種族隔離政府內閣部長雷昂·維塞爾斯的話更近情理，他說盡管有人提醒過我們，但我們不想知道。長著眼睛的人都可以看到關于犯人在獄中神秘死亡的報道。長著耳朵的人也會經常聽聞令人不安甚至膽寒的事情。但是，他們對邪惡卻選擇了不看、不聽、不說。即使坦白的人也會推諉罪責—“我們不過是執行命令”，拒絕以負有道義責任的個體來承認罪責。但每個人都必須為執行有昧良心的命令而承擔責任。

沒有人愿意暴露自己脆弱或罪惡的一面。但是，如果要進行寬恕與復原的進程并取得成功，罪犯的認罪是必不可少的。承認真相，承認錯待了他人，是觸及犯罪根源的重要條件。如果夫妻吵架，過失的一方不坦白承認錯誤，弄清分歧的根源，丈夫照舊獻花，兩人裝作一切正常，那么他們很可能埋下大禍。他們沒有充分解決既往的問題，掩飾分歧，不能直面真相，唯恐發生傷人的沖突。他們的行為正是先知耶利米所說的稍事療傷后便大叫“平安了！平安了！”[[5]](#_5_5)。他們只是掩蓋了裂痕，卻沒有搞清為什么出現了裂痕。結果只能是，盡管鮮花依舊，傷害卻在滋長。終有一天危機會爆發，他們會意識到他們取得的和解是多么草率。真正的和解不能草率。上帝為此付出的代價是他唯一的兒子的生命。

寬恕與和解不是假裝事情并非其本來面目，不是相互拍肩搭背，對錯誤視而不見。真正的和解會揭示出惡行、欺侮、痛苦、墮落和真相。有時它甚至讓情況惡化。真正的和解是冒險，但終究是值得的，因為處理真相最終會真正撫平創傷。虛假的和解只能帶來虛假的復原。

如果犯錯的人認識到其錯誤，那么他應該感到悔恨，或至少為其錯誤感到后悔或歉疚。這應促使他坦白錯誤，請求寬恕。這當然需要相當的謙卑，特別是當受害者被罪犯自身的群體所蔑視的時候。南非的情況就經常如此，罪犯往往是政府的特工。

我們希望，受害者能為罪犯的道歉所感動，對罪犯給予寬恕。如前所述，我們在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常常對受害者表現出的寬宏大量贊嘆不已。當然有人不愿意寬恕。我認為，這充分表明寬恕不是理所應當的，寬恕既不能草率也不易獲得。這就是可能出現的情況，而我們遇到的大多數情況都是那么感人至深，令人自愧不如。

在寬恕時，我們沒有要求人們忘卻。相反，銘記過去是重要的，只有這樣才能避免暴行的重演。寬恕不等于縱容已犯下的錯誤，而是意味著認真對待既往，拔除威脅我們生存的毒刺，而不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寬恕要求我們理解罪犯，設身處地體諒迫使他們犯罪的種種壓力和影響。

寬恕不是多愁善感。對寬恕的研究日益興旺。過去它被輕蔑地歸為精神和宗教概念，而今由于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出現，寬恕越來越作為一門學科，成為心理學家、哲學家、醫生和神學家的研究對象。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附設了國際寬恕研究所；約翰·鄧普頓基金會與其他機構聯合開展了耗資數百萬美元的寬恕運動研究。據研究，寬恕還有益健康。

寬恕意味著受害者放棄向罪犯討還血債的權利，但這同時也解放了受害者。在委員會，我們聽到人們說寬恕后感到輕松了。最近一期的《精神狀態與健康》（Spirituality and Health）雜志在封面上刊載了三位美國前軍人站在華盛頓越戰紀念碑前的照片。其中一個問：“你是否已經原諒把你當戰犯關押的人了？”另一個人說：“我永遠不會原諒。”他的伙伴說：“那么他們似乎還在關押著你，是不是？”

罪犯的悔過和坦白是不是受害者寬恕的先決條件呢？毫無疑問，這樣的坦白有助于那些想要寬恕的人，但這并非必不可少的條件。基督并沒有等待那些將他釘在十字架上的人請求寬恕。但他們將釘子錘進他的身體時，他已經在請求上帝寬恕他們，甚至找借口為他們開脫。如果受害者只有在罪犯坦白后方肯寬恕，那么無論他愿意與否，他都會受制于罪犯，鉆進受害者身份的枷鎖。這顯然是不公平的。

我曾用下述比喻闡述罪犯坦白的必要性。想象一下你被關在一個潮濕、憋悶而黑暗的房間里，窗戶、窗簾緊閉，外面陽光燦爛，清風拂面。如果你想讓陽光和新鮮空氣進入，就必須打開窗戶和窗簾，這樣原本就有的陽光將照亮你的房間，清新的空氣將掃除周圍的潮悶。寬恕也是一樣。受害者可能愿意寬恕，送出這份厚禮，能不能接受禮物取決于罪犯—取決于他能不能打開窗戶和窗簾。他承認自己的錯誤，就可以開啟窗戶和窗簾，讓寬恕的陽光和空氣進入他自己。

實際上，寬恕的行為等于我們宣布：我們對未來的關系充滿信心，對犯錯誤的人改過自新、不再重蹈覆轍，充滿信心。我們說，現在有了重新開始的機會。這個行為表示的是對罪犯可以改變的信心。據基督說，我們應該準備不止一次甚至七次這樣做，要七十個七次[[6]](#_6_5)—無止境地去做，只要你的兄弟姐妹愿意為他們的錯誤一次次向你坦白。

這是一個挑戰，但人無完人，我們總是會因為自己的錯誤傷害他人，特別是我們所愛的人。因此，我們永遠需要一個寬恕與和解的過程，來處理令人遺憾但又是不可避免的關系問題。這是人類生存無法逃避的特征。

罪犯坦白和受害者寬恕，并不意味著整個進程的結束。罪行常常給受害者造成了有形的、物質上的傷害。種族隔離為白人提供了巨大的特權和利益，而其受害者則備受壓迫和剝削。如果有人偷了我的鋼筆，然后請求我寬恕他，那么他必須退還我的筆，否則其悔過和坦白等于零。只要條件允許，坦白、寬恕和賠償應該是一個整體的組成部分。

在南非，和解過程受到巨大貧富差距的嚴重阻礙，富人大部分是白人，而窮人則大多為黑人。種族主義和種族隔離造成的貧富鴻溝，給和解與國家的穩定造成了最為嚴重的威脅。罪犯和種族隔離的受益者大多屬于富人，而大部分受害者則來自窮人階層。這就是為什么我敦促白人要保證黑人境況的改善，因為如果不能用住房替代黑人居住的棚窩，如果黑人不能夠得到白人早已享受的潔凈水、電力、廉價的醫療、像樣的教育、良好的工作和安全的環境，我們就可以同和解告別了。

和解可能是個曠日持久的過程，其中不乏崎嶇坎坷，不是一朝一夕或靠一個委員會—無論效率多么高—就能完成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只是作出了貢獻。和解必須是每個南非人的事。它必須是整個民族的事業，每個人都應努力做出自己的貢獻—學習他人的語言和文化；準備和樂于補救過去的錯誤；拒絕成見，拒絕用種族或其他笑話譏諷某一群體；促進尊重人權的文化，加強寬容，對不寬容毫不寬容；建設更具包容性的社會，使大部分人甚至每個人都有歸屬感，感到自己是局內人，不是被擠到社會邊緣的局外人或陌路人。

為和解而努力，就是要實現上帝為人類提供的夢想，即讓我們都懂得我們同屬一個大家庭，同在一個相互依存的微妙網絡中。

西蒙·魏森達爾在題為《向日葵》的文集中，講述了他如何無法寬恕一個請求寬恕的納粹士兵。這個士兵和一群人包圍了幾個猶太人，把他們關進樓里，然后縱火燒死了里面的人。現在，那個士兵行將就木，他希望供出同謀，得到一個猶太人的寬恕，以此解除良心上的不安。西蒙默默地聽完了他講述的可怕經歷。士兵講完后，西蒙一聲不吭地走了出去，當然也沒有一句寬恕的話。文章結束時，他問：“你會怎么做？”

《向日葵》匯集了不同的人對其問題的回答。新增的一版[[7]](#_7_3)中包括了我的文章。魏森達爾面對的困境是非常現實的。他的觀點也是許多猶太人的觀點，即生者沒有權利代表被殺害、被折磨而現在無法為自己決策的死者表示寬恕。他們的不情愿可以理解。如果他們寬恕了，似乎他們認為受害者的遭遇不足掛齒；而且代表那些深受苦難的人們講話，特別是當你沒有遭受過同樣深重的苦難的時候，就顯得過于臆斷了。

1990年底，南非各教會齊聚勒斯滕堡，召開我國宗教界人數最多、代表性最強的會議。本次會議被稱為勒斯滕堡大會。與會的既有強烈反對種族隔離的南非教會理事會會員，也有以其神學理論支持種族隔離（現在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放棄這一立場）的主要白人教會—荷蘭新教教會。當然還有那些為數眾多的信奉圣靈降臨的教會。他們試圖不問政治，但他們肯定意識到了自己臆想的中立實際上支持了不公正的現狀。此外，還有海外教會合作伙伴的代表以及持不同政治立場的所謂非洲獨立教會的代表。

會議開始不久，荷蘭新教教會的著名神學家威利·揚克爾就代表阿非利卡人，特別是荷蘭新教教會的教民，請求黑人基督徒的寬恕。我們不清楚他是不是該教派的指定發言人，但后來其代表團表示支持他的講話，因此可以把他視為其教派的代表。我們完全可以問他是否也代表了前幾代教民。如果不認為過去和現在緊密相連，教派先一輩的教民既應共擔罪責和恥辱，也應共享寬恕和榮耀的話，這個教派就顯得異常怪異了。教會是一個有機體，否則歷史便毫無意義，我們只關注同時代的人足矣，然而顯然這不是人類的行為方式。我們褒揚先人的成就，盡管他們屬于遙遠的過去，我們仍為他們感到自豪。他們的影響力與當初取得成就之時相比毫不遜色，甚至可能增強了。失敗和恥辱也是同樣的道理。無論我們情愿與否，這些都是我們之所以為我們的一部分。我們講話的時候，深知包圍著我們的是眾多的見證人。任何人都不會懷疑，揚克爾教授的懺悔如果沒有遭到他所應代表的人們的反駁，就應被視為代表了生者和死者，代表了現在的人和既往的人。

我和當時非洲教會理事會的秘書長弗蘭克·契卡尼進行了磋商，我們認為，如此誠摯的請求和懺悔，不能被視為僅僅是文字游戲。從神學上講，我們知道上帝和救世主的福音教誨我們，當別人請求寬恕的時候，應該給予寬恕。我們現在又處在國家歷史的重要時刻。同一年的早些時候，曼德拉出獄，國內出現了通過談判解決問題，以促進從壓迫到民主微妙過渡的真誠努力。如果作為強大和解力量的教會不能實現彼此的和解，那么很可能給政治家和教民傳達錯誤的信息。如果教會盡管背負歷史的負擔，但仍能夠敞開胸懷公開寬恕與和解，就會助和平過渡一臂之力。于是，我站起身，說我們接受這感人和真誠的寬恕請求。

當然，我的行為可以被理解為過于自作主張。誰給我權利讓我自稱代表幾百萬同時代的種族隔離受害者？更不要說幾百萬已經不在人世的受害者了。DRC把種族隔離帶進了教會，為在種族隔離下被劃分的黑人、印度裔人和“有色人”，分別建立了教會。與會的一些黑人代表，特別是來自起初被叫做DRC的“女兒”教會后被稱為“姊妹”教會的人，對我頗為憤怒，覺得白人教會逃脫了實際或象征意義上的謀殺罪責。他們對懺悔的誠意提出質疑，因為DRC仍拖拖拉拉不愿與黑人教會合并。讓他們感到惱怒的另一件事是，盡管DRC中的其他教會都接受了“貝爾哈懺悔”，白人教派仍在進行阻撓。這一懺悔將種族隔離斥為異端。盡管我被要求說明我的立場，而我也非常情愿地進行了解釋，我并未遭到駁斥，勒斯滕堡大會也可能的確促進了和平過渡的事業。

我覺得有些難以理解的是，猶太人何以能夠接受歐洲各國政府和機構為作為大屠殺的同謀而付出的巨額賠償。如果我們接受我們不能代表曾歷經苦難或已經故去的人而給予寬恕這一觀點的話，那么從邏輯上講，沒有直接受到賠償所涉行為傷害的人，也不能代表他人接受賠償。他們的立場也意味著罪犯來自的群體和受害者來自的群體要恢復正常和睦的關系，還存在巨大障礙。無論犯罪的一方如何賠償，無論他們希望采取什么新的更好的態度，他們都擺脫不了脖子上吊著的曾是罪犯的枷鎖。這是一個讓新的關系變得脆弱和不穩定的定時炸彈。

我希望猶太人的哲學家、神學家和思想家能夠重新討論這個問題，看看為了我們這個世界，是否可以得出一個不同的結論。他們對世界道義的影響非常寶貴，不應受到其現有立場的破壞。我完全可以想象，如果非洲人說歐洲人無論如何也無法補償骯臟的奴隸貿易的罪孽，今天的非洲人永遠不愿寬恕歐洲人在奴隸制上的罪責，將會出現怎樣的情景。奴隸貿易至少造成4000萬人喪生，更不要說家庭被毀、婦女遭欺侮以及多少上帝的子民遭受的蹂躪。

如果我們要繼續前進，建立一個嶄新的世界，就必須找到一種方式，有效了解骯臟的過去。我可以想到的最有效方式，就是罪犯或其后代承認已經發生過的殘酷事件，受害者的后代以寬恕作為回應，同時應采取措施對影響依在的慘案受害者進行哪怕是象征性的補償。或許，美國的種族關系要改善，就必須給美洲土著人或黑人一個機會，傾訴他們被劫掠、被奴役的苦難。我們在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看到了傾訴的復原功效。

如果當代人不能合法地代表作古的人們，我們就不能對南非早在1948年實行種族隔離之前就存在的種族主義歷史的罪孽予以寬恕。我們這塊土地的復原就會遭到挫敗，因為永遠會有暴行被揭露出來，破壞我們既得的成就；或是總有人會說：“這樣做可以解決當前的問題，但終究這是無效的，因為它不能卸下歷史的包袱。”

真正的寬恕要了結過去，了結全部的過去，使未來成為可能。我們不能以無法再代表自己說話的人們的名義，冤冤相報。我們必須承認，我們現在所做的是為古人，為現在，也為將來。不論怎樣，這才是群體成其為群體、人民成其為人民的東西。

我曾經深切地希望，在北愛爾蘭和中東這種地方致力于解決那些似乎無可救藥的問題的人們，不要小看了一些細枝末節，其意義和重要性可能遠遠超出了表象。令我沮喪的是，我聽說那些與北愛爾蘭和平進程緊密相關的人物拒絕在公共場合握手，有些人甚至竭力避免與對方、與現在的敵人拍進同一張照片。在約旦國王侯賽因的葬禮上，以色列總統魏茨曼有勇氣和巴勒斯坦一個激進組織的領導人握手，的確是不凡之舉。這一舉動使敵人具有了人情味，而不是將其視為魔鬼。一次小小的握手，可以讓不可思議、遙不可及的事情—和平、友誼、和睦與寬容—不再遙遠。

我也希望現今世界的敵對方，能用更加緩和的語言形容其對手。今日的“恐怖分子”很可能是明天的總統。南非的情況就是如此。大部分被打成“恐怖分子”的人，現在都成了我們的內閣部長或擔任了國民議會中的要職。如果今日與我們有分歧的人可能明天成為我們的同仁，我們還是現在就開始使用變革到來時不至于讓我們尷尬的語言對待他們為好。

我們還必須記住，談判、和平對話、寬恕與和解往往不是在朋友或類似的人中間進行。之所以需要這一切，恰恰因為人們是死對頭，視彼此為仇敵。但敵人是潛在的盟友、朋友、同事及合作伙伴。這不是什么烏托邦式的理想主義。第一次民主選舉出的南非政府，是一個由曾經相互殊死斗爭的政黨組成的民族團結政府，其領袖是一個被當做危險的恐怖主義分子而身陷囹圄27載的人。

如果世界上的沖突各方開始作出象征性的和平姿態，改變他們對敵人使用的語言，開始和他們對話，那么他們的行為也可能改變。例如，在得到承認的巴勒斯坦領土上繼續建造猶太人定居點，引起巴勒斯坦人的抵觸和敵對，讓他們感到被蔑視和侮辱，這對中東未來的各種關系又有什么好處呢？對那些注定要成為鄰居的孩子來說，這又能給他們留下些什么呢？阿拉伯國家完全不切實際地認為他們可以摧毀以色列時，我也問過同樣的問題。在我們進入新世界之時，如果真正的和平能夠降臨這塊和平之主的土地、人們說Salama或Shalom[[8]](#_8_3)的土地，那該是獻給世界的何等美好的禮物啊！

和平是可能的，特別是如果今天的敵人能夠想象彼此化敵為友，并開始行動，使這種友誼成為現實。如果他們談判時能夠照顧到對方的需要，就太好了。愿意作出讓步，是力量而不是懦弱的表現。有時值得輸掉一場戰役，去贏得一場戰爭。那些為和平與繁榮而談判的人們，正在努力實現這一輝煌而無價的目標，因此應該不難找到讓所有人成為贏家而不是爭斗不休的辦法。談判者應該保證誰都能保全面子，誰都不會空手而歸、對自己所代表的民眾無法交代。我們多么希望談判者能夠避免規定底線、放棄過多的前提條件。在談判中，我們就像寬恕進程一樣，希望提供重新開始的一切機會。頑固不化只能讓日子更難過，而表現出靈活性、愿意作出有原則的讓步的人將成為最后的勝者。

我曾說過我們的委員會并不完美。盡管如此，我還是要以我的全部熱情堅定地說，在一個不完美的世界里，這是我們能夠找到的、處理實現民主后我們所面臨的狀況的最佳途徑。盡管存在各種瑕疵，我們在南非進行的努力還是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這個疲憊、失望和嫉憤的世界，在頻繁而深重的痛苦之中，為看到這個在失望中帶來希望的進程而無比振奮。在我訪問所到之處，在我講述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地方，人們都把這一不甚完美的努力看作希望的燈塔，看作解決長期暴力、沖突、動蕩及派系斗爭，以及不僅在各國之間而且更經常是在一個國家內部發生的沖突的模式。沖突結束后，北愛爾蘭、巴爾干、中東、斯里蘭卡、緬甸、阿富汗、安哥拉、蘇丹、兩個剛果以及其他地方的交戰各方，必須坐在一起，決定經過了流血的過去后，他們如何和睦相處，如何共同創造沒有沖突的未來。從我們南非的努力中，他們看到的不僅僅是一線希望。

上帝的確不乏幽默感。除了作為可怕制度的典范，除了用它告誡人們不要如此治理國家和種族關系，明理的人誰能想象南非會是什么其他典范呢？我們南非人是最沒有希望的，這也正是為什么上帝選中了我們。我們不能為自己的成就居功。我們本來注定要遭到毀滅，卻被從大毀滅中救了出來。如果存在不可救藥的一群，則非我們莫屬。上帝希望他人看到我們時能夠汲取勇氣。上帝希望我們成為希望的燈塔、可行的模式。他希望能指著我們說：“看看南非！他們曾經歷了叫做種族隔離的噩夢。現在結束了。他們的問題曾被視為無可救藥，現在他們正在解決。任何地方的任何問題都不能被認為是無可救藥的了。你們也有希望。”

我們的實驗會成功，因為上帝希望我們成功。這不是為了我們的榮耀和強大，而是為了上帝的世界。上帝想要表明，沖突和壓迫之后生命依舊；有了寬恕，就有了未來。

[[1]](#_1_18) 《約翰福音》12 : 32。

[[2]](#_2_6) Teilhard de Chardin（1881—1955），法國古生物學家、哲學家、耶穌會神父，主張進化論，兩次來中國進行地質考察（1923、1926—1946），曾參加鑒定北京人頭蓋骨化石，著有《人的現象》、《華北舊石群的發現》等著作。—譯注

[[3]](#_3_6) 轉引自瑪麗·麥卡利斯《不屈的人生—亂世之愛》，第99頁。

[[4]](#_4_6) 德日進，同上，瑪麗·麥卡利斯引述。

[[5]](#_5_4) 《耶利米書》，6 : 14，8 : 11。

[[6]](#_6_4) 《馬太福音》，18 : 22。

[[7]](#_7_2)《向日葵：寬恕的可能和局限》（The Sunflower : On the Possibilities and Limits of Forgiveness），西蒙·魏森達爾著，邵肯圖書出版社，1998年。

[[8]](#_8_2) 阿拉伯語和希伯來語，即“和平”。—譯注

# 致 謝

我要感謝上帝，感謝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委員、專門委員會成員及工作人員，感謝他們為我們國家的和解做出的令人難以置信的努力。

本書是我在埃默里大學坎德勒神學院訪問講學期間完成的。  
凱文·拉戈里院長及其同事為我提供了一個躲避近年來繁雜事務的場所，讓我可以靜思寫作。我的私人助手拉維利亞·布朗識別了我的筆跡，謄清了手稿。紐約的卡內基公司慷慨資助坎德勒神學院，將約翰·艾倫從南非請來擔任我的研究助理，他為手稿的整理、潤色做出了寶貴貢獻。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廣播報道組根據南非廣播公司出版的真相與和解進程光盤整理的文稿，使我們能夠迅速查找關鍵的證據。我對此深表感謝。

沒有下述人士的幫助，本書也很難完成，其中包括我的文學代理琳·富蘭克林及其在倫敦的同事瑪麗·克萊美；雙日出版社（Doubleday）的特雷西·墨菲和埃里·馬捷爾；萊德/蘭登書屋的朱蒂斯·肯德拉；以及坎德勒神學院的杰克林·史密斯和桑德拉·布賴恩。

沒有我的夫人麗雅，我恐怕難以完成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重任。我深深地感謝她在委員會的聽證及其他工作中，給予我的愛和支持。

# 后記 吸塵器與洗碗機

貞女圣瑪麗教派的瑪格麗特·瑪格達蘭修女，是住在南非的一個圣公會修女。她用生動形象的語言，講述了耶穌是如何處理在其教區遭到的痛苦和憤怒的。她用吸塵器和洗碗機作比喻。吸塵器吸入所有的塵埃并保留在袋中，而洗碗機則在洗凈臟盤子后，立即將污穢排泄進了下水道。她認為耶穌的行為更像洗碗機而不是吸塵器。他吸收了遭遇的一切，然后又把一切轉移給了圣父。

在委員會著手工作前夕，工作人員中的精神衛生專家向我們講解了如何應對即將開始的艱巨任務。他們建議我們每個人找一個精神伙伴或類似的朋友或心理咨詢員，以便向他們傾訴，卸下精神負擔。他們還敦促我們保持有規律的生活，否則我們將吃驚地看到，自己會因為體驗到委員會作證的人的痛苦與憤怒而患上創傷后壓力心理障礙癥，而且很容易精神崩潰、極度沮喪。他們強調，我們應該和配偶及家人共度快樂時光，保證休息，經常運動，并在可能的情況下，堅持宗教儀式。我們自認為已經為傷人的工作做好了準備。

盡管如此，我們還是被所見所聞震驚了，常常支撐不住或幾近崩潰。我盡量遵守精神衛生人員的忠告，但我們可能永遠無法弄清這一經歷對我們產生了多深的影響、給我們及家人造成了多大的損害。有一個委員的婚姻破裂了。（可喜的是，她在委員會重新找到了愛。她和愛人—前違反人權案專門委員會成員—已經喜得男孩，所以并不全是負面的影響。）許多委員說睡眠不安，有些人擔心自己脾氣變壞了，更容易和配偶吵架，而且飲酒過量。對委員會進行報道的記者也受到了影響。有些人精神崩潰了，有的比過去更容易哭泣。

我們的口譯人員更是難熬，因為他們必須以第一人稱說話，一會兒是受害者，一會兒又成了罪犯。“他們剝光我的衣服。他們打開一個抽屜，然后把我的乳房放進去，反復擠壓我的乳頭，直到擠出了白色的液體。”“我們綁架了他，把摻了毒藥的咖啡給他喝，然后對著他的頭把他斃了。然后我們開始焚尸。焚尸過程中，我們在一邊吃燒烤。”如此這般地轉換身份，的確難熬。即使遠離聽證會場的人也會被證人的經歷深深打動。一天，我們打印部的負責人告訴我，她打出聽證文稿時，在感到滴到胳膊上的淚水時，才發現自己在不知不覺地哭泣。

1997年1月在委員會的會議上，我得知自己患了前列腺癌。也許無論我做什么都會患這種病，但這也似乎表明我們做的事的確代價沉重。寬恕與和解不是輕而易舉就能成就的事。我自身的疾患似乎生動地證明了，讓創傷深重的人民康復，其代價是何等沉重，擔此重任的人們自己就是代價的一部分。或許我們更像吸塵器而不是洗碗機，我們把所見所聞的痛苦和創傷，過多地吸入了自己體內。

人們說，癌癥讓我放松了下來，因為我更明晰地認識到真的沒有胡鬧的時間了。有時我以自己的病為借口差遣我的同事。他們有點固執己見時，我便貌似認真地說：“哦，對我好一點。別忘了我是個病懨懨的老頭子。”有時這一招的確可以緩解緊張。

身患危及生命的惡疾，使我有了新的態度和視角。它讓生命重新現出熾烈，我意識到有那么多事我認為理所當然—夫人麗雅的愛和奉獻，孫子們的活潑和歡笑，日落的壯麗，同事們的奉獻，沾滿露滴的玫瑰之美。疾患沒有讓我恐懼，反而使我更加珍視我可能無法再看到和體驗的一切。它讓我接受了自己的死亡，并深深感激在我一生中發生的美好的事情，特別是最近發生的一切。能夠親眼看到自由來臨，親自參與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這是對我投身反種族隔離斗爭多么精彩的肯定啊！

是的，參與使我們的民族復原的工作，是我的極大榮幸。但對委員會的人來說，這一榮幸代價沉重。我意識到，也許，我們只有像亨利·努文的名言所說的那樣成為“受傷的療傷人”，我們才能做出成效。

# ［譯名對照表］

A

阿布巴卡·阿斯瓦特 Abubaker Asvat

阿布巴克·伊斯邁爾 Aboobaker Ismail

阿德里安·弗洛克 Adriaan Vlok

奧比·薩克斯 Albie Sachs

阿爾夫·烏斯圖贊 Alf Oosthuizen

阿爾蒙德·諾夫梅拉 Almond Nofomela

阿豐索·德拉卡馬 Afonso Dhlakama

阿蘭·博薩克 Allan Boesak

阿利埃爾·多夫曼 Ariel Dorfman

阿利斯特·斯帕克斯 Allister Sparks

阿曼澤姆多蒂 Amanzimtoti

阿奇·弗萊明頓 Archie Flemington

阿扎爾·卡查利亞 Azhar Cachalia

阿扎尼亞人民組織 Azanian People’s Organization（AZAPO）

埃里·馬捷爾 Eric Major

埃里克斯·伯萊恩 Alex Boraine

艾琳·克魯斯 Irene Crouse

艾倫·賽德曼 Ellen Saideman

艾米·比埃勒 Amy Biehl

艾維·格琴納 Ivy Gcina

安德烈·伊梅爾曼 André Immelman

安德魯·馬庫貝 Andrew Makupe

安德魯·威爾遜 Andrew Wilson

安德魯·揚 Andrew Young

安迪·泰勒 Andy Taylor

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 MPLA

安吉·卡佩里阿妮絲 Angie Kapelianis

安娜瑪麗 Anne-Marie

奧利弗·坦博 Oliver Tambo

奧奇·魯本海默 Ockie Raubenheimer

奧斯卡·姆佩塔 Oscar Mpetha

奧烏帕·格闊佐 Oupa Gqozo

B

巴巴爾瓦·姆拉烏利 Babalwa Mhlauni

“巴里”·巴納德 “Barrie” Barnard

巴斯德·比齊蒙古 Pasteur Bizimungu

班圖教育 Bantu Education

班圖人Bantu

班圖斯坦 Bantustan

邦特赫維爾 Bonteheuwel

保羅·范·弗任 Paul van Vuuren

保羅·維尼 Paul Verryn

貝爾哈懺悔 Belhar Confession

貝弗利山 Beverley Hills

貝納特·斯巴亞 Bennet Sibaya

貝葉爾·納武德 Beyers Naudé

蓓絲·薩維芝 Beth Savage

本雅明·內塔尼亞胡 Benjamin Netanyahu

比爾·莫葉斯 Bill Moyers

比勒陀利亞 Pretoria

比紹 Bisho

比斯拉爾 Beeslaar

彼得·斯多利 Peter Storey

彼得馬里茨堡 Pietermaritzburg

賓波·馬迪凱拉 Bimbo Madikela

波波·莫雷夫 Popo Molefe

伯格尼·芬卡 Bogani Finca

博普塔茨瓦納 Bophuthatswana

博塔 P. W. Botha

布賴恩·恩古蘭加 Brian Ngqulunga

布賴恩·米歇爾 Brian Mitchell

布舍維爾 Bosheuvel

布特萊齊 Mangosuthu Buthelezi

D

達豪集中營 Dachau

大衛·施卡蘭加 David Tshikalanga

丹澤爾·伯基埃特 Denzil Potgieter

德爾馬斯叛國案 Delmas Treason Trial

德克·克埃茲 Dirk Coetzee

德克勒克 F. W. de Klerk

德尼斯·赫爾利 Denis Hurley

德日進 Teilhard de Chardin

德斯蒙德·圖圖 Desmond Tutu

丁干 Dingaan

丁干日 Dingaan’s Day

東特蘭斯法爾 Eastern Transvaal

杜拉赫·奧馬爾 Dullah Omar

杜米薩·恩徹貝扎 Dumisa Ntsebeza

多齊奧·塞克斯瓦里 Tokyo Sexwale

E

恩塔拉馬 Ntarama

恩辛克·馬塔巴尼 Ntshingo Matabane

恩亞梅克 Nyameko

F

法爾 Vaal

法蘭西斯·古爾 Francis Cull

法澤爾·蘭德拉 Fazel Randera

泛非大會 Pan Africanist Congress（PAC）

泛非學生組織 Pan Africanist Student Organization（PASO）

范亞娜·恩拉坡 Fanyana Nhlapo

非國大（非洲人國民大會）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ANC）

費拉·恩德旺德維 Phila Ndwandwe

芬特斯多普 Ventersdorp

弗蘭克·契卡尼 Frank Chikane

弗洛克 Vlok

福特·卡拉塔 Fort Calata

G

格登·威爾遜 Gordon Wilson

格萊塔·阿佩爾戈蘭 Greta Appelgren

格蘭達·維爾舒特 Glenda Wildschut

格里菲斯·姆先格 Griffiths Mxenge

古古樂圖 Gugulethu

谷奇·澤瓦尼 Kuki Zwane

H

哈羅德·費羅 Harold Sello

哈維·考克斯 Harvey Cox

漢弗里·盧楊鐸·基昆發

Humphrey Luyando Gqomfa

漢娜·阿倫特 Hannah Arendt

荷蘭新教教會 Dutch Reformed Church

賀蘭吉維·姆吉澤 Hlengiwe Mkhize

赫斯特·舒貝斯伯格 Horst Schobesberger

黑人覺醒運動

Black Consciousness Movement

黑色腰帶 Black Sash

亨利·努文 Henri Nouwen

胡圖族 Hutu

華萊士·麥克格萊格 Wallace MacGregor

懷納德·馬蘭 Wynand Malan

J

基加利監獄 Kigali Prison

吉德昂·紐武德 Gideon Nieuwoudt

吉米·克魯格 Jimmy Kruger

杰弗里·斯圖德爾特·肯尼迪

Geoffrey Studdert Kennedy

杰克林·史密斯 Jacqueline Smith

杰克遜·馬科 Jackson Maake

杰里·理查森 Jerry Richardson

K

卡德爾·阿斯馬爾 Kader Asmal

卡辛格 Kassinga

凱洛格基金會 Kellogg Foundation

凱文·拉戈里 Kevin LaGree

科拉多克四人幫 Cradock Four

科尼留斯 Cornelius

科薩·姆格佑 Khoza Mgojo

科特索大廈 Khotso House

科依人 Khoikhoi people

克里斯·德杰格 Chris de Jager

克里斯·哈尼 Chris Hani

克里斯蒂安·羅利奇 Christian Rorich

克魯格思道譜 Krugersdorp

克瓦恩德貝利九人團 KwaNdebele Nine

肯尼斯·克加塞 Kenneth Kgase

肯雅塔總統 President Jomo Kenyatta

夸祖魯―納塔爾 KwaZulu/Natal

L

拉維利亞·布朗 Lavinia Browne

萊索托 Lesotho

勒斯滕堡 Rustenburg

雷昂·維塞爾斯 Leon Wessels

里夏德·馮·魏茨澤克

Richard von Weizsäcker

理查德·戈德斯頓 Richard Goldstone

理查德·萊斯特 Richard Lyster

立特里特 Retreat

麗雅 Leah

聯合民主陣線 United Democratic Front（UDF）

林伍德 Lynnwood

琳·富蘭克林 Lynn Franklin

零零行動 Operation Zero Zero

盧卡斯·斯克維培里 Lucas Sikwepere

魯羅 Lolo

羅本島 Robben Island

羅伯特·麥克布萊德 Robert McBride

羅尼·卡斯理爾斯 Ronnie Kasrils

M

馬爾文·弗蘭克爾 Marvin Frankel

馬格紐斯·馬蘭 Magnus Malan

馬科斯總統 President Ferdinand Marcos

馬里奧斯·奧埃爾齊格 Marius Oelschig

馬魯斯·馬普爾瓦納 Malusi Mpumlwana

馬梅洛地 Mamelodi

馬佩特拉 Mapetla

馬普勒·拉馬沙拉 Mapule Ramashala

馬塞盧 Maseru

馬修·格尼維 Matthew Goniwe

瑪格麗特·瑪格達蘭 Margaret Magdalen

瑪古酒吧 Magoo’s Bar

瑪姬·斯克薩娜 Maki Skhosana

瑪麗·伯頓 Mary Burton

瑪麗·克萊美 Mary Clemmey

瑪麗·麥卡利斯 Mary McAleese

瑪麗亞塔·杰埃格 Marietta Jaeger

毛毛 Mau Mau

梅費爾 Mayfair

蒙謝韋爾 Munsieville

米洛舍維奇總統 President Milosevic

民族團結與和解法案

Promotion of National Unity and Reconciliation Act

民族之矛 Umkhonto weSizwe（MK）

墨菲·莫羅貝 Murphy Morobe

姆彼羅 Mpilo

姆丹查尼 Mdantsane

姆克斯 Mkosi

姆普馬蘭加 Mpumalanga

N

內維爾·克拉倫斯 Neville Clarence

納克迪恩 Narkedien

南非國防部隊 South African Defence Force（SADF）

南非學生大會 Congress of South African Students（COSAS）

尼克德姆斯·索諾 Nicodemus Sono

尼亞米·格尼維 Nyami Goniwe

努喬馬 Sam Nujoma

諾布依塞羅·姆拉烏利

Nombuyiselo Mhlauni

諾雷·莫哈比 Nohle Mohapi

諾蒙迪·卡拉塔 Nomonde Calata

P

帕埃斯·蘭嘉 Pius Langa

帕爾 Paarl

帕特里克·“恐怖”·雷克塔

Patrick“Terror”Lekota

培伯克三人組 Pebco Three

皮埃特·莫格埃 Piet Mogoai

皮諾切特將軍 General Augusto Pinochet

普爾斯莫 Pullsmoor

普萊斯拉·莫索郁 Priscilla Mosoeu

Q

恰恰烏里·戈多羅茲 Qaqawuli Godolozi

前線國家 frontline states

喬·馬馬塞拉 Joe Mamasela

喬·斯洛沃 Joe Slovo

喬伊斯·穆提姆庫魯 Joyce Mtimkulu

喬伊斯·賽伊佩伊 Joyce Seipei

喬治·比祖斯 George Bizos

喬治·桑塔亞納 George Santayana

R

人口登記法 Population Registration Act

若阿金·希薩諾 Joaquim Chissano

若納斯·薩文比 Jonas Savimbi

S

塞法魯 Sefolo

桑德拉·布賴恩 Sandra Bryan

桑地諾解放運動

Sandinista liberation movement

沙爾克·范·倫斯伯格 Schalk van Rensburg

尚比龍·加勒拉 Champion Galela

社團區域法 Group Areas Act

圣靈降臨節 Christian Pentecost

史蒂芬·奈都 Stephen Naidoo

史蒂夫·比科 Steve Biko

斯貝羅·穆孔托 Sparrow Mkhonto

斯波·哈舍 Sipho Hashe

斯丹察·伯帕佩 Stanza Bopape

斯登皮埃·賽伊佩伊 Stompie Seipei

斯皮維·穆提姆庫魯 Siphiwe Mtimkulu

斯威士蘭 Swaziland

蘇布西索·安德魯·榮都

Sibusiso Andrew Zondo

索韋托 Soweto

T

塔博·姆貝基Thabo Mbeki

泰尼·馬雅 Tiny Maya

唐迪 Thandi

特雷西·墨菲 Trace Murphy

特蕾莎修女 Mother Teresa

特瓦族 Twa

圖西族 Tutsi

土著合并法（城區） Natives（Urban Areas） Consolidation Act

托拉斯·費得農場 Trust Feed Farm

W

威利·揚克爾 Willie Jonker

威倫·斯庫恩 Willem Schoon

維多利亞·姆先格 Vitoria Mxenge

維爾沃德 Verwoerd

維克多·維爾斯特監獄 Victor Verster prison

維伊希勒·布賴恩·馬達斯

Vuyisile Brian Madasi

魏茨曼 Ezer Weizman

溫迪·奧爾 Wendy Orr

溫妮·馬蒂奇澤拉―曼德拉

Winnie Madikizela-Mandela

沃爾特·西蘇魯 Walter Sisulu

沃斯特 B. J. Vorster

沃特班克 Witbank

烏班圖精神 ubuntu

烏特·巴森 Wouter Basson

X

西奧蘭多 Orlando West

西德尼·波蒂埃 Sidney Poitier

西蒙·佩雷斯 Shimon Peres

西蒙·魏森達爾 Simon Wiesenthal

西南非洲人民組織 SWAPO

西尼·穆法馬蒂 Sydney Mufamadi

西塞羅·姆拉烏利 Sicelo Mhlauli

西斯凱伊 Ciskei

希茨維·孔迪勒 Sizwei Kondile

希西·坎佩培 Sisi Khampepe

謝里爾·拉馬福薩 Cyril Ramaphosa

辛括瓦納·馬爾加斯 Singqokwana Malgas

辛普森 O. J. Simpson

薛利·古恩 Shirley Gunn

Y

雅各·厄克特 Jacques Hechter

雅思明·蘇卡 Yasmin Sooka

亞伯拉罕·格羅貝拉 Abraham Grobbelaar

亞德瓦謝姆 Yad Vashem

揚·范·德霍芬 Jan van der Hoven

揚·范·里貝克 Jan van Riebeeck

揚·克埃茲 Jan Coetzee

伊斯梅爾·馬霍麥德 Ismail Mahomed

以利沙 Elisha

因卡塔自由黨 Inkatha Freedom Party（IFP）

尤金·德考克 Eugene de Kock

約翰·艾倫 John Allen

約翰·鄧普頓基金會

John Templeton Foundation

約翰·范·德梅爾維 Johan van der Merwe

約翰·馬丁·范·澤爾

Johan Martin van Zyl

約翰·史密特 Johan Smit

Z

扎哈拉·納克迪恩 Zahrha Narkedien

真相與和解委員會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種族分類局 Race Classification Boards

朱蒂斯·肯德拉 Judith Kendra

自由憲章 Freedom Charter

祖拉·普林斯·瑪巴拉 Zola Prince Mabala